

遠行的左翼戰士

悼念陳映真文集



范綱罔◎主編

遠行的左翼戰士

生前被徐復觀譽為「海峽東西第一人」，台灣知名文學家陳映真，於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在北京與世長辭。作為台灣戰後左翼思想勤勤懇懇的開拓者，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左翼思想的影響，超越台灣一地及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社會，他的溘然長逝無疑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不同於流俗的「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哲人其萎」的陳詞套語，這本悼文集的出版，旨在能善述陳映真其事，進而善繼其志。除了情感的追念，也是提供學術、文化、思想界，認識陳映真的另一種視野。

我們在哀思中，召喚著同志承接陳映真點燃的篝火，攜手同行，為人的全面解放，不懈的奮鬥！

ISBN 978-957-39-1040-4



9 789573 910404

00300



遠行的

悼念陳映真文集

左翼戰士

范綱埜◎主編



LEFT WING
FIGHTERS



VISTA
PUBLISHING

出版前言

台灣知名文學家陳映真先生，於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在北京與世長辭。作為台灣戰後左翼思想勤懇懇的開拓者，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左翼思想的影響，超越台灣一地及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社會，他的溘然長逝無疑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台灣左翼團體：《批判與再造》雜誌社、前《人間》雜誌同仁、差事劇團、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釣魚台教育協會籌備會。分別於二〇一七年一月七日與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舉辦了「悼念陳映真——左翼的追思」系列活動。一月七日，主要針對陳映真的思想、精神，進行論述、闡發；三月三日，以具體的文藝創作——詩詞朗誦、戲劇、舞蹈等，呈現陳映真的美學主張（詳細內容，請見本書「輯三——陳映真紀念活動紀錄」）。

這本悼文集，主要收錄了在二〇一七年一月七日追思會前後，兩岸三地、日本、美國、漢族、原住民族……，曾經與陳映真共事，並肩作戰的戰友、同志，以及雖未與陳映真有直接接觸，但是在閱讀陳映真的作品，深受感召，進而投入各領域社會變革的青年一代，對於陳映真

的追思。這廿餘篇不同年齡、不同區域、不同民族的文章之中，具體而微呈現了陳映真的人格、思想風貌。

此次台灣左翼悼念映真先生追思活動的總召集人，《批判與再造》雜誌社總編輯杜繼平，原擬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中，全面闡釋映真先生的思想淵源，讓世人無論敵友，都能透徹理解這位左翼戰士的思想，提供各界研究陳映真一個新的視野。可惜杜總編輯因諸事纏身，加之對理論文章持慎之又慎的嚴謹態度，故而無法於出版截稿前完成書寫，這是我們最引以為憾的。但也期待杜總編輯的宏文及早完成，一則以撫慰亡靈，一則為左翼陣營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磐。

不同於流俗的「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哲人其萎」的陳詞套語，這本悼文集的出版，旨在能善述陳映真其事，進而善繼其志。我們在哀思中，希望召喚同志承接陳映真點燃的篝火，攜手同行，為人的全面解放，進行不懈的奮鬥！

CONTENTS 目次

124	119	114	98	93	89	86	81	59	53	48	42	38	35	24	22	10	4
蔡明德◎	趙剛◎	葉芸芸◎	曾健民◎	陳美霞◎	郭建平◎	梅丁衍◎	倪慧如◎	范振國◎	胡清雅◎	施善繼◎	金寶瑜◎	林瑞含◎	印鐵林◎	方聞◎	輯一 悼念文章	輯一 映真身影	出版前言
想念你，大陳	鞭子和提燈——祭陳映真先生	我所認識的陳映真	為了前進的追思——初論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和社會變革論	紀念陳映真——邁向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及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	別了！我的尊師！我們永遠的家人！——敬悼陳映真先生	恨晚成了雋永——緬懷陳映真	「人間」路上，送別陳映真	但望此後憶念起你，不致羞慚——悼映真先生	悼念陳映真	悼念詩三首	懷念一個奮戰不懈的左翼戰士——陳映真	為我打開台灣第一道門的陳映真	追憶思想家陳映真兄	山崩海頹——敬悼陳映真先生			

CONTENTS 目次

182 166 164 159 151 146 140 132 127

橫地剛◎ 慚愧！慚愧！——悼陳映真先生

鍾喬◎ 《來甦》的山路上，送你遠行

鍾春蘭◎ 以生命踐行左派理念的陳映真先生

簡永松◎ 緬懷和陳映真搞革命的那段歲月！

藍博洲◎ 落葉歸根——悼念陳映真先生

關曉榮◎ 嚴厲的鞭子與腳前的提燈——永誌不忘陳映真

輯三 陳映真紀念活動紀錄

范綱澄◎ 悼念陳映真——左翼的追思活動紀要

鍾喬◎ 劇場與現場——陳映真追思文藝晚會的迴音

輯四 陳映真北京告別式

陳映真生平簡表

跋 遞補歷史的行列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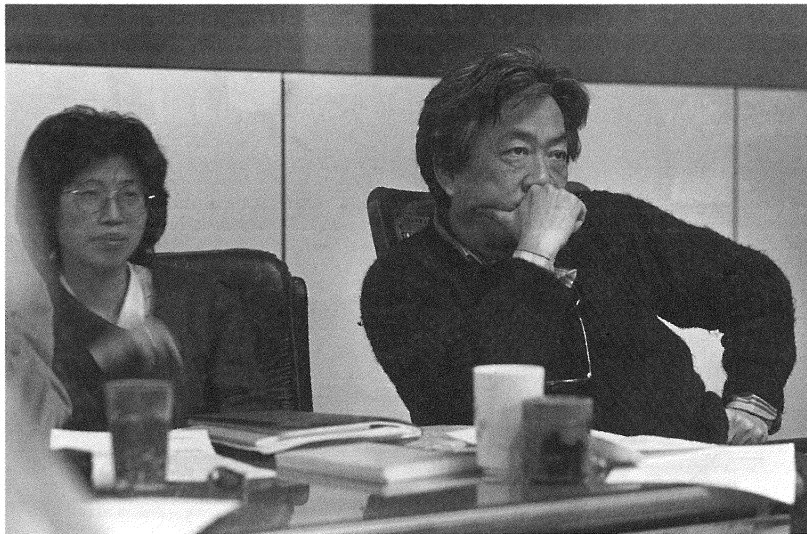
208

198



輯 一

映真身影



於人間雜誌編輯部主持會議。(林柏樑／攝)



於雜誌社進行搶救森林會議。(蔡明德／攝)



與人間雜誌社同仁合照。(黃玉淇／攝)



於台北六張犁公墓，白色恐怖受難人亂葬崗。（蔡明德／攝）



於人間雜誌社地下室審稿。（蔡明德／攝）



參與 316 農民反美帝國主義示威遊行。(蔡明德／攝)



參與 3.16 農民反美示威遊行。(蔡明德／攝)



參與反美入侵伊拉克示威遊行。(林柏樑／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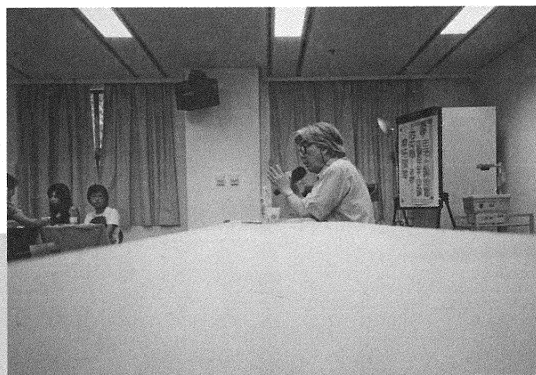
與妻子陳麗娜（立於右側者）參與反美入侵伊拉克戰爭遊行。(林柏樑／攝)



湯英仲葬禮現場講話。(蔡明德／攝)



台中縣公害防治學會成立，陳映真於台上致詞。(蔡明德／攝)



夏潮報導文學營授課現場。(林柏樑／攝)



貢寮反核說明會報告。(蔡明德／攝)



成功大學「文學鼎談」座談。(林柏樑／攝)



與日本報告攝影家樋口健二。(蔡明德／攝)

悼念文章

左翼的追思

20170107
14:00-18:00
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活動內容
13:30 與會人員齊到
14:00 范雲、胡漢民、司儀開場
14:05 杜繼平、說明活動流程
14:10 譚高、陳映真身軀紀念影像播放
14:40 杜繼平、第一階段發言
15:30 茶點時間 / 音樂播放
15:50 杜繼平、第二階段發言
16:40 杜繼平、與會者發言討論
18:00 范雲、結束語、散會
(說明3月3日墓文發表會日期)

時間：2017年1月7日(六)
14:00-18:00
地點：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客家文化中心3F)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2號
交通：台北捷運台電大樓站5號出口
前行穿越地下道約5分鐘

如克前來
請電：0935366231
電郵：magicjoker77@gmail.com

左翼的追思

20170107
14:00-18:00
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活動內容
13:30 與會人員齊到
14:00 范雲、司儀開場
14:05 杜繼平、說明活動流程
14:10 譚高、陳映真身軀紀念影像播放
14:40 杜繼平、第一階段發言
15:30 茶點時間 / 音樂播放
15:50 杜繼平、第二階段發言
16:40 杜繼平、與會者發言討論
18:00 范雲、結束語、散會
(說明3月3日墓文發表會日期)

時間：2017年1月7日(六)
14:00-18:00
地點：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客家文化中心3F)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2號
交通：台北捷運台電大樓站5號出口
前行穿越地下道約5分鐘

如克前來
請電：0935366231
電郵：magicjoker77@gmail.com

左翼的追思

20170107
14:00-18:00
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活動內容
13:30 與會人員齊到
14:00 范雲、司儀開場
14:05 杜繼平、說明活動流程
14:10 譚高、陳映真身軀紀念影像播放
14:40 杜繼平、第一階段發言
15:30 茶點時間 / 音樂播放
15:50 杜繼平、第二階段發言
16:40 杜繼平、與會者發言討論
18:00 范雲、結束語、散會
(說明3月3日墓文發表會日期)

時間：2017年1月7日(六)
14:00-18:00
地點：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客家文化中心3F)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2號
交通：台北捷運台電大樓站5號出口
前行穿越地下道約5分鐘

如克前來
請電：0935366231
電郵：magicjoker77@gmail.com

悼念陳映真

20170107
14:00-18:00
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活動內容
13:30 與會人員齊到
14:00 范雲、司儀開場
14:05 杜繼平、說明活動流程
14:10 譚高、陳映真身軀紀念影像播放
14:40 杜繼平、第一階段發言
15:30 茶點時間 / 音樂播放
15:50 杜繼平、第二階段發言
16:40 杜繼平、與會者發言討論
18:00 范雲、結束語、散會
(說明3月3日墓文發表會日期)

時間：2017年1月7日(六)
14:00-18:00
地點：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客家文化中心3F)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2號
交通：台北捷運台電大樓站5號出口
前行穿越地下道約5分鐘

如克前來
請電：0935366231
電郵：magicjoker77@gmail.com

悼念陳映真

20170107
14:00-18:00
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活動內容
13:30 與會人員齊到
14:00 范雲、司儀開場
14:05 杜繼平、說明活動流程
14:10 譚高、陳映真身軀紀念影像播放
14:40 杜繼平、第一階段發言
15:30 茶點時間 / 音樂播放
15:50 杜繼平、第二階段發言
16:40 杜繼平、與會者發言討論
18:00 范雲、結束語、散會
(說明3月3日墓文發表會日期)

時間：2017年1月7日(六)
14:00-18:00
地點：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客家文化中心3F)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2號
交通：台北捷運台電大樓站5號出口
前行穿越地下道約5分鐘

如克前來
請電：0935366231
電郵：magicjoker77@gmail.com

悼念陳映真

20170107
14:00-18:00
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活動內容
13:30 與會人員齊到
14:00 范雲、司儀開場
14:05 杜繼平、說明活動流程
14:10 譚高、陳映真身軀紀念影像播放
14:40 杜繼平、第一階段發言
15:30 茶點時間 / 音樂播放
15:50 杜繼平、第二階段發言
16:40 杜繼平、與會者發言討論
18:00 范雲、結束語、散會
(說明3月3日墓文發表會日期)

時間：2017年1月7日(六)
14:00-18:00
地點：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客家文化中心3F)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2號
交通：台北捷運台電大樓站5號出口
前行穿越地下道約5分鐘

如克前來
請電：0935366231
電郵：magicjoker77@gmail.com

NEW NARRATIVES FILM FESTIVAL
二屆當代敘事影展

(陳崇真/攝)

山崩海頹——敬悼陳映真先生 ◎方聞

早就遠道傳聞，陳映真先生已經臥病十年之久，而且病勢沉重，但是，驟然傳來陳先生過世的噩耗，還是震驚不已。連續多日，一種無法言喻的寂寞和難以排遣的悲愴之感，洶湧而來。

余生也晚，加上海峽阻隔，我並沒有機會結識陳先生。但二十年來，通過他的作品，陳先生卻成了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一大支撐。在〈我的文學和創作與思想〉一文中，陳先生說過：「我非常希望我的作品能給予失望的人以希望，給遭到羞辱的人檢回尊嚴，使被壓抑者得到解放，使撲倒在地上爬不起來的人有勇氣用自己的力量再站起來，和戀愛快樂的人一同快樂，給予受挫折、受辱、受傷的人以力量，那樣的文學才有意義。」

確然如此，他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論文，一直以來，都是我汲取希望、力量和勇氣的重要源泉。

（一）尋找失去的視野

如今想來有點不可思議，陳先生是小說名家，但我最早讀到的卻是他的一篇政論文章。我步入大學校門的一九九〇年代，正是國際格局發生大變動的時期，蘇東劇變，紅旗落地，西方

政要和學者彈冠相慶，「歷史終結論」喧聲震天。中國大陸在一九九二年之後，經濟上全面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接軌」，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大批倒閉和出售為標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快速瓦解，只剩下一層薄薄的意識形態油彩。在這一路線的指引下，一時之間，經濟總量一路飆升，但是，很快地，這種飲鴆止渴式的發展的惡果就暴露無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下崗，生計頓失；資本與權力相互溫存，導致少數人一夜暴富；貧富急劇分化，社會矛盾激增；吏治腐敗、環境污染、倫理崩壞……

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年少無知的我，對於這樣的問題，懷著揮之不去的疑問卻又苦苦難以索解。而當時主流的報刊和講壇，幾乎一邊倒地成了西方教條主義獨霸的天下。「革命」和「社會主義」成了過時、保守的代名詞，備遭奚落。少數堅守理想的革命前輩、理論家和學者，則迅速被邊緣化，而且，他們所慣常使用的、凝固化了的「馬曰列云」式的表達方式，也早已不為大多數的年輕人所接受。

正是在這樣思想苦悶的時刻，我讀到了陳映真先生的文章〈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文章從全球的、結構性的觀點，從第三世界的觀點，從亞洲的觀點，分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經緯，並對大陸提出懇切的期望和忠告。文中所表現出來的學識的淵博、析理的明澈、視野的開闊，都是我素所未見的。梁啟超在談到龔自珍時說：「初讀《定盦文集》，若受電然」。陳先生的這篇文章，給我的就是同樣的震撼。尤其可貴的，雖然這是一篇討論政治經濟學的文章，但充滿了人的體溫，讀來毫無枯燥之感。作者熱情誠懇，娓娓道來，不僅發人深思，而且令人感動。

對於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大陸知識份子，文章也提出了尖銳而深刻的批評：「和六〇、七〇年代以來的臺灣一樣，大陸知識份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買辦精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Compradore Ittebourgeois intellectuals），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卻滿心嚮往和推崇；對資本主義發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支配的事實，斥為共產主義政治宣傳；對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以來的一切全盤否定；甚至對自己民族四千年來文化一概給予負面的評價。在他們的思維中，完全缺乏在『發展——落後』問題上的全球的觀點。對於他們而言，中國大陸的『落後』，緣於民族的素質，緣於中國文化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當然尤其緣於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鎖國政策』。」

讓我訝異不已的是，作者這裡所寫下的幾乎每一個字，都可以和我自己當時的切身感受相印證。

多年以後，我偶然讀到大陸老一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鄧力群一九九一年六月卅日的一次講話：「最近，臺灣作家陳映真寫了一篇文章，在臺灣的《海峽評論》上登載……很值得大家看一看。陳的文章中一個小題目叫『尋找失去的視野』，寫得可不一樣，充滿激情，很有見地。這對我們也是一種激勵。他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建設、改革開放很有成績，可是在我們中間有些人慢慢地把階級鬥爭的視野丟掉了，慢慢地把第三世界的視野也丟掉了。他希望我們不要丟掉階級鬥爭的視野和第三世界的視野。」

這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表明，我當時的感受，實在並非一人的私見。

（二）一個時代的追問

從此，我開始熱心地搜羅陳先生的作品，只要能找得到的，都不放過仔細拜讀的機會，也一次次地從中收穫啟迪、感動、鼓舞和激勵。

讓我欣喜不置的是，在我所就讀的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藏有人間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的全套十五卷的《陳映真作品集》。但因為沒有副本，所以只限於在館內閱讀，不許出借。有一段時間，只要課餘有暇，我都會待在保存本閱覽室，從第一卷小說《我的弟弟康雄》讀起，順序而下，一直到彙集他人對陳映真作品的評論的最後一卷《文學的思考者》。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在一篇題為〈鞭子與提燈〉的序文中，作者回憶他在白色恐怖中被捕投獄，篤信基督教的父親第一次前去看他的情景——在那次約莫十來分鐘的晤談中，有這樣的一句話：

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

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這些話送給你，擺在羈旅的行囊中，據以為人，據以處事……。

記得我是包含著熱淚聽受了這些話的。即使將「上帝」詮釋成「真理」和「愛」，這三個標準都是不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這些話才成為我一生的勉勵。

當時，我讀完這段話，霎時之間，也不禁眼熱鼻酸，感動之情，不能自己。多年來，我常常想，父子兩人這樣的胸襟、擔當和持守，在當今之世，恐怕日漸少有了，而千百年來，中國人所稱道的滿門忠烈，恐怕也無逾於此了吧。

在陳先生的小說〈鈴瓊花〉、〈山路〉、〈趙南棟〉和報告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中，我第一次遇見了「五十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臺灣，籍不分大陸本省，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遇見了「把一生只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追求幸福、正義和解放的夢想，在殘暴的拷問、撲殺和投獄中粉碎了自己」的一代人。自願接下「看牛仔班」、為了窮人的孩子挺身而出的老師高東茂；立志給叛賣同志的二兄贖罪、冒充被捕殺的革命者李國坤的妻子，為烈士養老撫幼的少女蔡千惠；在死刑之前，看到天邊的一輪皓月依然無限驚喜的林添福；在白色恐怖中被捕殺而數十年屍骨難尋的徐慶蘭和黃逢開……這一串串閃光的、虛構或真實的名字，讓我的心情久久激動難平。

在〈山路〉的末尾，蔡千惠臨終前給自己當年真正的未婚夫、同樣投身革命而長期系獄、

僅免一死的黃貞柏留下一份遺書。其中寫道：「近年來，我戴著老花眼鏡，讀著中國大陸的一些變化，不時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擔心。不為別的，我只關心：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我迄今仍難以忘懷，第一次讀完這段話時，靈魂的巨大戰慄。二十年來，有無數次，每當眼睜睜地看著大陸的社會主義根基一點點動搖時，這些話就會不停地在我的耳邊迴響。

實際上，蔡千惠發出的這個驚心動魄的追問，是整整一個時代的追問，是包括一九五〇年代撲倒在臺灣刑場上的、為中國革命獻出生命的兩千多萬名烈士的追問。是啊！如果中國的革命墮落了，如果中國的社會主義步入歧途，如果底層的勞苦大眾再遭背棄，如果社會重回數千年來「富者累巨萬，貧者食糟糠」的舊軌，那麼，長眠地下的先烈如何能夠瞑目？而作為後死者的我們，又何顏面對他們的英靈？每一個不願放棄社會主義理想的人，言念及此，都不能不感到至深的痛苦。

（三）「不！」

但是，一個無法不去面對的現實是，在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的確陷入了低潮。蘇東陣營土崩瓦解，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幾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早已面目全非。以解放全人類為職志的無數革命者，不惜拋擲頭顱所建立起來的新社會，為什麼在短短的幾十年，在一兩代人

之後，在自己子弟的手中就先後歸於潰敗？

在小說〈趙南棟〉中，趙慶雲和宋蓉萱夫妻一個為理想從容赴死，一個在大獄中遭囚錮數十年。但是，這對革命者的下一代，對於父母的志業和追求已經全然無法理解，而且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聲色犬馬之樂甘之如飴。長子趙爾平從一個發誓「立業濟世，答恩報德」的有志少年，到心安理得地收受賄賂、狎養情婦，一步步滑入「成功入世」的、富裕、貪嗜而腐敗的世界。次子趙南棟則沉醉於肉欲、吸膠，「讓身體帶著過活」「他喜歡吃，喜歡穿扮，喜歡一切使他的官能滿足的事物……但是，舉凡一旦得手的，不論是人和物品，他總是很快地，不由自己地喪失熱情」。〈趙南棟〉寫作於一九八七年，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在全球佔據半壁江山。但陳先生當時就敏銳地寫出了革命者所面臨的這個巨大悲劇。今天，讀來愈加觸目驚心。

革命者的子弟背離父輩的理想，在中國大陸，更是普遍而巨大的存在。尤其是在最近的卅多年裡，我們看到，從中央到地方，陳先生筆下的這一切，以更加龐大的規模，更加戲劇性的方式，每一天都在人們面前上演。在中國革命史上，多少人放棄安富尊榮的生活，冒著破家亡身的危險，像飛蛾撲火一般地投身革命。但不旋踵間，他們的後代，就徹底脫離了普通百姓，儼然以「紅色貴族」自居，不擇手段地追逐財富和權勢，在百米衝刺式奔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縱情狂歡。

進一步講，在比喻的意義上，可以說，隨著革命的一代逐漸凋零，在大陸的十多億人中，幾乎全都是革命的後代，而且大部分人都曾經分享革命帶來的恩惠。但是，不知不覺之間，有多少人還能記得父輩的理想？在改革開放以來「致富光榮」的政策導引下，多少人熱心嚮往自己心目中的西方資本主義富足安樂的生活，而將社會主義的理念和信仰棄若敝屣？

陳映真先生在小說中描述趙爾平的蛻變時這樣寫道：「他的少年時代對進德修業的生命情境的嚮往，於今竟已隨著他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中，崩解淨盡了。」也許作者當時並未意識到，從某種意義上，這不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生動寫照嗎？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的確是中國大陸「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而有意無意間，中國革命的「少年時代」對於一個新的、公平的、窮人得解放的社會的熾熱嚮往，也幾乎「崩解淨盡」了。

從世界範圍看，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不同，從蘇俄開始，包括中國在內，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在經濟文化不發達的國家獲勝的。這就註定了，這些國家在革命勝利後，必須「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但如何保證在這一過程中不「喪心失志」？這或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所必須面對的考題吧。

出獄之後痛感「這個社會，早已沒有我們這個角色，沒有我們的臺詞」的趙慶雲，在彌留之際懷想自己的難友，他不禁問道：「這樣明澈地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的、長壽的歷史裡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不！」

那時候，趙慶雲常常在沈思中這樣地怒吼過。

的確，縱使歷史的長河有曲折，有回流，但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而不惜肝腦塗地的一代人，絕不會只是一個微末的波瀾。然而，只有後來人高擎他們手中的火炬重新出發，

吸取過往的一切經驗教訓，為社會主義探求一條全新的出路，這樣，才能夠讓這一聲怒吼山鳴谷應，氣壯山河。

（四）與歷史對弈

與他筆下的「表現了至大至剛的勇氣的一代人」一樣，陳映真先生畢生英勇地追逐光明。在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他奮不顧身，以自己的靈心與善感、以自己的深思和敏銳、以自己的勇氣與無畏，與黑暗搏鬥，雖百折而不稍屈撓。

在白色恐怖時期，他曾作為政治犯入獄七年，出獄之後，在臺灣，無論國民黨執政，還是在民進黨上臺，他都是「被支配的意識形態霸權專政的對象」。他畢生嚮往社會主義，追求國家統一，但是，「對於大陸開放改革後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同樣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越來越深切的不滿」。

他寫文章、編雜誌、辦出版社、參加社會活動，勇敢地揭破那「被暴力、強權和最放膽的謊言所抹殺、歪曲和污蔑」歷史，不懈地為臺灣、為中國、為世界探索一條更加美好的道路。

謙抑為懷的陳先生曾經說過：「我也知道中國跟世界文學史裡面的一些巨匠，他們，一尊一尊的巨匠站在那裡，我抬頭的時候，如果我戴帽子，帽子一定要掉下來——那麼偉大的作家，想起這些作家，魯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覺得我怎麼斤斤計較要跟人家講我這段在寫什麼，

為什麼這樣寫，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但實際上，他的創作、他的思想、他的人格，已經讓自己成為堪與這些文學巨匠為伍而無愧色的一員。而且，他不僅是中國在魯迅之後，很少見的身兼文學家和思想家於一身的人物，而且是一個戰士，一個抱著淑世的情懷，憂國憂民，畢生「為良心、愛、正義而熱烈地生活、創作和戰鬥」的戰士。陳先生一生的德業和言行，已經為他在歷史上樹立了一座高聳入雲的豐碑。

然而，最後，無情的病魔擊毀了他。在〈趙南棟〉中，陳映真先生寫道：「每回有人被叫出去，我在押房裡唱過：安息吧，親愛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我們走的時候，老趙，你們也這樣唱，」蔡宗義無限緬懷地說：「快四十年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我們，為之生為之死的中國，還是這麼令人深深地擔憂……」

在北京八寶山的遺體告別式上，他的親朋好友同樣用這一首《安息歌》為他送行：

安息吧 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 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 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現在是我們的責任 去爭取民主自由

是的，我想，恐怕直到病倒的那一天，對臺灣、對中國、對世界，陳映真先生都還懷抱著深深的憂慮吧。

陳先生竭盡平生的心力與智慧，與歷史對弈。而在他的身後，一場新的歷史棋局已經悄然展開。一度響徹雲霄的「歷史終結論」已經證明不過是淺識者的囁語。隨著二〇〇八年經濟危機的爆發，西方資本主義的積弊暴露無遺，美國霸權動搖，歐洲復甦乏力。雖然新社會的萌芽仍未露頭，但舊制度的堅冰開始消融，世界進入未定之天，這也再次全世界的進步人士，提供了一個反思歷史和打造未來的機會。

如今，陳映真先生過世了。我想，只有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接過他手中的旗子，贏得這一場勝負未分的棋局，才是對他最好的告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卅一日）

編按：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大陸的中年左翼知識份子，悼文情感真摯、思想深刻，值得細讀、思索。

◎追憶思想家陳映真兄 ◎印鐵林

二〇一六年由秋入冬，隨著秋葉的飄落，不免讓人興起感傷檢討的心情。一段時間以來，我與朋友談起我關於寫作的意見；我一向認為思想境界、關懷眾人是寫作能有深度的基礎。因此，我想到了寫一篇有關這方面的回憶的文字。

這回憶是我多年前在舊居湖區的一次深夜散步。深夜散步中，突然飛來湖區一隻離群的孤雁，牠淒涼、急切、盤旋、尋找的叫聲，直是動人心魄。那晚的散步，我思緒良多，也涉及人生萬物等哲思。隨後，我就動筆寫出了這段回憶。動筆時，不覺地、自然地想起了於一九九三年邀請來我舊居盤桓數日的陳映真兄（與政論家王曉波兄同來）。陳兄是有名的小說家、散文家，是一位關心社會公平正義的知識分子，不正是一位有理想的、具有深度寫作基礎的作家麼。「孤雁」寫完後數日，朋友傳來消息，多年不見，在北京養病的陳映真兄幾日前（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病逝了。冥冥中竟如此巧合，我回憶起舊居的往事，正是關於思想文學方面的事，而想起了多年未能聯繫的陳映真，就在幾乎此同時，他過世了。

我勉力謹以此短文，來追憶我直接接觸的陳映真兄。

陳王二兄是應「華夏政略研究會」邀請來美訪問的，主要談兩岸前途、中美關係。在華盛頓地區我安排了演講會，如今我還能追憶一些他演講的內容，還有不少私下的交談，現將它們

記錄在下面。

他此次來華府，文學方面談的不多，主要談到的是有關哲學、思想方面。我印象極為深刻的是他對知識份子的定義。他說：「知識份子必須關心社會人羣的公平正義」，等等。關於知識份子，綜合起來，他認為應該包含下面應幾個條件：

- 主張社會的公平正義，同情扶助弱勢人羣
- 不應只為利益工作，為資本家效命
- 應致力和平

我特別記得他說：「替軍火公司研究開發新武器的人，不能算為知識份子」。

在談到國際關係或社會基本問題時，陳映真往往從其基本的根源談起；談到社會制度，談到階級等許多思想、哲學的名詞時，有些聽眾似乎並不習慣，也不了解，此時，他都總是不慌不忙，娓娓道來，確像一位有耐心、和善的學者。總而言之，我對陳映真的感受很深刻，他必是一位有理想，真誠善良讓人喜歡的知識份子。我以為陳映真應該是具有下列幾方面品格的人而為人們所懷念：

- 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 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 他是主張社會公平正義的人道主義者
- 他是人所共知的成功的小說家、散文家

我個人進一步感受到的是：陳映真兄的為人氣質的本質是一位熱忱的、善良的、喜歡思想、追求真理的思想家，然後方才能造就出其他各方面的成就。

（本文原載《中美論壇》第一七八期）

● 為我打開台灣第一道門的陳映真 ◎林瑞含

(一)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陳映真在北京逝世。

我在輔仁大學心理系的碩士班課程已經完結，人離開了台灣回到香港，一邊繼續在社區工作，一邊寫論文。

翌日，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的莫昭如有事傳訊息給我，知道我跟陳映真親近的他順便問候。

我回他：「陳映真，是的，他走了。他病了那麼久，也許是一種解脫。」

我已十多年沒見他，但我跟他很親，即使那麼久沒見，感覺也一樣。我很平靜，但與他相交的歷史，在他和我之間傳承的情感，慢慢再一點點由深處浮出來。

(二)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陳映真在北京舉辦告別式。

我把訊息轉給關心陳映真的香港文學守持人，今年也將踏入七十八歲的盧瑋鑾老師。盧老

師問：妳去否？如去，代向靈前致心香一瓣。

我說：台灣若有才會去。我們就遙祭他吧！

(三)

於是，二〇一七年一月七日，我參加了台北的陳映真追思會。難得地，因此而與《人間》的舊友再聚。

面對我認識和不認識的在現場悼念陳映真的人，我想把我來的感思與大家分享，所以主動爭取了發言的機會。

我告訴大家，我特別來這一程，既是為陳映真（我的乾老爸）送行，也是迎接他回到台灣的家。同時我很想來看看超過十年沒見的麗娜小乾媽。

一九八八年二月，廿六歲的我第一次來台灣，我到《人間》雜誌跟他們到處採訪四個月，生活在《人間》的團隊之中，那是我青春人生重要和精彩的實習期。一年之後發生「六四」事件，香港人前所未有地熱情關心大陸和香港的發展，雖然有些人後來變得心灰意冷，我卻找到了投入基層尋求變革自己和社會的動能。經過了《人間》的實習和「六四」的參與，我決定在社區蹲點，與女工和新移民家庭一起工作，至今已近三十年。後來我在工運的路上認識了當天也在追思會現場的夏林清和鄭村棋老師，在他們由勞工、性別、移民、身心障礙到政治運動的發展中，

不斷得到啟發和激勵，與他們建立了跨境的深厚關係。但台灣的第一道門，是陳映真為我而開的。

一九八七年，我和一些關心兩岸的朋友和團體在香港舉辦《人間》攝影展，邀請他來，那也是我跟他的第一次見面。他的講座，吸引了不少聽眾。一九八八年，他在香港與劉賓雁對談，更是引起轟動。那些時候，香港人正在迎接九七回歸，心情複雜，我一直記住他對香港人的鼓勵：

- 重新認識和反省香港的殖民歷史
- 超越被動的徬徨，主動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會追隨陳映真，今天仍覺得與他親近，關切和憂心大陸的發展是重要的共同基礎。但是，香港已經回歸快廿年了，我親身經歷著大陸政權執行在戰後已定下的對待港澳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¹，為了所謂國家的發展和特權階級資本窗口的需要而鞏固發揚香港的地產金融霸業，使貧富愈來愈懸殊，政治權力繼續被壟斷。我站在與基層民眾共謀發展的位置上，是痛苦和憤怒的。有幸以《人間》為起點，我在重新認識和反省香港殖民歷史的過程中，找到

1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周南解密港澳回歸》 奠定回歸國際基礎〉，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摘自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3/0417/c85037-21168133.html>。

了自己的定位：我立基於香港的草根社區，與台灣的基進運動深刻結盟，同時與大陸的基層人民及相關團體發展連繫。這種不止於珍視自己腳下的本土，而能與他地相接連發展互為主體和進步團結，是解殖的重要根基。這是我的選擇，我將終其一生繼續為此努力和奮鬥。而我也想以此告慰我的陳老爸，願他安息。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懷念一個奮戰不懈的左翼戰士——陳映真 ◎金寶瑜

雖然知道陳映真臥病在床已經好多年，但是聽到他去世的消息，還是非常震驚和悲傷，為了這個勇敢的戰士離我們遠去而不捨，也不免會想到陳映真維護正義的精神和對民眾深度的關懷是否也會從此遠離我們？

陳映真和我是同輩，但是在多年前，他在左派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走在前面，記得他曾經說過早在一九六〇年代中蘇共論戰時，他就躲在被子裡聽中國廣播的《九評》。我覺得自己一直是跟著其他晚輩朋友被陳映真帶著走的。我說這話是誠心的，二〇一五年十月我回台灣時接受陳光興和他工作室人的訪問，這些年來，他們借用訪問的方式來整理台灣的左派歷史。因為接受訪問，我就去回想年輕時候我在台灣的生活。我這樣說：「從那一段我生活的環境來看，大多數一九五〇年代生活在台北的外省人，對台灣社會的各個階層幾乎完全沒有接觸，生活在台北，我的生活範圍極為狹隘，就是學校裡的幾個同學，往好處說是單純，但實際就是無知和愚昧。我跟陳映真和一些當時其他進步的年輕人是同輩，但是在思想的成熟上卻完全沒辦法與他們相比，落在他們後面太多了，他們的思想成熟，對社會上的一切觀察敏銳，對當時的各種議題都有批判的能力，而我一方面跟社會隔絕，再加上對女性來說，思想和行為上受傳統思想的束縛也比較深。」

一九五〇年代時台灣還沒發展「出口導向」的經濟，但是韓戰之後，台灣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對美國的全面依賴卻已經很清楚。我們那一代中多數的年輕人腦子裡除了硬塞進去的官方的禮、義、廉、恥的教條外，就是西方主流中最庸俗的文化。那時台北的年輕人好萊塢的電影看多了，男生迷於美國西部武打片裡的牛仔，女生則傾心於好萊塢愛情故事裡的俊男美女，我們的腦袋裡就裝了這些垃圾。記得一九七〇年代初時（我那時已經生活在美國，參加過讀書會，開始有了反省的能力），有一次在一個親戚家作客，那家的男主人（一九五〇年代從台灣出來的）跟他的兩個年幼的兒子說：「來，我們去地下室去玩 cowboy 殺印第安人的遊戲！」

他說得那麼自然，完全沒有意識到為什麼自己會如此認同美國西部牛仔。我心裡想，你跟印第安人有什麼深仇大恨呢？甚至要自己的兒子也去殺他們呢？

那時的陳映真早已看到這種殖民文化對台灣社會深遠的影響，他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必須要能認識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文化，才可能有獨立的思考和反省的能力，而且他不僅只是停留在認識的階段，卻是要從實踐中喚醒生活在台灣的年輕人，這就是為什麼他致力於發展台灣的鄉土文學。陳映真和幾個與他有共識的年輕人，像唐文標等提出對台灣當時的思想、文學、和藝術的批判，他們從分析台灣社會的性質來批判台灣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無自主性，並指出因為遺失了自己的文化，所以許多知識份子無條件地、膚淺地、沒有批判地接受了西方當時流行的文學和藝術。在樹立起鄉土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受到主流文人的排斥和污衊，但是他們並不退卻。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文學上和藝術上的建樹，他們的努力幫助了知識

份子解放思維，孕育了新的意識形態的發展。

我們都知道陳映真至誠的愛國情操，記得有一次聽他說他為自己能夠繼承中國的文化而感到幸運，但是他卻絕對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心懷寬大，同情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難的人，他堅決反對新舊殖民主義就是從對世界受壓迫的多數人的立場出發的。從他主辦的《人間》雜誌裡，可以看出他帶領著年輕人去調查台灣都市和農村每個角落的勤儉、忠厚，但是不常被人關注的工人、農民、漁民、礦工、和都市小販，也關心著生活艱苦的原住民。《人間》也深度關切台灣環境污染對人造成的傷害，反對台灣核電的使用。《人間》不僅對台灣的大眾關心，同時也關心世界各地受壓迫的人民和他們的反抗與鬥爭。在陳映真身上找不出絲毫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影子。陳映真對各國的大多數受苦人民的關心促使他與這些國家領導抗爭的左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我就是看了他對韓國運動的報導，而決定去韓國看看，並且去找他給我寫了介紹信。

陳映真除了在文學上的造詣外，他還不斷探討一個國家該如何發展它的經濟才可以造福這個國家的人民，我們可以從他寫的〈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評何新〉的文章中看出他在苦苦地思考這個問題。（《海峽評論》一九九一年第二期）他在文章中清晰地敘述了多數的亞洲國家如何在殖民地的欺壓下陷進了無法發展的陷阱，使它們的人民承受困苦和災難。在文章中陳映真肯定中國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後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枷鎖，在帝國主義長期封鎖下走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他更認為中國「自居於第三世界，堅稱反霸而不稱霸，對更貧困的國家

給予最無私的援助，這猶是中國昨日的生活和信念」。但是他說在改革開放之後，似乎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失去了這樣從第三世界看世界的視角，使陳映真痛心的是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美國、歐洲和日本用文化交流為藉口，對中國知識份子進行「高效率、精密的洗腦」，於是塑造了一批批和台灣一九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相似的「買辦菁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人民日報》出現了一篇何新與日本經濟學者矢吹晉對談的〈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陳映真有感而發寫了上面這篇評何新的文章，他說：「何新把一個社會的發展與不發展，突破了在一國之內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資本主義機制框架上，找到參考的角度。」

陳映真認為何新能夠從第三世界人民的觀點來分析一個落後國家不發展的原因，而這樣的觀點就是中國革命之後到改革開放之前一直堅持的觀點。在這不久之後，中國積極地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來發展加工出口的經濟，這個視野很快地又消失了。重讀陳映真這篇文章不得不聯想到，這十年來中國的一些向外發展的政策，包括由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借著「一帶一路」對外擴張的政策。官方為了這樣向外擴張的政策取得輿論上的支持，啟動了知識份子來為它找合理性，把這樣的發展說成是為了增強與第三世界的聯繫。但是我們必須認清當前中國的這些作為是為了擴張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影響力，而不是從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出發，這樣的政策和社會主義時代中國對待第三世界的政策有本質上的差別。

曹征路跟陳映真一樣是一位傑出的現實文學作家。陳映真看了曹征路寫的《那兒》後，讚

許說：「台灣產生不了像《那兒》的作品，也產生不了像曹征路這樣的作家。」《那兒》是寫一批在國家工廠工作的工人，在改革中廠子被迫出賣後所遭受的淒慘生活。的確，不管台灣的工人如何在「出口導向發展」中遭受到多少的剝削和不平的待遇，但是還是不能和許多大陸工人所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相比，不同的社會也就產生不同的現實文學作品。曹征路的文學作品很多，他在《曹征路文集——中短篇小說選》的自序中說，他寫小說的態度是忠實地把他經歷過的時代變遷紀錄下來。曹征路用他的筆真實地、深刻地記錄了中國大陸工人從主人變成奴隸的痛苦經歷。他不僅寫大陸的工人，他更生動地描寫了現今中國社會中各階級和各階層的思想狀況和生活動態。他用生動活潑的手筆描繪社會上層人生活的糜爛、道德的敗壞，這些人為了錢，為了權，不顧一切瘋狂地往上爬，包括最高學府中的那些高級知識份子，也都放棄了一切原則，為了爭名奪利而無所不為。他也描繪了社會底層人在生活上的掙扎，遠離家鄉的農民工，日以繼夜地超時工作，也僅是為了每月能給家裡寄回三、四百元，而一個有錢的老闆為了打發他的情婦，不惜花掉四百萬人民幣。

中國大陸的這些轉變都使得陳映真感到非常痛苦和失望，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他明確表示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失去中國自己曾有的視野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全盤接受外來的殖民意識形態。我們這些從認識中國革命和目睹社會主義建設成長起來的左派也同樣感到痛苦和失望。當初那麼多革命戰士為了國家、為了人民流血犧牲，幾十年後社會卻又回到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境地，迫使我們不得不去探討這樣變化後面的原因。中國經歷了幾

千年的封建制度，雖然解放後的土地改革將封建的物質基礎從土地裡連根拔了起來，但是在新建起來的意識形態裡卻無法根除遺留下來的封建成份。中國歷經百年帝國主義的侵略，解放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給中國人帶來自信和自豪，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就必須與世界資本主義接軌，從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依附也必然使沒有清除乾淨的買辦文化死灰復燃。這些還只是意識形態上問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上也存在各種問題，所以雖然幾十年來眼看著社會在後退，卻讓我們從這樣的變化中認識到創造並鞏固一個嶄新社會的困難，而這次的反覆應該說是不可避免的。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是一個永恆不變的真理。因為受壓迫的廣大群眾不斷反抗使得人類從奴隸時代進步到封建時代，再進步到資本主義時代，更進步到社會主義時代。我們雖然因為社會主義發展受到阻礙而痛苦和失望，但在此同時也看到資本主義持續不斷且越演越烈的危機，更進一步肯定只有共產主義才能解放人類。在資本主義矛盾廣泛擴張和深度發展下，民眾的反抗也一定會更進一步向前發展，在中國、在世界各地，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可望可及的。我們只要不放棄我們的理想，看清我們的方向，釐清我們的思想，不斷地、頑強地與邪惡的反動勢力鬥爭，陳映真的精神不但不會離我們遠去，而且在未來漫長坎坷的路上會與我們同在，不斷給我們支持，給我們鼓勵。



悼念陳映真詩三首

◎施善繼

(一) 二〇一六·十一·廿二 悲慟之日

傳來噩耗

我即刻準備動身啟程

前去參加你的告別式。

映真，

隔了十年不見，

這最後一面，

怎麼竟是出席哀戚悲慟的殯儀。

我將肅穆站立，

你已框置於遺像裡，

可望而不可及。

十年前，

自得悉你臥病北京時起，

幽隱的忐忑便開始在我的思緒間游移迷離。

呵，

麗娜漫長的艱辛，

日夜陪依。

當代台灣歷史苛刻的重軛，

馱負一生，

終於卸肩。

不得不然的逝去，

擱下病身，

交給塵土，

從此輕盈如紙鳶。

我不用再牽掛了，

你煥然翱翔於任意的天體，

星散的惦懷在我的念中匯聚。

(三)二〇一六·十二·一 別映真——北京八寶山

映真，你終於溘然

從十年又五十七天的病體

從我千絲萬縷的牽掛

在冬之北京靜靜遠去

你已經痊癒復原

穩健的步履穿越記憶往昔

綠島歲月囚禁的風雨，以及

從南勢角提著愛吃的油飯

牽著麗娜往北走

一步一步爬上四樓我家

相聚，聽《黃河》鋼琴協奏曲

我曾經告訴你最後樂章

如果沒有了東方紅與國際歌

我們便不聽，你欣然同意

(三)二一六·十二·廿二 等我——寄映真

甩開病體黑暗的蹂躪與跟

估計抵達天堂或地獄的岔口。

我的心懸著，百般放不下，

只見麗娜一人獨自慢慢走。

也許還不習慣這樣子的淵默

好好休息吧，閉上眼簾永遠——

你已經辦妥該辦的事，塵寰

隨它繼續荒誕、逆流、猥瑣……

骨灰的磷光不偏不倚對準我

招手，暗示著要不斷重讀

儲存在書架上孜孜不倦，你

一生為故鄉深鎖的濃霧發愁。

留下箴言絕筆不再寫作

我明確你在字裡行間等我。



悼念陳映真

◎胡清雅

我第一次讀到陳映真的書是在母親的書架上，那是一九七九年由遠景出版的《夜行貨車》，母親購於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出生前幾個月。我記得書的側頁印著黑黃的拇指印，而那列長而黑而強大的、開往南方的列車，在故事中曾三度出現，就在那幾行字的左方，深深地壓著黑藍色的原子筆所畫下的線。

第二次讀到陳映真，還是通過我的母親。母親習慣剪報，自從我認得字，她的剪報本便成為我的習慣讀物。陳映真的自序〈鞭子和提燈〉，被母親從《知識人的偏執》上覆印下來，裁剪、護貝，端正地夾在內頁。翻到這篇剪報的時候，我讀國三，當時我僅隱約感覺，這篇文章之所以觸動母親，或許是因為陳映真表述自己的父親、基督教、耶穌等等的方式，不同於一般的理解，彷彿為了來自於嘉義、父親早逝、承擔著兩個家庭經濟壓力，並為信仰所困惑的母親，提供了另一隻眼睛、另一種凝視。而當時的我，讀完文章後只有一個惶惶而訥然的疑問：「陸家大姊被帶去哪了？」

於我而言，這兩段與母親交疊的記憶，構成我最初對陳映真的模糊印象。青少年時期，我消遣地、零碎地閱讀一些被書商歸類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與其著作，很難說我是否特別喜歡陳映真，但若要問我還記得哪些讀過的東西，那麼是陳映真〈萬商帝君〉裡的林德旺。我

尤其記得他病假離開公司後，在延吉街上看到了一隻骯髒的流浪的外國狗的場景，他擔心著「那樣子滿臉滿嘴的毛，連眼睛都蓋住了，怎麼認路，怎麼走路？」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夜霧〉的結尾處，電話那端對著丁士魁說「丁老師，時代怎麼變，反共安全，任誰上台，都得靠我們」。我在聯合副刊上讀到〈夜霧〉。時值一九九〇年代末、二〇〇〇年代初，我是高中生，聯考的壓力把我隔離於那個正為政黨輪替所躁動的台灣社會。當時的我只覺得小說中的李清皓、丁士魁，以及那位被冤假錯的張明在消費主義大街上不合時宜的吶喊，似乎透露給我一個不同於眼前這個所謂「邁向民主」、一片光明，並為之沸騰的台灣社會的另一種面貌，那個面貌是被壓抑的、禁制的，而且並不為政黨輪替或所謂的轉型正義而翻轉。通過虛擬的小說，我隱隱感覺到這個面貌其實更貼近實像。

很久以後，我在研究所的新聞史課堂讀到《台灣大眾時報》，進而讀到陳芳明關於該報與相關人物、組織與那時的社會性質的評斷。出於懷疑，我讀了陳芳明與陳映真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論辯，更進而接觸到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辯。也由此，我在社會結構與理論的層次，認識到先為日本、後為美國所鉗錮「殖民地台灣」。理論家的陳映真，與我印象中的那位作家陳映真合一了，並且開啟我閱讀他的各種著作的慾望。我逐漸認識到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左翼思想，是與中國革命緊緊相連，原來一九三〇年代的台灣左翼更是中國的左翼，台灣的反殖民與中國的反帝運動原是一體的，唯有兩岸一體，才能解釋當時台灣共產黨的民族解放論述。我也才慢慢理解，在日本殖民時代結束之後，台灣在冷戰與內戰的雙重結構下展開了

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白色恐怖，而在美國冷戰體制的反共策略下，通過對於左翼的大規模鎮壓，施行低勞動權益、低人權、高環境成本的工業化政策。我也才連接到所謂的「現在」，也就是作為軍事獨裁發展主義政權的國民黨，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為美國所扶植的政治勢力所掌握繼而在二〇〇〇年被民進黨輪換下台，並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配合美國、西歐的資本全球化，以「自由化」、「民營化」、「國際化」之名，實行了公營企業的私有化、經濟的自由化與勞動彈性化政策，於是當前的青年人面臨著普遍的高學歷失業、非正規勞動成為常態。

可以說，閱讀陳映真的過程，是與閱讀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一起展開的，而我這樣的知識慾望，不能說是個人傾向，而是時代的緣故。八〇年代起台灣實行經濟自由化政策至今，勞動彈性化成為常態，加上高失業率、長工時、低工資……的普遍現象，在一九七〇年代形成的中產階級與其生活形態其實正在崩解。人心普遍不滿的狀態下，當前的台灣社會看似公民運動蓬勃，卻未能真正提出一個跳脫唯個人權益論、捍衛私有財產、質疑資本主義代議民主體制的社會藍圖，而所謂的政黨輪替看似完備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程序，但國、民兩黨所代表幾乎的同一的親美反共意識形態與親資的立場，以及總體來說越來越低的投票率，在在顯示出台灣民主孱弱的體質。在親美反共結構下，以中國為對立面所打造的台灣主體意識，則成為支撐美國介入干涉東亞事務的內部結構，而其現象，就是台灣社會當中越來越強烈的針對中國的排斥與歧視。雖然每場運動性質不同，但每當看到高舉著資產階級民主與人權觀的公民運動，高舉著進步旗幟號召公民上街，卻自動排除了那些非公民者，或者一些以反中為號召的各種實體或網路

言論操弄著歧視語言，我都不禁想起〈夜霧〉中李清皓的自白：「他們果而是猶太人，而我們竟是納粹的嗎？」

面對台灣社會的整體環境與社會氛圍，當前以英美資本主義先發社會為樣本所延伸的社會科學理論，其實是非常缺乏解釋力的，並不夠作為批判的武器。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陳映真所引介的社會性質論，為我這種幾乎與左翼／中國革命徹底斷裂的八零後青年，開啟了一個與革命歷史重新接軌的可能性。這條路徑，首先關乎對於一九八〇年代的重新檢視，也就是說，將一九八〇年代視為冷戰結構動搖的時機，經歷了白色恐怖的陳映真那一代人自主地承接了一九二〇年代以降的中國革命年代的精華，並通過一九八〇年代的社會變革而加以保存、發揚，我以為陳映真等人對於社會性質論的研究也是其一。無論這樣的努力多麼邊緣，對我們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中間物」的存在。在此不展開社會性質的相關討論，但我認為，陳映真的理論貢獻在於他承擔了接合的工作，並在參照南韓一九八〇年代社會性質論辯之後，企圖將理論向前推進。這份努力，使得作為中國革命理論傳統的社會性質論，不致於在一九八〇年代以降的台灣社會徹底缺席。雖然社會性質論並未得到社會科學界或思想界的迴響，並且與民眾運動主體脫節、成為純知識性的遺產，但作為後人，我們必須正視「脫節」的意義。這也是陳映真小說帶給我的提示：小說中各種圍繞著悲劇、無望、失敗、受挫的人們，是否提示我們一九八〇年代冷戰動搖、工運與社運蜂起，曾經被集結而起來的民眾，為什麼最後被新自由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所徹底收編？更進一步言，美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持續存在決定

性的影響，台灣仍然作為一定程度上的新殖民地，那麼當代的反殖民、祛殖民工作，該如何在知識上、思想上、實踐上展開？祛殖民，該是兩岸民眾「克服分斷」的結果，抑或是目的？「民族解放」是被當做理論，或是實踐？陳映真小說中那些外商公司的雇員、在消費主義掏空人的各種慾望的狀態下，既悻然又茫然度日的中產階級們，以及那些「理想主義受挫、失敗、是生活上的現實」的以失敗告終的民眾的反抗，對我而言，因著對於理論的認識，而顯得更加具體了。

我並沒有親身接觸過陳映真。他的政治、思想，以及用以承載其政治與思想的文學形式，在我人生的不同階段，以不同方式影響了我。作為一個不專業的文學讀者，陳映真最觸動我的地方，其實在於他通過文學，為「思想」保留了一個迴身的空間，例如〈夜霧〉的李清皓、〈六月裡的玫瑰花〉裡軍曹巴爾奈，例如〈上班族的一日〉當中對著鏡頭砸書的Rose，又或者，在〈鞭子和提燈〉裡頭那兩個思想家卻不之如何「歸鄉」的底層日本兵。他們並不是工具性的既定角色，而是市井小民、是底層勞動者、是貧窮的佃農、是中產階級，他們因為帝國的利益與矛盾，被放置到歷史的對立面，但卻同樣在民眾之中達到某種程度的包容與和解。小說所展現的社會現實裡，是如此廣大的人們構成了知識分子所謂的「民眾」，而對於民眾所帶有的階級性、傳統文化，以及他們所面對的社會矛盾，雖然他們的奮搏總是以失敗告終，但陳映真一方面嚴肅地描述他們的困境，另一方面卻在人格上彰顯他們堅強而頑強的存在。我想起林德旺那位總是不卑不亢的乩童姊姊，而作為姊姊神明主的帝君爺，最終竟成為失了根、崩潰的林德旺的精神庇蔭之處。陳映真描寫這些人物時總是帶著謹慎、謙卑與敬重，台灣的批判知識分子普遍缺乏這

份謙卑，這也使我在無形之中，彷彿親見到陳映真的人格。

也正因為我不認識陳映真，而且是在追求知識與理論的過程中找到他的，他對我的影響，或可以稍微普遍化於我這一代年出生於七〇年代末期、八〇年代初期的知識分子。現在回想起來，若說我通過這些作品而認識陳映真，不如說是他的寫作提供我一個理解我的父母、祖父母輩的媒介。我是因為讀了〈鄉村的教師〉，才稍微勾勒出我的爺爺的形象，那個來自於福建的記者，早年與哥哥共同響應了魯迅的新興木刻運動，來台後兩岸分斷，他竟躲過白色恐怖清洗，與台灣女子成家、於南女中任教了一輩子，終究沒能等到歸鄉的那一天，難怪爸爸回憶中的爺爺總是抑鬱地蹲在前院抽菸，爺爺算是一個倖存下來的陸家大姊吧。我也想起我的母親，她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台北的美商公司工作，而我作為女兒，是通過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系列，才終於間接揣摩到當年母親所面對的職場文化與各種矛盾、她的精神狀態的緣由，以及她與父親兩人所抱持的幾乎是幻象的中產階級夢。我想著，在一天工作的疲憊之餘、挺著七個月身孕的她，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心情，在那幾行駛往南方的夜行貨車的文字旁邊畫下標註線？對她而言，陳映真的文字是否曾經在她無助的時候，為她帶來安慰？而陳映真的小說，又在那個禁錮、壓抑的年代中，觸摸到多少喪志、受凌辱、悲傷、沮喪的人的心情？如果勞苦大眾們曾被陳映真的文字所撫觸、鼓勵，那麼以社會改造為己任的我們該思考的，是如何留住、發揚那個主體被提昇的瞬間，使個人的主體變化，能夠通過組織與運動，相互連結為更為強大的集體？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課題。

●但望此後憶念起你，不致羞慚——悼映真先生 ◎范振國

但，老唐啊！你的大去，又一度喚醒我們。時日無多，待收的莊稼 任他荒廢。對於這樣懶惰的自己，不禁感到羞恥了。老唐，安息吧！我們會好好地振作起來，努力工作，說什麼也不能讓你再為祖國擔憂啊……

——陳映真〈懷念唐文標〉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星期二，整日落雨，天候微涼。

下午十七時三十分鍾喬、曉榮先後來電告知：映真先生病逝北京的訊息。兩位老哥哥低抑滯重的聲音，聽來卻恍惚，很不真實。電話這端的我只「啊！」了一聲。電話那頭的鍾喬、老關竟也同樣是「下午三點左右……再聯繫」便掛了電話。我在樓梯口站了許久，忘了是要去臥室還是下樓。忽然感到口渴，於是下樓拿水杯。在餐廳轉來轉去的就是沒找著常日慣用的那隻。把餐桌當工作桌，正在繕打「綠色小組卅周年紀念活動」核銷文件的兒子，提醒我說：你的水杯不是放房間嗎？

我樓上樓下走了幾趟，終於在床頭櫃的書堆中找到了。喝了幾大口，心裡覺得空空的，想找人說話，撥電話給蔡明德，電話響了兩聲就接通了，「知道了……」蔡桑嗓音啞啞的，而我，

卻說不出話來……

晚餐的時間，手機不斷地有新訊息傳入的提醒，都是各地友人轉來媒體關於陳映真先生逝世的報導。我沒回訊，靜默的喝酒，間或有一搭沒一搭的和兒子說及與映真先生相處的點滴往事……

兒子很小的時候，或許才就讀幼兒園大班，還沒上小學的六、七歲吧，曾在鶯歌街上見過映真先生一面，此後雖無緣再親聆警效，然而，透過耳聞與閱讀，對「大頭阿伯」他卻有一分由衷的孺慕，而映真先生，在時空不定，偶爾一遇的場合，也總會問起小兒的近況，掛念著他的學業與健康，有時還會半是玩笑著對我說：「振國，你兒子將來要搞革命哦。」那時，我也只能無言的，傻傻地笑應著，並不確知他所謂「革命」的意旨究竟為何？

「反杜邦運動對我的生命而言是關鍵性的。如果不是參與反杜邦，我不會認識陳映真，不會有機會和他一起在人間雜誌工作，經由陳映真的薰陶教誨，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有了全然地翻轉。此後的半生，雖然過得清貧但是充滿自尊。」

——〈回憶那段「陸上行舟」的歲月〉

今年初，為兒子編纂採寫的口述史冊：《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三十周年紀錄文集》提供的回憶文章裡，我這樣寫道。而也就是在協助他編輯、審校文稿期間，隨著舊時記憶

的逐頁掀開，每每都會不自禁的想起：「如果沒有遇上陳映真，我的生命，不知會飄蕩放恣到甚麼境地？稟賦篤劣平庸的我，或許會終日過著與蟲豸無異的生活吧！」

「陳映真講過：魯迅對他的影響是命運性的。映真先生於我生命方向的抉擇，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在為蔡明德的攝影集《人間現場》寫的推薦文中，我藉著蔡桑的口說：

「……是大陳給了我這雙眼睛，去看世界；也是大陳給了我這顆心，讓我懂得去關心弱勢、不幸、受苦的人……」

——〈傷痛的明星花露水〉

而今，「心裡的那盞燈熄了……」我和兒子說，淚水不期然奪眶而出。

「爸，大頭阿伯的故去，你們曾經和他相處過的這一輩人的傷痛，我可以充分的理解，但是，就我而言，我却想和我的同儕說：當歷史的行列有了缺口，儘速的遞補上去才是正題，我們要扮演的是接下投槍的戰士，不是哀傷悲泣的送行者。也許你可以寫些你和大頭阿伯相處的故事，以為追念。雖然，你常跟我說：魯迅甚不喜寫悼念文章，參加追悼會。『因為追悼會辦完了……』魯迅說：『大家議論的盡是，誰的文章寫得好，誰的輓聯對子作得佳，烈士的精神都不被提了……』但是魯迅不也寫了〈淡淡的血痕〉、〈為了忘卻的紀念〉這樣沉痛哀傷，卻又令人感

發奮起的篇章嗎？！希望你能透過書寫撫慰悲痛，也希望經由你的文字，可以讓我們這輩人填

補一頁歷史的空白……」。用完餐，仍默默陪坐一旁的兒子，順手抽了兩張面紙，予我擤拭涕淚，如此安慰我說。這是自我母過世三年後，他第二次建議我用書寫，療傷止痛。於是……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四日，星期四，陰天。

午飯後，坐在電腦桌前，我遲拙的鍵打了以下的字句——

「潤物無聲——懷念映真先生」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

——魯迅《藤野先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陳映真先生病逝北京，消息一經媒體披露，台灣藝文界、讀書界、社運圈，各方人士，不分親疏遠近，是敵是友，都紛紛於平面媒體、網路媒體、臉書……撰寫追憶悼念的文章，其中真心低泣者有之，矯情乾嚎者有之，有人為映真先生，輕輕拂去歷史沾黏的塵埃，感念他的教導與提攜。有人繼續向他噴吐髒汙的唾沫，又言不由衷地肯定，他對一整個世代的影響貢獻。映真先生是在生前的中壯之年，即被徐復觀先生譽為「海峽東西第一人」，且在文學創作、思想理論、社會實踐，尤其胸襟器識，於台灣現、當代史，無論其上輩長者，其同儕，其下輩青年，俱無人能出其右的巨人，這種現象，發生在他身上，是不足為奇的。

面對眾聲齊喧，雜音四起的世態，想及杜甫的〈戲為六絕句〉：「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晒未休。爾曹與身俱泯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以及魯迅的〈戰士與蒼蠅〉：「有缺點的戰士，仍舊是戰士。再完美的蒼蠅，終究是蒼蠅。」有一種會心，也有無邊的喟嘆！

我素來拙於作文，尤其厭憎湊熱鬧、趕風潮的應景之作。而終竟也在先生大去之後的兩日，寫了如下這樣一篇「扶心自食」的文字，理由無他，只不過想藉它向世人吐露；映真先生如何以他的身教言教，將我這樣一個江湖浪蕩子，引導成為一個能夠心懷平等正義，關懷受苦不幸的人，以之見證他誓言：「……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熱絡起來，使彼此冷漠的社會，重新互相關懷；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使塵封的心，能夠重新去相信、希望、愛和感動，共同為了重新建造一個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的真誠追求。

一九七八年，我從新竹少年監獄學生隊，以高中補校同等學歷的資格，報考大學聯招。幸運地考取位於台中中國光路上的中興大學中文系。大一新文藝習作的課堂，擔任教席的黃燕德先生（筆名：碧竹。林義雄家宅血案發生後改用林雙不為文名。）推介了兩位被禁作家的人名與書名，金庸的《大漠英雄傳》，（解禁後正名《射鵬英雄傳》）。陳映真的《將軍族》。並且說映真先生是台灣當代唯一因其思想而坐牢的、極其優秀的小說家，在這學期的習作課程中是必讀的書目。

我便是在那日傍晚時分，騎著腳踏車往台中火車站附近的雙十路舊書攤，在紙張殘破泛黃

的雜亂書堆中花了些許時間翻找到了《將軍族》。薄薄的一本，遠景出版社出版，封面是一位青年在補鞋的油畫，繪畫者是吳耀忠。

而我之所以會如此刻意、專注去舊書攤查找《將軍族》，並非為它是課堂上指定的必讀書目，全然是因為少時獄囚的歲月，曾聽聞過牢中的大哥們說：此處也禁錮著一種很受敬重的身分。「他們連政府都敢反，膽識比我們這些只會打打殺殺的大太多了，這些傢伙，有時被稱為政治犯，有人也稱呼做思想犯、良心犯……」大哥們說：「他們的思想、人格都不是我們『矮騾子』能比的」。

買到書的那晚，睡前躺在學生宿舍的硬床上，捧讀《將軍族》，很快便被作者那奇特的文字風格所醞釀的情境吸引住了。驚異於故事的情節如此真實，真實到竟與我自身的經歷完全類同。當我讀到小瘦丫頭被與三角臉有著同樣口音的胖子弄瞎眼睛的時候，心裡不禁咒罵了一聲：「幹！老芋仔有好的，也有極壞的。我就是殺了這樣的外省老鴿才進去關的。」

一九七二年夏日某個午後，國中二年級，整日以廝混打鬧，拉幫結黨，白吃白喝為生活全部內容的我，翹課去學校附近的山坳子找玩伴，那裡因有陸軍營區駐紮，除了開設幾間彈子房、賣菸酒、日用零細的雜貨鋪，還有兩間主要是提供給營區軍士官調節身心體能的「暗房子」。我們這票小鬼，經常攜刀帶棍的嘯聚那兒，打架滋事，縱恣胡來。因此，當地營生的店家（多數是退伍的老士官長）對我們是很畏懼的。

那一日，哥兒們沒一個到，我獨自在彈子房敲了幾桿後，蹺到山腳邊一間磚造的屋間，客廳只一個姐姐低著頭，在手指甲上塗蔻丹。「老闖不在？沒有阿兵哥來啊？」我隨口說。伊低著頭，沒答應，過一會卻低聲地說：「我不想做了，我想回家……」。「不想做就不要做，要回家就回家，幹嘛這樣要死不活地唱哭調子！」我佯怒地和她這樣說。

伊是新竹尖石鄉泰雅族，長得高大豐腴，臉頰輪廓很深，眉眼清澈分明的美麗女子。伊是什麼時候來這間磚房服務客人的，我已毫無記憶，只知道我的哥兒們有好幾位，都曾在伊的肚皮上抽搦流汗過。我則因為年少還不知男女，不曾與伊交歡過，可對伊卻有一番說不清的情愫。平日無事來山坳子閒蕩巡狩，在和哥們敲完彈子胡鬧廝混後，往往會閒逛到伊的工作間，找伊隨意扯淡，日久月深和伊竟有了一種單純的姊弟之情。

「我不敢，身分證被老闖扣著，而且家裡欠他的錢也還沒還完……」伊幽幽地說。「囉嗦！不想做就不要做，想回去就回去，有事我負責！」我於是氣盛地要她收拾行囊，陪著她到客運站搭車。

當晚，另一角頭的兄弟就在街上捕獵我，摺話要我及時把人交回來，否則，一定讓我斷手斷腳。接著就是一連好幾場的火拼械鬥，雙方互有傷亡。然後，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我們七、八個鬥陣的，雇了兩輛計程車，上山把那兩間暗房子砸得稀巴爛，狠狠地在那外省老鴿肥胖的身軀上，落了兩記開山刀……

逃亡一年，一九七四年被捕。地方法院以動員戡亂時期，陸海空軍刑法八十四條，搶劫殺人，盜匪罪起訴，歷經三審，最高法院終以姑念年少無知，且頗知後悔，判處七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定讞。發交新竹少年監獄學生隊，執刑四年。因學業成績優異，一九七八年大學聯招前五日，假釋出獄。獄囚期間，唯一讀過的一本課外書是唐文標的《天國不是我們的》。

此後斷續地經由閱讀陳映真的其他作品，精神世界不自覺地寸寸改變。大學畢業、軍中退役，在台中一所私立高中教書的一九八五年，因著鍾喬的引介，在台中中國光路一家冰果室，傾聽映真先生講述何以要創辦《人間》的心志理想而感動不已。其後且以《人間雜誌》特約記者身份參與鹿港反杜邦運動，並在運動結束後應先生邀請，辭去教職，北上至雜誌社擔任執行編輯。在先生身邊工作的時日，承蒙先生無比寬厚、不倦的薰陶教誨，擴大了心胸視野，確立了世界觀與生命價值。

敘過與映真先生結緣的過程，以下我要向映真先生傾訴聞知他過世後的哀思。

十一月廿五日早上八點多，林哲元自北京來電，轉達了麗娜嫂希望曾經和您一同工作過的《人間》同事，盡可能到北京送您最後一程的意思。我選擇在十一月廿九日，您頭七那天出發。行李極簡，幾件換洗、禦寒衣物，一本托爾斯泰的《復活》。從書架取下它時，我想的不是要在飛機上，重溫一部關於靈魂在罪惡中甦醒的巨作，以打發無聊，我將它放入行囊，純粹為了書名這兩個字。我祈禱到北京時，能如經上所言之：「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天快亮的時候……」，聽到抹大拉的馬利亞告訴我：神蹟顯現！

到北京後住進接待單位安排的，鄰近朝陽醫院門診大樓的宜必思酒店時，已近十九時。麗娜嫂家人先我們一步，我推開旋轉門進入旅店大廳，見到高大的麗娜嫂眼眶含淚，輕輕撫拍緊擁著她的白髮蒼蒼的母親。麗娜嫂的么妹、小弟，從美國趕來的您的妹妹映紅，及弟媳（四陳的妻子）乾妹，圍站在一旁掩袖低泣。

置放行李後，下樓在大廳集合，等候接待人員領我們去晚餐的空檔，我踱步至近旁的朝陽醫院，隱沒在黑暗中的不同樓層的窗口，透出微弱慘白的燈光，望著空蕩的門診大樓前庭，想著麗娜嫂就在這裡的某一間病房，獨自陪伴昏睡不醒的您，十年、三六〇〇多個晨昏，那是怎樣的日年年啊！我忽而憶起您要來北京前的某一天找我談話，在交代完應辦的公、私事項後，您竟以十分靦腆地口吻對我說：「振國啊，告訴你一個很丟臉的秘密，我這生雖然沒有甚麼了不起的成就，但自認也做了些有意思的事。強權的壓迫、論敵的譏謗，聲名毀譽，財貨得失，我真的不在乎。一個信奉歷史唯物主義的人，當然理解，生死壽夭，是自然的規律，一點都不要強求。但活到這把年紀，心裡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是你嫂子……」

您們夫妻情深，且無子嗣，而今您驟然離去，麗娜嫂那如深淵般的孤單寂寞要如何填補呢？走回酒店的路上，我這樣戚然的想著。那時北京室外溫度，約莫零下四攝氏度，夜色墨黑，街道罕見人行。一股寒冽割心而過。

十二月一日，星期四。晴暖。室外溫度四攝氏度。

冬陽淡淡的早晨，八時三十分，和來自台灣、海外、大陸內地組合的悼唁團，從住宿的酒店門口，乘巴士往城郊的八寶山殯葬館向您告別。告別式會場布置得十分肅穆莊嚴，入口正門

是黑底白字的橫幅，左右垂掛一對長句輓聯。

〈沉痛悼念陳映真先生〉

「映照寶島河山執如椽巨筆揮灑文學天地鐫刻人間春秋成就青史功名」

「真愛中華民族奉鑠金年華力推祖國統一激揚世上日月鑄造千古偉業」

十時三十分，告別式正式舉行。此間的葬儀簡單而崇隆。中央領導人親赴現場悼唁往者，勸慰生者後，即行離去，接著是親朋好友、故舊知交，或雖未曾謀面但景慕其人格風範的民眾，列隊至靈前鞠躬、獻花、繞棺瞻仰遺容。少了唸誦祭文弔辭、佛道法事的繁瑣，因而可以充分傳達致祭者真切的哀思。

我與關曉榮和一名並不相識的中年男子，並列肅立於你的棺柩之前。靈堂大廳兩側，是各機關單位致祭的花圈花籃鋪成的白色花海。你躺臥在大廳中央，棺前擺立著兩個小花圈，披垂的白絲條綴分別寫著「永善安息吧！」「咪兒永遠愛你……」

（咪兒是麗娜嫂的小名嗎？）

棺木後方的花臺鋪滿黃菊，心型圖案的正中上方，懸掛著據說是郭力昕給您拍的黑白肖像，圓領毛線衣，修短適中的髮式，雙眉微鎖，俊美的容顏中，透露有微微的憂愁。廳堂內重複撥放著，您朗讀自撰小說《鈴璫花》的錄音。低沉渾厚的嗓音，迴盪空中，把我的心思牽得好遠

好遠……

我們向您深深鞠躬，獻上一束白色玫瑰，緩步走近您的身旁看您。頭戴黑色列寧帽，還尚豐腴的臉頰，敷著薄薄的粉，是化妝的緣故吧？您的面容泛著淺淡的肉紅，闔著眼，睡得很沉，很安詳。只是緊抿著雙唇，顯得有些嚴肅，不似慣見的和悅溫婉。繞過棺柩趨前向站在親眷答禮區的麗娜嫂致哀，與中陳（映朝）無言緊握，我們都感到彼此雙手的冰冷。這時，耳際響起您的讀誦：

曾義順在茅草地上向著疾馳的火車跳躍著，大聲地叫嚷。當火車駛遠，阿順忽而默默地目送著它遠去，臉上掛著一層的寂寥依戀。

「阿助，我問你。」曾益順忽然說。

「嗯。」

「阿助。如果高東茂老師在火車上，他會看見我們——嗎？」

「不知道。」我沉思著說，「我不知道。」

我確實不知道。有誰知道呢？

聽著，「吭隆！吭隆！吭隆！滾動的越行越遠……」編輯為烘托小說情境錄製的火車輪聲，一股哀傷突然兇猛的湧上喉頭，我以手掩口，壓制難抑的嚎泣，快步走出靈堂。在邊間親友休

息室的角落擤拭涕淚，尋一張座椅閉目調勻呼吸，腦海裡一直浮現你臥在棺木裡的身影。我於是無端想起，您描寫生發伯彌留之際的字句：

如今他一心等著歸去，他想起少壯的時候，自己撐著山裡的木材編成的木筏，駛出山澗，駛向多霧的淡水河，駛過煙雨的村落，駛向清冽而朦朧的前程——或許他要歸去的，正就是那煙霧的遠地，凜冽而且濛朧的，只是他不再撐著木筏，他要撐著發亮的、上好的檜木船……

——陳映真〈死者〉

噢，淡水河……記得您曾經和我們說過：一九六〇年初，中、蘇兩國，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展開針鋒相對的激辯。斯時，在思想上已然進入「不讓即使父母朋友察覺到的豹變」的還是青壯之年的您，每日攜著掌大的收音機，在淡水海邊收聽短波廣播，熱切關注論戰的發展，為社會主義陣營可能的分裂充滿憂慮。而今，您要歸去的還是那一片煙霧籠罩的遠地嗎？我這樣茫漠的想著……

不久，台灣悼唁團的人來招呼，集台隊伍再次進場，說是要在您的靈前獻唱安息歌。十人一排，約莫五、六排吧？頌唱由前列一名女性領起：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著血照亮的路，

我們繼續往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我位在隊列中間，垂首合十，無法開口。一則固因哀痛猶在，毫無歌興；再則確實感到，歌詞中除了「民族的光榮」您可以當之無愧外，其餘所述，與您的生命情境，其實並不相稱。我當然真切的願您安息，可我竟有資格稱您為同志嗎？恐怕連當您的學生都不配吧！我竟可以厚顏要您別再為祖國擔憂嗎？改革開放卅年以來，大陸社會日益向資本傾斜的發展，富裕強大的背後，人與環境受到的傷害，日勝一日。您教我們要在「飽食、腐敗、奢侈、冷酷、炫麗、幸福的」背後，照見「環境的破壞、人的傷痕、文化失據……」的後街視角，目睹著顯而可見、社會矛盾日益劇烈拉大的，您心心繫念的祖國，我竟膽敢要您，別再為她擔憂嗎？

近年來，我戴著老花眼鏡，讀著中國大陸的一些變化，不時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擔心。不為別的，我只是關心：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一九八三年，您在小說〈山路〉中，透過蔡千惠的口，提出這樣的質問。

時距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作為新時期基本國策。一九七九年農村開始實施「分田包產到戶」。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試辦經濟特區。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決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至多不超過五年。

「對於大陸開放改革後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有越來越深切的不滿。但他認為這是民族內部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從來和反對外力干預，實現民族團結與統一不產生矛盾。」您這樣明白的表示。

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時任中共黨總書記的江澤民，在慶祝建黨八〇周年的大會上，提出允許私營企業主（資本家）入黨的講話。「此語一出，引起了中國與國際各界的注目，咸認這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中國的資產階級莫不歡欣鼓舞，……不少忠實的中共黨員則為此憂憤不已，上書慷慨陳詞：……」杜繼平在以「王哲」為筆名的文章如此寫道。為此，您也即時在二〇〇一年秋冬合集的《思想與創作叢刊》組織了，包括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的諫文及四篇台灣思想界論文的特輯：《因為是祖國的緣故：……》。除了用石家駒的筆名撰述〈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長文，表達對改革開放後，大陸社會經濟性質顯然異變的憂慮，同時也不忘提醒左派的朋友，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如何評比社會主義制度，已無參照標準的當今世界，……在怎樣認識和評斷：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社會，仍有一些社會主義的成分，

例如，重化工業、國防工業、高科技研發與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關係，如何評價『扶貧』工作的一些成效，如何評價土地國有制下公共設施的優質發展，如何評價其他第三世界所難有的政治、外交、工業，科技相當程度的自主獨立性？」等諸問題還缺乏明確回答之前，切莫因其「變修」而抗拒、否定、甚至反對民族的融合統一。您為這專題寫的按語是：

「一九八〇年，大陸開放改革的政策登場後海內外台灣左派統一派初現分歧，開始就改革路線左乎？右乎？問題陷入苦悶。今年七一講話後，這個苦悶更形悒積。

事實上，大陸上關於開放改革的爭議，比台灣激烈的多。……台灣雖因民族尚未統一，迢隔海外，但地理與政治的隔閡不應該隔絕兩岸文化思想的交集，甚至應該就兩岸共同關心的思想文化課題互相論說甚至爭鋒，藉以使兩岸進步知識分子先克服民族分裂的限制，在激論中分享民族共同的思想與文化課題，在思想與文化中先完成民族的統一。……我們深切關心中國社會主義的走向，關心開放改革在社會生產方式和階級關係上帶來的重大變化，關心大陸思想、文化、意識形態與社會巨變相應的豹變，關心中國共產黨和新興工資工人階級和新興資產階級的關係。

我們如此關心，原因只有一個，因為大陸是我們的祖國的緣故……」

而今，面對社會矛盾明顯越趨激化，甚而有可能從人民內部轉為敵我矛盾的大陸社會，我

竟可以謊稱要您別再為她擔憂嗎？

「你流著血照亮的路，我們繼續往前走。」更是讓我羞愧得難以啟齒，您確實曾流著血，照亮一條道路，指引我們前行的。您在青壯之齡，即因思想闖入強權的禁區而被流放離島，禁錮七年。遠行歸來，不但沒有停止創作，陸續發表了〈賀大哥〉、〈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等，揭露美帝國主義在越戰中的非人暴行，批判以利潤追逐為最高原則的跨國企業，對後發展國家的社會、文化乃至人性，造成極度扭曲的，在思想上、美學上都堪稱經典的小說。並且積極投入《夏潮》雜誌的編寫。以敏銳的視角，犀利的筆鋒，從曠觀世界的格局議論時事。在膚淺喧鬧，一島之見的黨外政論之外，啟發了大眾從政治經濟的結構解剖社會壓迫根源的眼界。您掀起的「鄉土文學論戰」、「台灣結與中國結」、「第三世界或台灣獨特的文學體性論」、「台灣新殖民地扈從邊陲性質的依賴理論」論爭，無論思維邏輯的一貫或者論證的嚴謹周密，都給此間的讀書界、思想界樹立了典範。一九八五年，為了籌辦《人間》雜誌，您不惜抵押僅有的家宅，並以無比的寬厚耐心，帶領散漫放蕩的一群憤青，循循諄諄的，讓我們換了一雙新的眼睛、一副柔軟的心腸，讓原本於世事懵懂無知的我們，也漸漸能從彼顛倒的世界，學會關心弱小、受欺壓的、不幸的人。雜誌最終因無法負荷財務虧損而停刊。在您調教下，雜誌停刊前後，離職的同事都能獲各傳播企業主事者的賞識，位居高層，享有高薪。可沒人知道你身背多沉重的負債，如何度過清貧困苦。

雜誌停刊不到三年吧？一九九二（三？）年，您又再次奮袂而起，在潮州街一棟違章加蓋的舊陋的頂樓，獨自承擔出版的各種繁雜事務。在人力、財力均極艱困的條件下，獨立完成了涵括社會發展、進步人物、文學思潮在內的台灣史系列，以及批判美帝國主義敗德本質，發揚中國人愛國主義、國際主義並俱的論叢。特別是不計盈虧，為這個社會留下了《春雷聲聲》（一卷）、《春雷之後》（三卷）四巨冊，保鈞運動最完整的史料。以及七卷由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段承璞《台灣戰後經濟》、陳玉璽《台灣的依附型發展》……諸位進步學者的著作構成的《台灣政治經濟學叢刊》。提供了意欲投身社會變革的各界人士，在進行台灣社會性質分析時，不可或缺參考。

出版社維持了約莫十年，終因家人龐大債務牽累，唯一的住屋也遭財稅機關查封，您一生為之奮鬥的這個島嶼，竟已無您棲身之所。只得暫赴北京人民大學客座，緩衝一段時日之後，再徐謀台灣安家事宜，您心裡是這樣設想的。記得赴北京前您還吩咐說：「把攤子顧好，我很快就回來和你一起工作。」

也許是南方人不適應北方天候的緣故，您到北京不久，就傳來二度中風，情況危急，住院搶救的消息。此後，關於您病情的音訊，就從斷斷續續而漸次稀疏而全然斷絕……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媒體發布消息，我知道從此不需要再探詢：「大陳情況好嗎？」不須再為你的病況憂心了……

我在隊列中，垂首合十。聽著女性領唱人，嘹亮一如專業合唱團的美聲歌喉，心緒思緒，兩皆紛亂地想著：是啊！您這一生真如魯迅所言：「像是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

是血……」，「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而那些曾經吸吮過你奶血，才得以長得身高影大之輩，有的佔據學術殿堂，有的身居政壇要津，有的在藝文界享有宗師盛名。他們對於你流著血，照亮的路，卻或走進了歧途，或走到了相對反的方向。而一些自誓追隨您腳蹤的人，也走得顛躓蹣跚……您生前極力推動的「左翼統一運動」也在帝國主義勢力蓄意撥弄，兩岸社會日益偏離軌道發展的情勢中，被嚴重邊緣化、孤立化。您奉獻全幅心血，亟欲克服海峽分斷，重回民族母親懷抱的心願，竟讓一些反動文痞，乃至您青年時期在文藝刊物締交的同仁友好，取為笑柄，極盡諷諷！

真是不堪啊！站在您的靈前，我因自身長年來，在生活實踐上的怠惰、無能，感到深深的羞恥……

「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我一度也試圖隨眾跟唱，然而，張開嘴，悽慘無言！喪儀進行約一小時，十一時三十分許，麗娜嫂端捧著您的肖像，步履沉穩的走出告別式會場，低矮著高大的身軀，坐進運載您棺柩的車輛前座，淚光清晰可見。我靜立一旁，目送著靈車緩緩駛去……心裡默默地念禱：「嫂子，此後一定要更勇敢，更堅強地生活下去啊！」

陽關三疊，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

當晚，在住宿的酒店，喝了很多的酒，雙腿發軟，無法站立，蔡明德攙扶我回房。昏睡醉鄉，無思無夢。

十二月二日，近午，酒醒

盥洗後，與蔡明德、林柏樑在酒店附近的餐廳用完午膳。三點一刻，三人搭計程車去使館區，悼念十一月廿五日逝世，享壽九〇的古巴人民領袖卡斯特羅。我們到時，古巴大使館門外已有十數人在排隊等候，老中青都有。我心想，會來這裡的，必定有某種共通的語言吧！於是一下車便主動趨前攀談，經由簡短的相互介紹，知道他（她）們分屬於大陸左翼不同團體，紅歌會、毛澤東旗幟網，有的積極推動反美國孟山都公司的轉基因作物，有的是投身貧困農村從事鄉建扶貧、公共醫療的志工。他（她）們也知道《人間》雜誌的陳映真和他反分離主義的左翼立場。

「不簡單，在台灣那種環境，還可以這樣堅持，勇於鬥爭。陳映真不簡單！」一位髮色銀白，身形瘦小的大姊，在知曉我們是專程來北京給您送行之後，如是讚賞地說。他（她）們於是空出隊伍的前列，熱情邀我們一同入館。古巴大使館室內空間不大，裝設亦簡單素樸。進門右邊的追悼室，一側擺立著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以及總理李克強、政協主席俞正聲、人大委員長……等中央各部會領導人致奠的花籃花圈，一側的牆上懸掛著咖啡色相框裝裱，約莫菊八開大小的，卡斯特羅頭戴軍帽，身著軍裝，後背野戰背包，左肩朝天挺立的長槍已上了刺刀，正待出征的黑白照片。照片下有一方桌，上置一深藍封皮的簿冊，供來悼念者簽名留言。我們在館內待的時間不長，在卡斯特羅戰士像前行過鞠躬禮之後，相繼走出使館。分手前，圍站在大使館牆邊的紅磚人行道上，約略交換了兩地左翼實踐的概況與處境。「無論時局如何艱困，讓兩岸的左翼相互攜手，以同志的情誼，持續為社會主義事業，為人類解放事業，不懈奮鬥！來，大家

合個影，以誌不忘。」一位壯碩的中年男性，聲音爽朗地提議。拍完照，互道珍重，揮手而別。冬天，夜色降臨的早。不到十八時，街燈已一盞一盞的亮起。看著這群人數雖少但信念如此堅定，鬥志依舊昂揚的背影，在送您遠去而確然感到挽回一個時代終結的傷懷中，多少也升起了一股奮進的意思。

十二月五日，傍晚回到台灣。

廿一時，返抵家門。隨即接到《批判與再造》總編輯杜繼平的電郵，傳達了想為您舉辦追悼會的意思。並邀我參與籌備的工作。

杜繼平說：「由於中共實行走資路線，思想宣傳的主調已由社會主義轉換為中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故不論是對林書揚或大陳的過世也就必然只強調他們的愛國意識，隱蔽了他們的社會主義立場，從而無法完整呈現他們思想的全貌。所以在北京時我與老關、振國談起想辦一場從左翼立場、觀點悼念大陳的追思會，以闡發大陳的左翼思想，目的在重現大陳的左翼思想與精神，特別是希望讓青年一輩對大陳的思想有更深刻的認識，進而擴大、推進左翼統一派的影響與力量。因此我構想的追悼會是在情感上的追念外，更著重在理性的思考反思大陳一生奮鬥的歷史意義，啟發更多青年人起而應戰日益惡化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整體危機。」

我回信老杜，贊同追悼會的旨趣，主動承擔繁雜的行政執行。接著，關曉榮、鍾喬、蔡明德、鍾秀梅……也先後表達極願協同工作的態度。

隨著時日的逼近，工作自必愈加繁瑣，沉重的壓力難免讓成員間偶生齟齬，但爭歸爭，同志們終究能為了將活動辦好，放棄執見，服從紀律，團結攜手。久違的精神態度，讓我感動。我因而在討論工作事務的閒暇，抄錄了一九九三年您悼念王菲林故世一年之後的一段文字，寄給工作組的夥伴。

作為一個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形象的思考和表現歷史、社會和生活的典型，形象的思考和表現這典型歷史和生活中的典型的人，是他專心致志的工作和鬥爭。菲林應該更專注，以更大的勞動，拍出思想比較深刻，藝術上比較好的紀錄片、劇情片，寫出詩歌小說或者雜文。只有這樣，菲林的創作和思想，才能在他生前逝世後，都發揮出激起千萬人的共鳴，讓千萬人的思想為之飛躍，迎向幸福與公平的生活的作用。

把具體的創作、學習、黨建、辦雜誌……做得扎實、有創意、認真、完善……

如果菲林能再起於九泉，我想他一定會這樣勸勉他的朋友。

如果朋友們沒有認識到這些，想必是菲林的飲恨，一旦死神乍然來訪，在我們的身後，依然不免於留下一樣或不一樣的片段、零細、散亂，方向和交集喪失的工作……。

如果我們能從這飲恨中學習，對於菲林的英靈，有什麼慰藉比這更大呢？

——陳映真《飲恨與慰藉》

我懷著懇切的祈求和同志們說：請把這段話當作是您對我們的叮囑！今後確實把具體的創作、學習、黨建、辦雜誌……

做得扎實、有創意、認真、完善……有朝一日讓我們的努力能在您逝後，繼續發揮出激起千萬人的共鳴，讓千萬人的思想為之飛躍，迎向幸福與公平的生活的作用。

讓我們在團結的工作中撫慰您離去的哀傷，

讓我們穩健的踏上您的未竟之路，

讓我們此後憶念起您，不致感到羞慚……

而此刻您是否，正划向那凜冽而朦朧的旅途呢？我最敬重的大陳……



「人間」路上，送別陳映真

◎倪慧如

陳映真走了，帶著心上無法癒合的傷口，他戀戀不捨地走了。最後十年，映真再度入獄，這次的獄卒不是曾經關過他七年的國民黨，而是他自己的軀體。無法說話，不能提筆，只能轉動一汪淚水中的眼珠，忍痛情感思維和身體的禁錮，熬下去，無非是期盼科技奇蹟開啟監牢的那一天，想為人間再盡一點心力。

認識陳映真是從他的小說和評論文章開始，而與他面對面相會，卻是經由西班牙內戰這個題目。這場震撼世界良心的內戰，始於一九三六年，曾經吸引了四萬多位來自五十四個國家的志願者，去幫助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斯。而寧遠和我很幸運地發現還有中國人志願參加，於是把寫成的幾篇稿子和照片帶給《人間》雜誌，陳映真歡喜收下，於一九八九年二月登出（*NO Pasaran!*）（不許法西斯通過）特輯。映真為了保護我們，還為我們的文章編出幾個筆名。

到了二〇〇〇年，我們研究中國人參加西班牙內戰的歷史到了一段落，寫成《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書稿。映真對這段世界理想主義的歷史非常喜愛，花時間和我一起挑選照片，那張山東大漢劉景田在戰場抬傷兵的照片，經他美工修飾，成了一張搶眼的書皮封面，二〇〇一年人間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

這個冷門的題目，乍看下，是一場西班牙的戰爭，似乎跟當年台灣轟轟烈烈的黨外運動和

社會運動沒有什麼相干，而映真卻看到歷史貫穿下的理想主義的聯接，為了正義，不顧一切地衝上前去，不計任何代價，甚至是自己的性命；而三〇年代那批自願奔赴西班牙參戰的異鄉人，更拓寬了理想主義的視野，超越種族和國界，活出四海一家的願景。

思想陳映真，便想起他待人的敦厚樸實、他震撼心靈的小說、和他堅持的理想主義精神。一九八二年他在《雄獅美術》寫過一篇〈如果我能從頭來過……〉，這樣勉勵自己：「為藝術長時期辛勤、勞苦、堅忍地工作，不為暴至的虛名和金錢利益改變志節，也不為長久的寂寞稍受挫折；盡最大的才能和體力，創作出鼓舞被挫敗的人，安慰受侮辱的人，振起失去勇氣的人，並且為光明、幸福與公理高歌——這樣一種藝術作品，使我們民族和人類全體的心靈，更加的豐盛……。」

這正是他創辦《人間》雜誌、人間出版社的初衷。這番理想主義的精神和行動，曾經影響了幾代的台灣青年。

映真過世後第二天，新北市依然下著雨，我來到當地市立圖書館七樓看《人間》特展。這是國家人權博物館和圖書館聯合主辦，從八月底就在此展出。一個巨大的陳映真半身像迎接著訪客，來看這一方透明玻璃屋的展覽。玻璃上裡裡外外貼滿了《人間》的圖片：原住民，勞工，婦幼，環保以及當年手工排版的印刷底板「網陽片」，屋內是成排的人間雜誌合訂本全集和陳映真全集，一面電視螢幕上，《人間》同仁訴說著人間的故事。我駐留了一個上午，捨不得離開。

在特展張貼的總言，這樣介紹陳映真和《人間》雜誌：「陳映真先生是文學家、社會運動家、也是政治受難者，他所創辦的《人間》雜誌在台灣文化和社會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面對全世界，胸懷兩岸，以黎民百姓的福祉，美麗乾淨的家園，為終身奮鬥的目標。」

總言結尾寫道：「回顧了卅年前重大的社會人權事件，反映《人間》雜誌推動社會進步的種種努力。即使到了今日，最近的反核運動，文化工作者齊柏林所拍攝的《看見台灣》記錄片，以及大陸記者柴靜製作《穹頂之下》，均反映了自然遭到工業破壞的事實和憂慮，這些持續性的問題，甚至於勞工人權問題不斷披露，更印證了卅年前，陳映真和《人間》雜誌所扮演的先驅者角色。」

映真的遠見，不止於此，他的筆鋒更直指污染人心和環境的源頭——跨國資本企業。一九七五年出獄後，即寫出《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等作品，憂心在跨國資本的誘惑和掌控下，人心異化，人將淪為消費文化的動物，湮滅了自己的歷史，成為跨國資本政經爭奪戰裡的一顆棋子。

映真擔憂跨國資本獵取人心的技倆，如果沒有自覺的警惕，連政治犯家庭也不能倖免。在小說〈趙南棟〉（一九八七）裡，映真描述政治犯的兒子趙南棟的哥哥在一家跨國藥廠當經理，在業績和利潤的盲目追求下，「他的少年時代對進德修業的生命情境的嚮往，於今竟已隨著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中，崩解淨盡了。」而在他的呵護溺愛下，弟弟趙南棟「讓身體帶著過活」，吸膠沉淪了。

那麼摸索社會主義實驗的彼岸，能否抗拒跨國資本無孔不入的侵蝕？一九八二年映真在小

說〈萬商帝君〉裡，藉由 Albert 教授這麼預言：「不消多久，我們多國籍萬能公司的萬能的管理者的巧思，將逐步把中共資本主義化。……我來此知道台灣有一句話：『反攻大陸』。先生們，我認為這完全是可能的——不是用戰士的生命和昂貴的鎗，而是用我們多國籍企業高度的行銷技巧、多樣、迷人的商品。」

海峽兩岸如此，世界亦然。即將登基美國總統寶座的億萬富商唐納·川普，早在卅四年前映真就為他這樣的人取了一個貼身的封號：萬商帝君。

多年來，華爾街的跨國資本金融體系，扶植蔘養代議士，推行為跨國資本家謀取暴利的政經、文化和戰爭，大肆榨取第三世界的資源和勞動力。二〇〇八年美國金融海嘯，房屋泡沫，失業屢疊，貧富鉅差，敲響了資本主義的警鐘。美國夢碎，民怨四起。始作俑者正是像川普這樣跨國資本貪婪無止的壓榨，而川普卻下賭行銷，將它歸咎於移民槍飯碗，痛批商稅過高、環保太嚴，以至於企業出走國外。在「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商標下，萬商川普，拋棄代議士，親自出馬競選美國總統，居然成功地拐騙民主，成為直接駕馭美國的帝君。

如果映真在世，定會大聲疾呼。同樣面臨經濟蕭條，一九三〇年代德國人民推崇納粹黨，期望重振國威，希特勒出任總理，發動了二次大戰的浩劫；而今，為了重圓美國夢，美國人民選出萬商帝君川普為總統，這個唯利是圖的萬商、高傲偏見的帝君，將會對人類和地球做出如何不可逆轉的致命傷害呢？

就在這個濕冷的冬天，映真走了，留下了他一生為了構築公平正義的人間所撰寫的作品、

所踏過的腳印，也留下了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實驗的焦慮。多少來自世界各地的理想青年曾經放棄一切來到貧窮的中國，參加建設社會主義新世界，也是映真心目中「曾是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改造自己社會的『參照』對象」（〈樂園：渴望的與失去的〉，二〇〇一）。他憂心在中國開放改革體制下出現的社會矛盾，「社會主義公有體制的經營和管理如何受到資本主義積累規律的左右。」映真不願意失去他渴望的樂園，那不僅「因為是祖國的緣故」，更是為了全世界被踐踏的人被摧殘的地球。他深切期待活著的人，認真地分析批判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摸索出一條可行的社會主義新模式。

送別映真，在這個濕冷的冬天。沒有陷入深沉酣睡的人們，仍然能夠感受到映真對受苦人間摯愛的溫暖，和他對人間大我的堅信，給活著的人帶來生的勇氣和希望。

● 恨晚成了雋永——緬懷陳映真 ◎梅丁衍

一九七六年陳映真創辦《夏潮》雜誌時，我還是一個懵懂的美術系大學生，何況當時社會的文學與美術一直處在兩條平行線上。美術圈雖一度吹起「鄉土寫實」風，但由於我個人對「技巧性」寫實主題難以苟同，所以自學生期到服役退伍，約三年的光景我都在思索所謂的「現代主義」，而一九八五年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時，我已赴紐約求學，這就是我指的「恨晚」。

用「恨晚」一詞，另有兩個含意：其一是由於台灣美術教育一直偏重「寫實」，但這個「寫實」是承襲日治時期的種繪畫基礎教育，前輩畫家認為，若未具備此條件，就沒有資格當畫家。然而，這種寫實精神與陳映真所信仰的「現實主義寫實」有很大的差別。換個角度說，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後，三〇年代在中國大陸發展的左翼「新現實主義」文藝理念，在台灣實施戒嚴後就被趕盡殺絕，於是，帶有「人道關懷」的寫實就由日治時期的「習作寫實」所收編，久之，就停留在技巧的琢磨。吊詭的是，當時國府積極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乃至於西方的「現代繪畫」也受到約制，這使得「帝展」的美術風格更強化了寫實基礎的正當性。其二，是七〇年末陳映真出獄後所鼓吹重返現實主義的文藝理念，這在思想戒嚴期仍屬於「地下」文藝活動，換句話說，如果「五四」精神是中國文化迎接現代主義的一種激進態度（嚮往德先生與賽先生），那麼，三〇年代魯迅鼓倡的「新現實主義」當然也屬於「現代主義」的脈絡（表現主義木刻版

畫是現代美術的一個派別）。因此，一九四五年光復初期大陸木刻版畫引入台灣之際，這個原本屬於表現主義的木刻版畫，其實在八年抗戰期間，已從德國表現主義轉向為蘇俄共產主義的現實主義（高爾基現實主義），而這「寫實主義」轉變的歷程，在戰後初期台灣複雜的環境中，被刻意地抹滅。也就是說，當陳映真期待《夏潮》雜誌銜續這個文藝史的斷層時，它對應於冷戰結構下的「美式」現代主義，雙方難免都落入各自的意識形態框架，這也是我後來選擇重新以「達達」作為現代主義反思出口的主因。

當時學者們對達達的認識只停留在「虛無主義」叛逆精神，但深入地看，達達運動及其追隨者「超現實主義」其實也都具備了濃厚的「共產主義」基因。所以，七〇年代的台灣文藝將「寫實主義」與「現代藝術」簡單的對立起來，其實這都是出自於因冷戰意識形態對現代主義過於樸素的想像，這也是我與陳映真相識「恨晚」的另一種說法。

一九九六年，我發表了木刻版畫家黃榮燦在台灣倡導魯迅思想與推動木刻版畫的研究，因而有緣認識陳映真，但我與他單獨聊天的時間不多，我對文學一直停在「補課」狀態，陳映真對文學路線的看法我也都持續關注，我的床頭櫃還一直擱著他的著作，我以為放慢腳步學習，永不嫌遲，但沒想到這個願景在十年前他赴北京後就幻化了。

回憶第一次與陳映真見面的場景，話題是由黃榮燦與魯迅的關係為開端，他對我的「空降」背景感到好奇。其實我對現實主義文藝理念一竅不通，我研究黃榮燦的動機純粹是基於無法接受美術圈「隱瞞」歷史這件事。也就說，在解嚴八年後，社會還沒有人知道刻二二八木刻版畫

作者的身世！黃榮燦的木刻版畫被化約為一個虛擬的政治操作符號，當時我只是想從人道立場還原他與二二八事件的真實關係，但也是這股傻勁，讓我在陳映真深邃的眼神中讀到一股信賴感，此後，我更加虛心的關注他的論述。

我很清楚個人的創作屬於「現代主義」脈絡，這與陳映真所信奉的現實主義存有一定的「鴻溝」，但我寧願將它視為一種延宕，我期待美術現實主義與文學現實主義能建構一個新的對話平台。就我所認識的社會寫實主義美術風格，由於重覆的視覺形式，使得人道精神呈現疲乏，甚至淪為政治性文宣。這一點，我相信陳映真也是清楚的，記得有一回他感慨的說（大意）：視覺藝術最大的難題就是它必需以一種物質面貌出現，它的獨一性反而成了自身市場價值的枷鎖。我想，陳映真所指的應是文學大眾化與美術大眾化的根本差異所在？身為作家的陳映真始終沒放棄思索寫實繪畫意義新出路的可能！隔不久，我舉辦了一個以裝置藝術來表現關於「意識形態」的展覽，陳映真看完後說了一句：「沒想到現代藝術還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表現！」我聽了非常詫異與感動，因為我原本打算慢慢向他導覽解說，沒想到他已在我的作品中讀到一種現代主義「另類」訊息，而這也正是我對狹義寫實主義反芻後的一點心得。是的！我與陳映真的遭遇是如此的戲劇化！我在他的嘆息中，吸到了一口現實主義的新氣息，從此，他一直與我為伴。

● 別了！我的尊師！我們永遠的家人！——敬悼陳映真先生

◎ 郭建平

要如何書寫我敬仰的老師、我親愛的家人陳映真先生？提起筆來竟禁不住眼裏急欲奪眶而出的淚水，腦海中翻騰的思緒，重新喚起那一次在《人間》雜誌辦公室見到你歡迎我的身影，一轉身已經是三十年前的午後了。

一九八五年我從隻身就學的花蓮玉山神學院，搭乘最早班的列車前往台北。火車一路翻山越嶺，我的視線便死盯住海岸右側廣闊的太平洋，洋面上隱約看得見一座四十五平方公里的小島，小島是我祖祖輩輩的魂居之地。島嶼的輪廓是我父親烏黑身體的火山礁岩，小島上青蔥低矮的山林是我母親柔細的髮絲，島嶼邊沿潮間帶永不停息地拍擊著一波又一波白色碎浪，是我蘭嶼達悟族人壓抑的深沉的無人聆聽的哭聲，這哭聲恰恰正是我前來拜訪你的最大動力。

我們的哭泣源自於二十世紀的科技產物核能廢料，核廢料的貯放是小島撕心碎肝的憂慮，是達悟族未及四千人最終的墳塚。懷著忐忑不安的心緒，思考著該如何開口向你報告蘭嶼家鄉面對的最大磨難。我漫無邊際地想著：你會不會拒我於門外？會不會不願傾聽？會不會以忙碌為藉口敷衍我心頭的難題。

然而，當我跨進你十坪大小堆滿書籍的辦公室的時候，這一切掛慮頓然解除。你寬大厚實的手掌緊緊地摟住我的肩膀，像一個久未謀面的大哥歡喜地迎接親人一般，初見的距離頓時被

你親切的笑容掃除殆盡。你低沉的聲音和喜悅的眉宇讓我看見蘭嶼的陽光。這種溫暖我是一輩子不會遺忘的。你從不曾吝嗇將你無限的熱情貼近需要的人，這使我想起你在《人間》雜誌創刊時的談話：「我們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創造當前台灣這樣一個豐厚物質生活的中國人，他們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心靈已經堆滿了永不飽足的物質慾望，甚至是我們的關心、希望和愛，再也沒有立足的餘地。不，我們不信！所以，我們要透過人間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聯絡起來，使彼此冷漠的社會，重新互相關懷，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彼此生活與情感的連結，使塵封的心，能夠重新相信、希望、愛和感動，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

是啊！我們應該脫下冷漠的外衣去擁抱，丟棄自私的心眼打破塵封的心障，實實在在地用希望跟遠大的愛澆灌社會中被壓迫的角落。

當蘭嶼小島的百姓奮力抗爭核能廢料的死亡威脅時，你以海峽兩岸文學第一人的身份在報章雜誌上，以利刃一般的健筆與我們共聲吶喊。當我向你提出反核廢運動需要拉開戰線，從小小的蘭嶼島轉進台北行政院時，你毫不猶豫地捐助經費，讓鬥爭的隊伍得以在台灣的立法院殿堂宣讀蘭嶼民族被剝奪的人權。

當不及百人的抗爭隊伍，頂著台北上空熾熱的烈陽，光著腳板踏在冒氣火燙的柏油路面時，我從隊伍中瞧見你面容嚴肅的身影，烏黑赤裸僅著丁字褲的我們，已經認定你是我們的親族、我們的家人。

回首過往，多麼不願意在心裡承認你已遠去，只想說服自己：你僅僅只是去一趟遙遠的旅行。依然記得我在學校成立的讀書會供閱的馬列思想書籍，還是你從香港帶回的呢！讀書會裏原住民同學看你的《人間》，閱讀你的《山路》小說，討論許南村的《後街》，從報章雜誌上剪貼你批判美帝霸權的文章，將東亞冷戰軸線連接台灣經濟依賴理論的認識，這些思想的材料厚植了我們這一群思想貧乏的原住民學生的思想根基。可還記得為了你蒞臨學校演講，促使全校師生停下神學授課的時節，只為了親耳聽到你剖析原住民社會的困境，從湯英伸事件的「槍下留人」，追索五十年以來原住民悲慘困境，你的講演讓大禮堂內所有的師生泣不成聲。因為從海山煤礦爆炸掘出原住民遺體，到華西街遭販賣的雛妓搶救運動等等，都是你親自參與過的啊！

在原住民社會議題上，你並不僅僅是海峽兩岸的文學大家，更是一個親身力行的人道實踐者。你看見苦難向我們指出癥結，而我們僅僅只是一群聆聽者，我們還不是行動者。

我們想跟你一同為了苦難的民族而嚎啕大哭，但我們哭得太小聲，我們哭得太沒有志氣，我們哭得太不勇敢！只能散在殘破腐朽的部落一再喝著苦澀的小米酒，唱著音符不全的醉歌跌進黑夜。赤裸著膽怯的身體對迫害者鞠躬彎腰，我們竟然還容忍民族的砍刀鈍鏽不堪！種種絕不是你希望看見的現象。

你曾經教育我，關注民族權益的處境，「你要學得比台灣漢民族更像漢族」。這句話我苦思良久，卻都無法解出個中道理。骨髓裡流淌著海洋民族的血脈，要如何變成更像漢人呢？直到年歲漸長，這才明白話語中哲理的要義：我要努力學習以漢族統治者的思維察看原住民的問

題，以漢民族治理原住民的歧視性觀點，思考其對原民族所制定的政策，如此才能更深地理解盤根錯節的原住民族社會困境。而今，我完全了解了作為原住民族的自信和尊嚴。可是我們已經再也找不著那一位充滿關愛的長者了。

走在原住民族救亡鬥爭道路上三十個寒暑。驀然回首，我們何其有幸有你陪伴的過往，有你這不屈不撓的鬥士作為戰友！我們何其幸運，看見你為不公不義，為底層廣大遭受壓迫者不懈地奮鬥！因為你相信：希望、愛和感動，才是建構人間生活最崇高的根據。

別了！我的尊師，領航的旗手，我們永遠的家人。

● 紀念陳映真——邁向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及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

◎ 陳美霞

我應該是一九八〇年代在芝加哥時，經由我的老公林孝信（老林）與大頭陳映真認識的，之後與大頭見面聊的機會不多（雖然印象都很深刻、感受很溫暖、收穫很大）。所以，其實寫這篇紀念陳映真的文章，老林比我更恰當，因為老林與大頭是數十年摯友。但是，老林已經跟陳映真一樣，到了另外一個應該比我們這裡輕鬆的世界（我們在台灣、在兩岸，面臨那麼多難解的問題，怎麼輕鬆得起來？），而他們兩位既是摯友、又有那麼多共同點，我相信，老林早已熱切的與大頭聚在一起了，所以，我就讓老林在那個比較輕鬆的世界，自在的跟陳映真傾述他對大頭的深刻友情、跟大頭話從頭、論台灣及兩岸政經情勢、規劃如何協助台灣及兩岸進步事業吧。

既然老林自己會與陳映真促膝長談，那麼，我就以「釣魚台教育協會籌備會」（二〇一七年一月七日陳映真追悼會的主辦單位之一）成員之一的身份，來紀念大頭陳映真。我上面說，老林與陳映真有很多共同點：首先，老林公祭及追思會籌辦工作組的召集人、世新大學社發所的教授黃德北提醒我，台灣左翼有不少才華橫溢的人，但是在台灣社會享有最高知名度、最廣泛受大眾敬重的就是兩個人，陳映真與老林。他們兩位從很不同的領域——一個文學，一個科學——的著述、耕耘、及行動，都感動了、影響了、號召了成千上萬的人。但是他們的思想及

理論都走到同樣一條路上，那就是站在底層人民的立場、深刻而傑出的做出台灣及兩岸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進而主張社會主義的道路才是對兩岸絕大多數人民是最有利的。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他們反資、反帝、反殖、反軍國主義、反霸權、反法西斯的立場鮮明，他們愛鄉保土，他們無怨無悔、終其一生為保釣或／及兩岸進步事業奮鬥，他們擁有共同的終極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及沒有剝削的社會。還有，他們兩位的人格都異常純真、高尚；他們都是渴望學習新知的人；他們也是無私的、看待朋友的福祉勝於自己的人；最後，他們的戰友、同志、朋友因此對他們都高度的珍惜、關愛、與尊崇。

雖然我上面提過，台灣與兩岸社會面臨許許多多的難題，進步事業遭遇空前的挑戰，但是我們也擁有這兩位傑出的左翼典範，為進步事業打先鋒，因此，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怠惰或洩氣，我們反而更應該集結起來，追隨他們的腳步，「硬朗地戰鬥下去」（引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卅一日「陳映真先生紀念會」的標題）。

我還是回到保釣這個議題來。一九七〇年代保釣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陳映真正在綠島身陷囹圄，所以無緣投入。但是，根據近年深入研究「陳映真文學」的趙剛，陳映真對保釣的評述是「高度正面」的。趙剛在二〇一〇年九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篇〈陳映真對保釣可能提出的疑問〉（有關趙剛這篇文章的分析，釣魚台教育協會籌備會很願意與趙剛對話、討論，但限於篇幅，此話暫時不提）文章中說，陳映真認為，如果沒有反帝、反西方的左翼保釣運動的思想衝擊，就沒有七〇年代初批判現代主義與反共文學的「新詩論戰」，而「鄉土文學論戰」則是「新

詩論戰」的延長，也是保釣運動的延長。而保釣運動與這兩大論戰，都有一個共同精神，那就是：質疑及批判冷戰結構、國民黨政權、現代化意識形態、及現代主義。

確實，這樣「高度正面」的肯定，正是我上面提到的、陳映真與老林雖然在不同的領域耕耘，他們的思想及理論都走到同樣一條路上的內涵之一。但是我願意在這裡對趙剛上面的敘述、分析，嘗試做另外一個補充。七〇年代初期台灣留學生在海外投入保釣1.0愛鄉保土的保釣運動，之後參與保釣運動的留學生發現國民黨政府不保釣之後，開始對中國近代史、台灣史、資本主義發展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等等進行自我啟蒙，運動開始進入保釣2.0的階段。一九七九年在美國芝加哥成立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就是保釣2.0的理想推動事業的重要行動之一——而這個行動至今還沒有停歇。因此，趙剛上面分析的、陳映真對保釣「高度正面」的肯定，應該是對保釣2.0而言了。

另外再補充一點我個人過去跟陳映真少有的實質互動。二〇〇〇年，我在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年會的主題演講的場次中，發表〈全球化與公共衛生界的自省〉的論文，並且在同年的《台灣公共衛生雜誌》發表這篇短文。我將這篇短文寄給陳映真，十分意外的，居然得到他的讚賞：他說，你那篇文章寫得很好！獲得大師的加持，心裡深受激勵，至今難忘。二〇〇四年，我從成大公衛所休假，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短期研究，看到媒體對陳映真的報導：名作家陳映真感嘆，當代青年創作者不關心周遭的人與社會，他們的創作多「以自我為中心」、多是「作者的獨白」。我當時正想批判台灣青年膚淺的國際觀，於是我以陳映真的感嘆為引子，在中國時報發表了一篇「台灣

青年需要什麼國際觀？」的短評，我指出，台灣需要的，是根植台灣社會、密切關注社會脈動、為勞動人民、為弱勢群體發聲、為改造社會而有在地行動、為解決社會問題而有全球思維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國際觀。上面我與陳映真互動的兩個例子，也是屬於保釣20的範疇了。

老林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廿日回歸大自然之後，他的許多戰友、同志及學生集結起來，舉辦老林公祭、追思會、出版《為了將來的好日月——林孝信紀念文集》，希望在台灣社會廣泛宣傳老林一生為「解放知識，改造社會」所建立的典範。更重要的，我們趕緊接下老林的棒子，更有組織的、更有系統的、更集體化的推動著釣魚台教育的工作，將於一月十五日成立「釣魚台教育協會」。我們希望用「釣魚台」這面照妖鏡，揭露資本主義、美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等等的真面目，因此，我們不僅僅談保釣10，我們更廣泛的、更系統的談保釣20。而事實上，我們這樣的工作，不也就是傳承陳映真的志業？

我們省思台灣社會當前的發展，國府從大陸來台之後所推動的反共教育鋪天蓋地，至今並沒有舒緩。五〇年代末期在美國逼誘之下，台灣推行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更資本主義化，這樣一二十年的發展，在八〇年代本土資產階級開始壯大，台灣意識形態隨之而起，九〇年代去中國化的教育及宣傳也鋪天蓋地而起，直到當前不管藍綠政權，親美、親日、親殖、擁資、擁新自由主義……台灣社會的走向似乎與保釣20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馳。這樣的走向，以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對絕大多數人民——尤其對底層人民——絕對是不利的。當然，台灣及兩岸進步事業的挑戰更大了、責任更艱鉅了。

天上的大頭陳映真與我的老公林孝信，加上地上的、投入到台灣及兩岸進步事業的同志朋友們，讓我們攜手、「硬朗地戰鬥下去」，共同大步邁向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及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

(二〇一七年一月七日)

● 為了前進的追思

——初論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和社會變革論

◎ 曾健民

(一) 追思

你離開我們也超過一個月了，如果從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禮堂向你道別算起，剛滿一個月。在這一個月中依舊忙著庶務，但時刻想起你，在心一團亂麻中一直想寫點甚麼，雖然在聞你去世噩耗時匆匆寫了短短的追悼文，許多朋友還是催促寫長一點的，但一直沒有動筆。

想怎麼寫好？與你一起工作十數年的歷往太多，不知從何下筆，只好先拿出你的著作閱讀，拿出與你一起活動的存稿和筆記來看，愈看愈覺得你開拓的思想世界太遼闊太龐大，一篇紀念文容不下，很難盡意。北京趙遐秋大姐準備為你出版紀念文集，我幫忙她收集台灣各方的追悼文，近三十篇已傳給趙大姐，我自己卻未動筆，深感慚愧，或許是我已心神耗盡，情感涸竭吧！還是，等待我把你的思想世界全部學習完了，再以一部書紀念你吧！也為了你一生追求直至離別時還掛心的台灣左統運動的前進，盡一點力。

你與病魔搏鬥十年的肉體已走了，但你留下的龐大思想體系仍在這紛亂的世界活著，深深影響每個人心靈。十年來，有時，在一些活動聚會中恍神中好像你還在場，在大家的迷惑中你會以特有的低沉有條理的聲調撥雲見霧地為大家直指問題核心。

深感慚愧的是，與你一起工作十幾年積累下來的資料和課題，我一直沒有很好的整理，使它繼續發揮你的思想和實踐應有的時代作用。過去的十多年中，你帶領我們在展開清理和批判台灣社會歷史、台灣文學史、台灣史觀、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新帝國主義批判、台灣社會性質論、統一運動等等，在各種文化、政治戰線上，作為批判和對抗台灣非理的支配體制追求社會變革的學習和實踐中，我全力向前衝刺，一直沒有時間停下來整理。在你病倒醫院的十年間，世界和中國、又有新的巨大變化，時代似乎朝著我們努力的方向倒退，我想你在病床上也時刻關心著這些變化，痛惜的是，我們已聽不到你的聲音讀不到你的思考了，我只有在台灣仍然獨自沿著你開拓的道路繼續向前走。

在寫這篇不算追思的追思文的時刻，也使我不得不面對一直沒有面對的二十幾年來積存下來的資料和課題，在慚愧的心情中，必須開始認真整理，作為在新的動盪世界中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雖然你走了，但你的思想仍然活著。這個追思只是為了前進的追思。陳大哥，你安息吧！

(二) 為了前進的道路

記得在二〇〇六年五月底，也就是陳映真要到北京的前夕，他和大嫂兩次來我新店家，在有關搬家或車子如何等細瑣事的談話內容中，至今還清晰記得，他提出了趁此次機會一起把「台

灣社會性質論」作一次總結，在那次算最後一次的見面中，雖然沒有達到總結，但對於台灣社會性質的新殖民地性和資本主義性似乎有共同看法。直到今天，我深深感覺到他在去北京之前內心最牽掛的事還是有關台灣社會性質論的建設。這也是他從一九九〇年代初起，或者說，更早在《人間》雜誌停刊後，他一直關心的焦點，不管在談話中、創作評論中或是社會活動中經常突出的核心思想。這也是他出版「人間台灣社會經濟叢刊」，創辦「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創刊「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以及從事許多社會進步活動中的思想中心。

另外，還依稀記得，當時他還特別問起我們的運動中還有哪些可以跟上來的年輕人，還一一列出了名字，可見得在臨走前他還憂心著運動後續的發展。

（三）成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一九九二年底我全家從日本搬回台灣，記得是一九九三年初，他到我家談了很久。當年四月，便由他發起共同成立了「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他擔任初代會長。在創立宗旨中指出：「我們有鑑於此，深感一方面要批判地繼承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性質論的遺產，為了克服當時台灣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矛盾，援引了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對於台灣社會與歷史之科學的、自我認識工作；一方面又要進一步汲取二戰以後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以及其他各種進步的關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理論新的反省與發展，同台灣社會具體現實結合起來，

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誠為當務之急。欲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協議成立了這個研究會。」

當時陳映真帶領大家研讀的第一本書，是艾思奇的名著《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真正的從「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的理論」開始的。為了「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陳映真與研究會在十年間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對「台灣社會性質」的討論

1. 九十年代初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

其實，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就已形成一定的架構。一九九二年七月寫就的〈祖國：追求·喪失與發現——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各階段的民族主義〉，以及其後的〈台灣現當代文學思潮之演變〉，兩篇都是近一、二萬字的長文，且都是以從日據到戰後的社會性質為分期進行各歷史階段的論述。兩篇的社會性質分期都相同：

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 一九四五至一九五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三：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一九六三以後：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

2·關於李登輝體制的分析筆記

這是一篇陳映真寫的手稿，共有十一頁，可能寫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想必從未發表。這筆記通過對李登輝政權的政經分析比較完整地闡述了陳映真有關台灣社會性質論的思考，不但做了階級分析，還針對台灣社會性質論提出了進一步的社會變革論。比前述兩篇有更大的進展。

筆記首先說明了馬克思的國家理論的一般形態和特殊形態——波拿巴國家；再提及二戰後的新型波拿巴國家——新殖民主義豢養的許多「第三世界法西斯國家」。進而分析了蔣介石國家的性質，最後說明了「當前社會的特質」是：蔣國家高度「相對自主性」的終結，李國家成為台灣資產階級共同處理、鎮壓被支配階級，促成台灣資本主義積累和擴大在生產的「辦公室」；接著，筆記分析了「當前台灣社會諸階級的關係」，把當時的社會分為六個階級——大集團資本家階級、官商資產階級、中小企業資本、中產階層、農民、工資工人、城市貧民。指出最重要的結論，當時的台灣社會性質是「新殖民地半邊陲資本主義社會」

茲摘錄筆記的重點如下：

- (1) 「新殖民地性質」，即表面上政權獨立，實際上在政治、外交、文化、意識形態、軍事等方面附從於人，受人支配；在經濟上，其對美日經濟的依附性。台灣的變革運動，在克服新殖民地性上，主要內容是：反對美日新帝國主義，反對為外來勢力服務的民族分裂主義（李體制分裂體制的固定化、兩國論、依附美日對抗中國論以及台灣獨立運動），發展批判的、科學的民族統一論。
- (2) 在半邊陲性資本主義的克服上，不是全面揚棄，而是加以發展，使兩岸統一構造的完成、大集團資本和官商資本中的買辦性和官僚性的批判與否定，促進民族資本的健康發展。因而，克服半邊陲資本主義性，還不是社會主義的變革，基本上是人民民主主義的變革。而這一切，又是為達到新時代社會主義的實現，準備條件。
- (3) 關於批判的、科學的統一論，主要在變革過程中建立台灣人民在這統一過程中高度的主體力量，以這力量保證一定時期中台灣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並在這歷史的自治期中，發展先進的理論與實踐，對中國的健康、自主、高度精神正當性之發展，做出貢獻。

3·我們要走怎樣的道路？

陳映真主張以社會性質論指導黨的路線爭論。

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召開的勞動黨第三黨代表大會上，英姿風發的陳映真清楚地說明了對當前台灣社會性質的分析是黨路線爭論的「首先重要的問題」。他說：「到底我們目前這個階段，我們黨應該走先鋒隊的道路呢？還是走相對而言比較大眾黨的道路？那麼這個問題也不是大家在這裡你死我活爭論就可解決的。」

我們的黨須要有一個對我們台灣社會、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做出比較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從而研究我們當前社會是什麼性質，在這個社會裡面階級的關係是怎麼樣；老毛說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首先重要的事情，沒有把敵人跟朋友搞清楚，各階級的力量對比搞清楚，我們就沒有辦法馬上在這個會上用爭吵來解決我們該走大眾性的黨呢？還是前衛性的黨，或者說，講得更赤裸裸地說吧，是幹革命的黨……。」

（以上抄錄自林稚霽剪接有關陳映真的影像）

4·二〇〇〇年一系列有關台灣社會性質的討論

從二〇〇〇年六月到十一月，研究會進行了一系列（大約有十幾次）有關台灣社會性質的

討論。從日據期有關台灣社會性質的資料（台共兩個綱領、陳逢源和許乃昌的「我的中國改造論」、李友邦和矢內原忠雄的書籍等），一直到戰後各時期的討論。

恰好在這期間，陳映真在《聯合文學》上發表了兩篇批判陳芳名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的長文；在〈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文中，陳映真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台灣社會性質論作了歷史的分析，並以此聯繫到台灣文學思潮的變化。在結論中，他提出了從日據到戰後迄今各時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

- 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日據期）——「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 一九四五至一九五〇（光復期）——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組成部分。
- 一九五〇至一九六六（農地改革到加工出口導向）——「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
- 一九六六至一九八五前後——「新殖民地·依附性資本主義社會」。
- 一九八五至二〇〇〇（目前）——「新殖民地·依附性獨佔本主義社會」。

對此，陳映真說這只是「初步的整理」，有待更深入的討論或爭論。

文中，陳映真特別指出：「台灣社會性質的推演，不是一個自來獨立的社會之社會形態的推移，而是中國社會之一地方社會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形態的變化。這是台灣社會史的一個顛撲不破的事實。」

關於社會性質論的重要性，陳映真認為：「是我們當前的、久懸未決的、十分重要的理論課題」、「在這一課題上的深入研究與展開，不但有益於對台灣社會實情的客觀理解，也有益於清理已經基本教義化的許多論說——例如台灣民族論、台灣社會獨特論、台灣意識論、台灣主權獨立論，更有益於科學地探索新時期的反帝、民眾的民主主義變革運動，包括文學的變革的綱領」。

另一篇〈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就不在此論列了。

在一次社科會的討論（九月廿三日，晚，在林一明宅），陳映真對自己的論爭文作了檢討，他認為自己「實證材料不足」、「只談社會性質，沒談社會改造，沒有聯繫到社會改造論是不行的，應該要指出前行的道路。」

同年的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八日陳水扁勝選後，陳映真在《左翼》第五期發表了〈讓歷史整備我們的隊伍〉，指出陳水扁是「台灣獨佔資產階級政權的進一步發展」，「延續了前朝的新殖民地性質」。在文中，他再一次提出了前述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只不過，在此文他認為當時是「新殖民地獨佔資本主義社會」向「新殖民地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與展開。

文末他進一步討論了「台灣變革運動的課題」，也就是社會改造論。針對「新殖民地性」，應該反對美日新殖民主義，即民族解放的課題，具體包括：

- 反對美帝對台灣政治、外交、軍事、經濟支配
- 反對「與台灣關係法」
- 反對日美安保新指針
- 反對根深蒂固的美國意識形態
- 反對一切派別形式的台灣獨立

針對獨佔（或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社會性質，存在著對新的官商大獨佔資本的批判和揚棄，主要的課題為：「廣泛形成工人、市民、中小資產階級、獨立民族資本的反獨佔團結」、「發展工人農民、中小資產階級為同盟，使資本得以公平、發展，反對買辦主義，反對官商特權政治獨佔，進行民眾的民主主義的改革與變革，為進一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積蓄條件」。

最後，陳映真要求：「台灣左翼要『實事求是』」，「認真進行對台灣社會史和當前台灣社會性質的科學的認識。無頭蒼蠅式的亂闖、『唯實踐論』、『寄生利用任何資源論』，都應該有認真的檢討與反省。」

比較上述陳映真從九〇年代初到二〇〇〇年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在分期和定性上有相同處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他對於一九五〇年後台灣資本主義性質的概括上。其中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三年，在一九九二年定義為「半封建社會」，二〇〇〇年定義為「半資本主義社會」。另外自一九六三年至目前階段，在一九九二年定義為「半資本主義社會」，二〇〇〇年則定義為「依附性資本主義社會」。

這印記了前面陳映真說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只是「初步的整理」，「有待更深入的討論或爭論」。可惜，對於他不斷提出的台灣社會論並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或爭論，包括我們自己的左統運動，這是陳映真的真正的孤獨之所在。原因，就如他在各處指出的：

「由於一九五〇年白色屠殺之後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不在，至今尚未有全面的、科學性的討論」

——〈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

「由於戰後台灣社會科學和文學理論，完全受到美國反共、保守系學界的深刻影響，使台灣朝野社會科學和文學理論界不知道透過正確把握一個社會所以構成和發展的一般原理。」

——〈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

*對帝國主義的批判

一九九八年從三月廿六日到六月十一日，研究會組織了一系列的「帝國主義與台灣」的討論會，分十二次進行。從帝國主義概論開始，荷、西、明鄭、清、日殖民民到冷戰美國新帝國主義。作為歷史地認識台灣社會性質論，特別是論證和克服當前台灣社會的新殖民地性質，「帝國主義論重視的程度。」

「帝國主義論」是必備的重要思想支柱。陳映真在四月十六日作了「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時期」的報告，依據我的討論記錄林孝信、曾健民和林深靖在陳映真報告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陳映真還為此擬訂了一份有關「美國新帝國主義」的討論內容。後來討論進展到準備寫作一本新帝國主義論，我手頭有一份當時陳映真擬好的寫作大綱，分序章、美帝國主義與台灣、台灣獨立運動與美帝國主義、新冷戰的形成、台灣的反美鬥爭、終章等六章，可惜，大家趕不上去，寫作出版的事也沒竟功。後來，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在研究會的「台灣社會性質」討論中，陳映真又重提二周內編出「美帝在台灣」的資料目錄，兩年內出版一本書。可見得，陳映真對帝國主義論重視的程度。

記得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陳映真作品集」第十三卷《美國統治下的台灣》，陳映真在「自序」的最後，早就意氣昂揚地指出：「對台灣戰後史的總結，批判美帝國主義支配下台灣『民族分裂／冷戰／國家安全／對美日附從』的體制，以及因這體制衍生出來的一黨專政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買辦附庸主義；同時並舉具有民族統一運動視野的民主化運動，和具有民主主義視野的民族和解與國家統一運動。」

由此可見，陳映真早在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就對戰後民族分裂的根本問題，積極進行了對美國新帝國主義支配的批判，作為島內民主化運動以及國家統一運動的重要基礎。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底，在社科會上唐曙報告了十月在韓國漢城舉行的AWC會議情形，陳映真發言提及「台灣的反帝運動要有自己的議題，要有自己實際的反帝運動的實體，不能人家反

帝就跟著反帝，要從自己的社會歷史中的帝國主義出發，要先有自己的帝國主義論。」

* 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對亞洲的支配

AWC (Asia Wide campaign Against The US-Japanese = 反對美日對亞洲侵略與支配的亞洲運動)，就如其名，是一個廣泛結合亞洲民眾（包括日、韓、台、菲、印尼……等）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對亞洲的宰制和支配，追求亞洲和平的運動。在一九九二年創會時陳映真即參與並發表了論文。

一九九九年七月廿八日 AWC 在台北舉行了一次「跨世紀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運動國際研討會」，陳映真發表了〈帝國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危機〉，說明了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本體是跨國資本的邏輯和組織對於人類生活、思想、感情的全面支配，其蘊含的矛盾造成了金融危機。

會場上關於「亞洲價值」展開了對話。陳映真對於會上有人慣用所謂「亞洲價值」用語，首先提出了質疑。他說：「亞洲價值有日本軍國主義的亞洲價值，也有馬哈迪、李光耀的亞洲價值，這些都是對內對外的壓迫性的亞洲價值，我們應該改用『亞洲人民的價值』」。

菲律賓代表回應說：「應該把重點放在如何使反帝運動更強大，討論亞洲價值應以階級為主，以工人價值對抗其他價值。」

日本代表（小城）說明：「應以國際階級立場來看，日本的統治者也以亞洲團結為號召，我們應以各國的階級鬥爭與國際階級運動連結為主。」

韓國代表姜禎求在論文發表後回答說：「亞洲價值，簡單地說就是與西方價值對抗的價值。」

* 解開「東亞冷戰——戒嚴」歷史的鑰匙

「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是由台、琉、韓、日四地區各運動團體組成個別的事務局共同研議召開的大型國際會議，這是戰後東亞冷戰下國家暴力的歷史和人的第一次遇合。在台灣組成了台灣秘書處，由陳映真負責。從一九九七年在台北劍潭召開了第一次大會後，歷經濟州島、琉球那霸、光州、京都、麗水（韓國）六次大會，而於二〇〇一年結束。大會的意義，就像第一次劍潭會議時陳映真寫的「會議旨趣」中指出的：「從戰後世界史的視野看待，五十年代大規模的國家暴力在台灣的展現，絕非特殊的、孤立的歷史事件。由美國支持、由美國影響下各反共獨裁政權發動的大恐怖，普遍地、同時地也發生在東亞各國，雖然彼此之間形式不同，但本質是相同的，都是東亞冷戰和國家暴力結合下的產物。因此，要把台灣的『冷戰——戒嚴』結構放在東亞冷戰的宏觀背景中來看，才能掌握開啟五十年代各國由政權發動的恐怖主義內幕的鑰匙。」

同時，東亞四地區共同舉辦的研討會的目的在：「彼此交換在共同的東亞冷戰支配下各國的具體歷史經驗與各自的省思，以期更客觀、更宏觀地認識東亞冷戰與各國國家暴力的關係，以及在這結構下的人的共同命運與展望，進而增進彼此間的瞭解與真誠的團結。」

「對台灣來說，將台灣戰後特殊歷史與東亞冷戰的普遍歷史結合起來，將國家暴力與東亞冷戰聯繫起來，才能踏出「本土意識」感情論和道德論的框框，對戰後台灣社會和歷史的本質，獲致科學的、本質的認識。」

東亞冷戰會議並不是始終平順的，四個事務局之間經常出現爭論，畢竟被冷戰和各地國家暴力壓迫彼此分隔五十年的四地區變革運動者，在跨越冷戰和地區的歷史鴻溝的第一次相遇，一開始難免彼此陌生。譬如，一九九八年韓國事務局主辦的濟州島會議時，韓國邀請了當時東帝汶獨立運動的領導者賀爾塔擔任會議的基調演講，可是賀爾塔此人和台獨友好又經常誣衊中國，我們在事務局聯絡會上提出反對希望韓方多方考慮，如果主辦方執意邀請此人與會，我們可能會在他進行基調演講時集體退場。在濟州島會議開場時陳映真率領台灣代表團六十幾人大家議決全坐在一塊兒，準備一待賀爾塔上台集體退場；果然，賀爾塔一上台，陳映真一個暗示大家就一起退出會場，等他演講完了再進場，表示對賀爾塔的嚴重抗議。

這並不妨礙我們與韓方的友好，只不過明確表達自己的立場，反而有助增進彼此間的瞭解與真誠的團結。結果，六次的會議有三次在韓國舉行。就在彼此折衝和協調的過程中，五年的會議使被冷戰和國家暴力彼此分割近半世紀的四地區人民，終又有了增進彼此間的瞭解與真誠團結的機會。

我們的日本友人橫地剛先生，在參加了北京八寶山陳映真的追悼會後，他心有感地向我說，陳映真的意義不僅止於一個真誠的愛國者，他還代表了東亞的甚至第三世界人民的精神。

社會性質論決不是為了學術的研究，而是為了變革社會、改造世界的實踐；陳映真再三提出台灣社會性質論，主要希望台灣的社會主義統一派有一個思想的準備和指導，這與變革運動的性質、對象、動力等一系列問題有關，譬如要團結誰、要反對誰等問題。

然而，陳映真又說他提出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只是初步的結論，有待討論、爭論，實際上，他期待有更大的論爭；可是，一直到今天，不但沒有討論（除了青年學者邱士杰作了學術的努力之外），連回應都沒有。這是運動的危機。

自認是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朋友，不能讓陳映真的思想再孤獨下去了！

● 我所認識的陳映真 ◎ 葉芸芸

我所認識的陳映真，最早是透過閱讀〈麵攤〉。是在明星咖啡走廊下周夢蝶書架前的小板凳上讀的。那個下午，台北的天空有點陰沉。我有一股複雜的感動，還有一些自己說不清楚的疑問。我並不十分理解作者要傳達的是什麼？後來閱讀〈將軍族〉，三角臉和小瘦丫頭，兩個誠實有尊嚴的社會邊緣人在底層的掙扎，為我開啟了直面社會的一個全新的視野。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位作者因為讀禁書、搞組織已經進了高大圍牆的牢獄。映真先生自己稱這七年牢獄之災為「遠行」。他遠行久客綠島，就是我從小聽到大人口中說的火燒島，那個關押著很多思想犯的地方。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就在綠島，映真先生遇見了已經被經濟成長所腐化的故鄉社會所遺忘的一整個世代的人；他和白色恐怖年代的歷史，那被國家暴力所湮滅卻不曾完全死去的歷史，有了一次深度的正面對質；他接續了被不正義斬斷的歷史。

遇見映真先生卻要等待比十年更長的時間。直到一九八三年，他受聶華苓女士的邀請到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作家計畫。落葉繽紛的秋天，正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客座訪問的戴國輝教授來到愛荷華大學，與映真先生以「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為題有過一次長談。兩位先生的對談由我整理成文字稿，刊登在紐約發行的《台灣與世界》月刊，引起一次關於台灣意識的論爭。映真先生的美國之行也使得眾多海外關心人士與島內《夏潮》雜誌與後來的《人間》

雜誌有了連繫與交流，影響了不在少數有理想有使命感的年輕人，學成後返台服務，直接參與解嚴之後發生在台灣的各种社會運動。

一九八七年，《台灣與世界》月刊在紐約辦了一場「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研討會」之後，終於停刊。一九八九年，台北的《人間》雜誌也停刊了。兩份雜誌都堅持了四年多，發行四十多期。意外地接到映真先生一封來信，他對不免有幾分失落的我，說得冷靜堅定：

「《人間》停刊了，但請不要那麼地傷感。它已經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務：讓知識份子和學生，從民眾的視角去理解當前台灣的生活，理解『台灣經驗』的陰暗部，喚起關心人，關心生活、關心自然這些與資本的邏輯相背反的價值。然而如果台灣沒有更實事求是、更基於現場和生活的進步的組織，去集中和表現進步、批判與改造的意志，《人間》辦得再久，也無法將它的思想、價值和政治影響落實、積累和集中起來。這是我們下一個任務吧。」

映真先生的書寫和他的行誼，一再地讓我感受到一種深刻的道德感。在他極少數的散文作品中，〈父親〉最是讓人動心動情，文中說到皈依基督的父親，曾經幾次表達對日本「無教會主義」基督教徒矢內原忠雄的崇敬。矢內原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曾揭露日本在台灣的糖業帝國主義掠奪，並公開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記得多年前在《葉榮鐘全集》的發行會上，我曾提到家父是矢內原為撰寫《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而到台灣考察時的嚮導與翻譯，日后留學日本成為矢內原先生在東京帝大的特別旁聽生，也是先生在家中開堂講授聖經福音的第一個學生。讀了〈父親〉，我才明白那天會後，映真先生何以激動地對我說：「我

以前竟不知道，葉先生與矢內原先生有這樣特殊深厚的關係。」在一九六〇年代，當他在思想上日漸激進的時候，父親雖然察覺他的傾向卻不曾阻止，只是耐心地與他談論許多嚴肅的問題。他說父親對於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這條道路深有同情，也有期許。對於文革的騷亂，卻有深沉的宗教憂慮。入獄之後，他才逐漸明白父親是懷著何等深沉的憂慮與恐懼，百般叮囑他：追求世上的正義，不能忘記人原有的軟弱，不能失去靈魂的潔白，莫因傾向變革而捨棄信仰，要像矢內原忠雄那樣，變革實踐與宗教信仰是可以相互豐富的。

朋友們懷念他待人的誠懇、體貼與人情味。他身上總有一股能夠感染人的自在與從容。他對人的關懷真實而謙抑，特別是對那些處於弱勢的人。他也從不介意一個人的學歷、地位或是年齡。曾經不只一次，映真和麗娜專程到台中探望我的母親，還送去一隻每天愉悅地歌唱的小鳥（石燕）。小鳥既是來陪伴老人家，也需要老人家的照顧，他竟如此細心設想為老人家排解寂寞。二〇〇六年去北京之前，他們再次來到台中。那是個六月天的黃昏。他們在母親房間裡的兩張沙發椅坐下來，寒暄家常之間，映真的目光一直流覽貼著母親抄寫的佛經以及臨帖的書法習作的那面牆上，然後他轉過身來問我：「母親為什麼要搬家？」，我老實回答說是因為銀行債務房子被查封拍賣。映真望著麗娜，輕聲的說：「啊，是和我們一樣的情形。」

那並不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映真先生。兩個月之後，我和幾位文友在北京再次見到他和麗娜，還留下一張眾人合影的照片。那一夜，大家因為看到他的健康狀態而心情沉重，返回旅館的車上，一路沉默無言。然後，傳來的是他中風病倒的信息。然後，十年竟然就這麼過去了。

朋友們也能感受到映真先生的寂寞或是孤獨。王安憶的〈烏托邦詩篇〉述說一九八三年她在愛荷華的第一次美國經驗。她是這麼提到映真先生的：「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大陸，在告別革命、反思激進主義的視野中，勇往直前發展經濟。映真先生懷抱第三世界觀點，對大陸摸索社會主義實踐的焦慮，如同他在美日意識形態支配下的台灣呼喚吾人睜開左眼、去殖民地化，也許不合時宜，卻是這時代僅有的警世鐘聲啊。

對於我來說，他的小說其實是最為真實的歷史的救贖，是對冷戰——內戰雙重體制下被美國化改造的台灣社會的深刻批判，也是對理想主義者的反省與鞭撻。映真先生從來不只是一個小說家或是評論家。他始終清醒直面歷史。他是一個心懷悲憫而又理直氣壯的實踐者。翻開八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史，從鄒族少年湯英伸事件、鹿港反杜邦運動、基隆八尺門的原住民、北台灣的多次煤礦災變、工人邱惠珍……一直到發現清理六張犁白色恐怖年代受難者的亂葬崗，他都是一名肩負時代使命感的戰士，義無反顧地走進現場。

映真先生遠遠走在前面。他思索，他孤獨，因為我們沒能趕上他。他對歷史變遷的敏感難以被同時代的人所理解。雖然，他說平生最大願望，是做一個平凡而胸襟坦闊、背脊挺直的中國人。但他所提出的問題絕不只是針對台灣或是大陸。他對第三世界、對社會底層弱勢族群的關懷與認同，他對物質消費主義、殖民帝國主義以及跨國資本企業的批判，更是出自對全球全人類的觀點。他思索建構一個更為光明、更為公平而有正義的人類社會所提出的各種質問，我

相信，將會一再地被人們重新思考。

映真先生是朋友們心中共同的一座燈塔。他使我看見人間光明的存在。我因此而相信人類幸福的可能。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日·長島石溪)

●鞭子和提燈——祭陳映真先生 ◎趙剛

(一)

陳映真先生的作品以其不可解的巨大魔力，敲動了冷戰年代知識青年如我的荒廢之心。他筆下那「留著長髮」、「漲紅他們因營養不良而屍白屍白的眼圈」、「疲倦地笑著」的「細瘦而蒼白的少年」，曾讓年輕的我不知所以然地感到一種由陰鬱孤獨、對當下存在的不耐，以及一抹詭異的振奮心情，所混和的複雜心情——雖然那個心情又被搖滾樂、存在主義，以及那赫曼赫塞們所收編、安撫，也是事實。在台北的漫長雨季裡，我偶而也會想到那隻綠色的候鳥，以及我至今感念的一句來自一個頹唐老頭趙公的話：「能夠那樣號泣，真是了不起」。那大概是一個想要號泣而不得的年代吧。

但，如今的「這個趙公」的年代，就不是了嗎？

陳先生的死，我其實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沒想哭，也沒淚，只是覺得心頭時不時的有些發堵而已，懶散地覺得隨他而逝的或許是一個時代吧；那感覺有點兒荒涼。偶而會想到陳先生，但也不是他的思想，乃至他的文學，甚或記憶中與他交往的二三景，而是一種沒有時空感的音容笑貌：先生在蒼天帷幕中，孤獨而有力量，抑鬱而使人溫暖，似乎經常深度徬徨但又總是懷

抱希望。此刻，我總是覺得離我而去的是一位稀有的（尤其是在這個島嶼上）有德者；一個時刻在戰鬥中的有德者——雖然老天以一種極其惡劣不仁的方式，讓他在人生的最後十年中，退居於那樣的一種殘酷的「寧靜」。

先生是一個戰士。他的小说是戰鬥的文章，更別說他的論文、他的文論、他的《人間》雜誌，與他的人間出版社了。先生哪裡只是對抗台獨的鬥士，他是中國人民的鬥士，是第三世界的鬥士，而他更是孤身對抗一種「文明觀」的鬥士。這是先生的永恆業績。戰後的台灣當代，固然長時間只看到先生一人荷戟獨徬徨，戰後的中國大陸又有幾人呢？我就是沒法兒聽到人們信口雌黃「二陳論戰」這四個字，那讓我非常痛苦，不是因為坐令豎子成名這種小事，而是因為它童駭惡戲地、若無其事地，攤開了這整個當代的扭曲與變形。黃鐘與瓦釜、鳳凰和雞鶩，等而觀之。在喪失一切標準與分野的「平權」與「多元」的當代，或許這也是一種必然吧！但我抗議。

先生走了，但兩岸沒有多少人記得他，不成比，不合理。是時代的高牆把陳映真先生與大眾隔離了。誠品書店有多久沒有陳映真的書上架了呢？同其時，「大江大海」仍在分斷的兩岸永晝濁浪滔天。老天固然親痛仇快地讓戰士臥榻十年，但反對台獨呼籲統一的對岸大眾，又何嘗不是在做著一樣的事呢？人們獎賞著高高在上臨風揚眉醜詆民族自我的買辦文士，卻聳肩冷落戲謔那血目焦灼苦心孤詣的祖國赤子。陳先生的天命淒慘地無言地訴說了這個世運。

(11)

陳映真先生安息了，然而，然而，我們只能繼續戰鬥下去。停止傷悼，不再抱怨，繼續戰鬥，是唯一紀念陳先生的方式。杜繼平先生說，我們要善繼其志。善哉斯言。對我而言，陳先生的志與學，有如下幾個突出之點，值得我們後生作為範式。

首先，化除近親憎恨。這要求我們在思想上、學術上，嚴肅面對日本舊殖民與美國新殖民。這是「已立」的功夫。

已立而後謀求兩岸的和平統一。這要求我們尋求一個有道德理想的統一方式，從根本上避免任何形式的武統所將造成的永劫民族悲劇。經濟共同體「物質基礎」固然重要，傳統中國文化固然不可學舌輕賤，但專言「經濟」、單靠「文化」，不足以言理想；事實已證明經常適得其反。

「去殖民」與追求和平統一，必需有一個「中國人身份」作前提；必需在情感、思想，與知識上，站在中國人的視角。在這個視角上，把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歷程，以及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視為中華民族努力尋求自身出路的歷史展現；善與惡、成功與失敗，我們都必需概括承受，以其為我們自身之一部分，保衛之或批判之，承先啟後。

在這個承先啟後的不斷鬥爭中，台灣以其邊緣之歷史經驗與視角——尤其以一種第三世界普遍的新舊殖民地經驗與視角，將從這個共同體的一個內部他者的位置，多元而一地加入此

共同鬥爭，而後或也是同時，參與到那個又必將多元而一的世界歷史的（world-historical）鬥爭。以此而言，台派、獨派、中華民國派與社運派是一種頹廢派，是一種歷史終結論的信徒，是一種哲學上的享樂主義者，是空洞同質性空間的漫遊者。

因此，這個鬥爭既然需要和經濟主義的共同體想像鬥爭，要和一種國粹的文化共同體想像鬥爭，也還要和一種退變的「左翼」想像鬥爭。從獨派到台派到中華民國派到社運派，這些政治光譜的不同構成要素，所共享的都是一種現代化的、個體主義的、以天地萬物他者為芻狗的文明觀。我們如何從根本上挑戰這個文明觀，而不至於長期處於範式被動的處境，從而長期污名化自身為「不夠文明」、「不文明」，甚或「野蠻」，於是成為了一道擺在我們眼前的巨大思想挑戰。而我相信，這是陳映真先生在二〇〇五年書寫〈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一文時，所透露的一個未竟志業。這是一個文明觀的鬥爭，而不論是「社會主義」、「中國文化」、「民眾視野」，或是「第三世界」，在這個文明觀的鬥爭中，固然都將扮演重要角色，但各自都將無法自足。

（三）

然而，陳映真先生之所以為我們所敬重，追根究底，並不是在他的思想學問，當然也不是他的作品本身，甚至不是他的行動實踐，而是在他的學問與創作之後的那個人——那個有德者。

雖然陳先生的德與上述那些都無可分，但對我而言，那個德，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玩真的。是這樣的一種稀有的真誠，直接且深度地感動了一些人，當然，也一定趕跑了另一些人。陳映真先生並非生而真誠，他的真與誠是不斷自我反省、自我惕勵的結果。要不斷地直面自身的「殖民性」、「階級性」、「西方性」——乃至「猙獰的男性」，是不容易的，而陳先生則把他與這些東西的鬥爭歷程，忠實地反映或折射到他的文學裡。我們果真愛陳映真的文學、思想，與實踐，我們應該也要能愛它們後頭的那個終始與自欺與虛無搏鬥的心靈，然後，在這樣的「嚴厲的鞭子和腳前的提燈」之下，或許能讓我們更「用功些、謙卑些、誠實些、勇敢些……」（陳映真，〈鞭子和提燈〉，一九七六）。在自我、家國、文明、人類，與天地萬物諸元之間，是一條細微而重要的線索的。這，或許是陳映真先生給我這樣一個人的最珍貴的禮物吧。

別了，先生。

（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於台中）

● 想念你，大陳 ◎ 蔡明德

我最敬愛的大陳（陳映真，我們人間雜誌同仁都這麼稱呼他）離開我們了，傍晚時分，首先接到鍾喬來電告知噩耗，緊接著振國……各方悼念訊息接踵而至。

大陳，你病臥北京多年，今天你走了，我心難過不捨，但我沒流淚，我喝著高粱，獨坐在餐桌想念你。

想我剛大學畢業應徵的「第一件差事」，你說我公司小，薪水不高，問我願意來上班嗎？就這樣工作一年多，有天你興志昂然的說：「我們來辦一本以人為本，關心弱勢族群、環境、婦幼、勞工……的雜誌」。隔年《人間》雜誌就誕生了。

想那年海山煤礦災變，你帶領我們去災難現場採訪，罹難家屬的哀痛聲令人心酸，你說，我們要讓人知道礦工生活的艱困處境，於是有了「望鄉的礦伕」報導。

想到那年元月，我回花蓮休假，你打電話給我，要我立即返北記錄林義雄家屬命案喪禮，你說，這是國民黨極權統治下的悲劇。

想你帶我到台中參加楊達喪禮時，碰到彰化黃順興前輩的環保子弟兵，聊到米糠油（多氣聯苯）受害者的狀況，你震驚，要我留下跟他們去了解現況。

想你痛心森林遭到濫墾濫伐，策畫了「來自台灣森林的緊急報告」系列報導，並發起台灣

首次的搶救森林大遊行。

想你為鄒族青年湯英伸殺人事件請命，發起「槍下留人」活動而心焦。

想你關心韓國學生運動，那年你專程去了韓國，返台後，你交給我幾卷你用傻瓜相機拍的黑白底片沖洗，你說，真怕拍不好，希望能得上。

想那時人間雜誌的辦公室，有位穿著汗衫、藍卡其褲的伯伯常來看你，他總是笑著臉精神飽滿。有一天你告訴我，他是綠島的同學，外省人，不識幾個字，遭到政治迫害，被關水牢半年，沒關死，但頭髮都掉光了，能活著出來是天命，所以他總是紅光滿面笑臉常開……

想你那天跟我說，住宜蘭的黃春明來電，說不去看老王他真的會再出事。老王，不識字，共軍，一九四九年被國軍抓來台灣關，出獄後，在輔大附近擺麵攤，有一天收攤後醉酒大罵蔣中正——蔣匪，再度被抓到綠島。出獄後，曾在《人間》雜誌幫忙雜務，後輾轉到羅東車站假日飯店旁擺麵攤，但本性不改，晚上收攤後常在車站廣場發飆大罵蔣匪。那天，我陪你搭國光號到羅東，你的到來，老王心裡明白，麵攤吃晚餐時，老王靦腆的說：「大頭（陳映真別號），沒事的。」

想你因發不出年終獎金，送給同仁的年終禮物——陳映真小說集，但夾在小說集裡，那封你親筆寫的道歉函，卻遍尋不著。

想你《人間》雜誌停刊時，感傷的向我們說，「你們把底片都帶回家自己保管吧，或許以後會有用處。」

想著你的小說〈麵攤〉、〈將軍族〉、〈第一件差事〉、〈山路〉、〈鈴鐺花〉、〈夜行貨車〉、
〈萬商帝君〉……

想念你，大陳！



慚愧！慚愧！

悼陳映真先生

◎（日）橫地剛

陸平舟譯

進入十一月，期待已久的《南天之虹》簡體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書從北京寄到我手上的那天，隨後收到了陳映真先生的訃告。那時，捧著書的我不禁黯然神傷，追悔不已。原打算待見到本書以後再向陳映真先生報告出版經過的，如果陳映真先生能知道大陸的兩位年輕編輯為此書的出版所做的努力該會多麼高興啊。可如今這一切又從何談起呢。

二〇〇二年，為了配合二二八事件五十五周年的紀念日，陳映真先生出版了該書的繁體中文版。如果從藍博州先生把我帶到六張犁黃榮燦的墓前算起，在此後三年的日月裡，隨著那天使我感到周身寒徹的理由被一個一個地探究明瞭，一段段「私記」也逐漸集篇成冊。最初該書是由同事間女史幫我輸入電腦列印成帙的。沒想到陳映真先生收到這本樸素的日文版「私記」後，隨即打來電話說「應該印刷出版」。於是，我馬上聯繫到南開大學的友人陸平舟請為翻譯。這樣，陸先生每翻譯一章即通過郵件發給間女史，由間女史對照日文校勘、確認後再送交人間出版社，由陳映真先生過目、校正。那時候，在福岡的我與天津的陸先生不斷地通過電話、郵件或傳真交換意見。與此同時，由梅丁衍先生負責的本書插圖整理和裝幀也在同時進行。

這期間，陳映真先生恪盡編輯之責，對本書從日文到中文的正確性逐字逐句地做了校正，但他卻並未對本書的內容提出任何異議與疑問。這種尊重他人意見的態度反倒讓我感到不安起

來。雖然不知道我的發掘到底是玉是石，但即使是原石也罷，陳映真先生的態度更讓我不可能放棄懈怠、慎重探索。

在執筆過程中曾有過這樣一個插曲。就是在史料挖掘中，我發現了范泉的影子，於是我放下筆，立刻與藍博洲二人飛到上海去拜訪他，並從他那裡瞭解了很多史實。但沒多久，范泉先生就去世了。於是《范泉紀念集》的編輯出版被列入計畫。我應邀寫了〈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但不久稿件被編輯退回，要求大幅刪減和改寫。編輯在退還的原稿上用紅筆塗蓋了要刪除的部分，其餘部分也用紅筆做了修改。在附信中寫到，不這樣修改，恕不能刊發，請您理解。我隨即回信表示拒絕刊發。陳映真先生聽說後也非常氣憤，直接給編輯打電話表示抗議，得知對方不肯接受他的意見後，他也拒絕刊發自己的文章。但問題並未就此了結，范泉夫人聞知後，希望大家彼此通融。因此，我表示同意將後面部分全文刪除，標題改為「想念范泉先生」，但需附加註腳「此文是作者所著〈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的摘錄」。陳映真先生表示雖憤懣難平，但姑且同意，並代編輯連稱「慚愧！慚愧！」。此後不久，〈范泉先生的遺願〉由北京發行的《台聲》原文全文刊載。這是陳映真先生反擊的結果。

此後，陳映真先生出版了范泉的散文集《遙念臺灣》，這促使我完成了〈范泉的臺灣認識〉一文。陳映真先生與武漢大學的吳魯鄂先生將該文翻譯成中文，呈賈植芳先生過目後得以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上刊載。范泉的在台功績因此得以公認的同時，他的名譽也得到了維護。

在陳映真先生這樣的激勵與引導下，我此後的數篇文章又得以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上刊發。朋友中人們稱我是「日本人中『面白い奴』（有意思的人）」。不過，能出版單行本和上《復旦學報》的話，是該有個頭銜吧。不知什麼時候，陳先生給了我一個「日本民間學者」的稱呼。「民間」是沒錯，但「學者」我怎麼擔當得起。我所學的東西，不過是在發掘中，對發現的粗石，其形狀、色彩、光澤、手感等的感想記錄而已，離學問尚遠。

陳映真先生大概對此十分清楚吧，是他讓我拿起自由奔放的筆。從長期被隔絕的台灣來看，讓他——一個二戰後成長起來的，從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開始，在文革中及文革後都始終可以在中國大地自由穿行的日本平民，一個「面白い奴」——自由地挖掘，是否正是他希望看到的？

在我天真地看到這些挖掘出來的東西時，總是聽到陳映真先生的「慚愧！慚愧！」四個字。這是向人坦言自己的「不知」，同時也表達了直視事實的強烈探求心。這種平易、謙遜的人格使人備受感召。讓我們不得不重新認識，我們所給予臺灣人的重重束縛是何等的強烈，終於「慚愧！慚愧！」成了我們的口頭禪，它是激勵我們探求真相的嚴厲的鞭子，也是照亮道路的提燈。

大概是繁體中文版出版那天吧，陳映真先生從臺北打來電話。他說夫人稱讚說「這是臺灣最美的書」，言語中透露出喜悅之情。在臺北二二八和平公園舉行的新書發佈會上，有三位來自北京的受難者前來參加。發佈會結束時，在諸前輩受難者的坐席前，陳映真先生突然說道：「應該出版簡體版，讓大陸的青年人讀到。」那是再出發的宣言。從那以後已經過了十五年了，

明年將迎來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任重而道遠，現在，我們要做的依然是讓「慚愧！慚愧！」的呼聲持續下去吧。

十二月一日，我帶著《南天之虹》的簡體版，來到陳映真先生的靈前並親自奉上。遺體告別儀式的會場播放著《鈴璫花》的錄音。「一九五〇年……」，當陳先生低沉而柔美的聲音把開頭的一句送入耳朵時，我周身感到一陣到現在從未有過的顫慄。腦海裡忽然浮現出最初結識陳映真先生的場景。那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從廣州回日本的途中，在香港啟德機場的小商店我被《趙南棟——陳映真選集》和並排放著的，由文藝風出版社發行的中文版《楊逵選集》所吸引，所以一併買了下來。丘延亮的序文由魯迅的《野草》開始，引出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登機落座後一氣讀了起來，看到最後談及文革一節時令我驚訝不已，於是再次從頭開始認真咀嚼。就這樣，在陳映真先生的引導下，我來到了挖掘坑道的入口。坑道連接著臺灣與大陸，也連接著亞洲，並且我確信，它和我走過的時代的日本也息息相關。

替代哀樂的《鈴璫花》大概是麗娜夫人的主意吧。阿助把鈴璫花（佛桑花）叫做後生花，用它送走了高東茂老師，也用它送走了似乎是追隨老師勇往直前的曾益順。雖然對於是否追隨他們曾有過躊躇，但畢其一生都在紀念他們的阿助，今天也走了。沒有白色的玫瑰，就讓我依然奉上鮮紅的鈴璫花，為您祈禱在那個世界的幸福吧。合掌！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廿八日記）

編按：橫地剛（一九四三年一月卅一日）現代中國語講座負責人代表。著作：《南天之虹》（人間出版社）

〇〇二年一月刊，商務印書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刊。著述：《范泉的臺灣認識》（《復旦學報》二

〇〇三年第三期）、《魯迅與鎌田誠一》（《魯迅研究資料》（14）（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等。

《來甦》的山路上，送你遠行 ◎鍾喬

(一)

一九七五年，高中的文藝少年如我，在舊家小閣樓上，蒙著棉被，偷偷閱讀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那是戒嚴時期，他仍在綠島度過禁錮歲月的最後一年，〈將軍族〉成了禁書。一九八〇年，結束中興大學浪跡文學院的學生生活，從台中北上，決意放棄文青的浪漫詩作，投身社會改造的行列，去找陳映真追尋文學與社會的現實實踐，由他介紹我去《夏潮雜誌》任執編工作，親身在當年「海山煤礦」、「煤山煤礦」的現場，摸索台島境內第三世界處境下，原住民淪為社會底層的真实寫照。而後，《人間》雜誌創刊時期，在〈鹿港反杜邦〉的報導寫作中，側身於當地的環保社運行列。這時期，偶而在回返雜誌社交稿或聆聽寫作成果之際，總會遇上在茶水間用口哨吹著「國際歌」的大陳（在《人間》雜誌時，我們這麼親呼身材高壯的他），喝著握在手指間的熱茶，和從採訪現場回來的我們，用閩南話說著類似：「不是我們多會寫文章，而是受壓迫、受苦痛的民眾教育了我們！」

從此，我改變了自身僅僅作為一個浮誇虛名的作家一類的想法；一九八九年，《人間》雜誌因財務不堪虧損而停刊。因著大陳的介紹，讓我有機會前往南韓參加「民眾戲劇訓練者訓練程」。工作坊」，從此步上這條以文化行動為思想前題的劇場道路，至今廿六年時間，始終以戲劇創作和文化行動相互辯證的思維及方法，展開與青年共同追尋劇場之於社會、之於世界的生命旅程。

今年，恰逢「差事劇團」成立廿周年，當人們再次問我：為甚麼以差事作為劇團名稱。我仍然玩笑的回答：這是陳映真在我十七歲時，就交給我的「一件差事」。也就在這「差事二十·路有多長」的紀念活動中，我邀來了老友胡德夫要他為我們唱幾首歌。

他問：「有甚麼特別交代的嗎？」

我說：「朋友都去北京幫大陳送行，但我因差事二十無法前往，你唱首送他遠行的歌吧！」

「嗯！《來甦》吧！」他一貫從容的眼神望著我，「排灣族千年古頌，為部落裡最受尊重的長輩送行的歌！」

當他唱時，我想起了在小小的、樸素的靈堂中，為鄒族少年湯英伸舉辦告別式時，他說的一席話：「如果漢人不調整，對待生活這島上的美麗少數民族，像這樣的事情會再發生！」

是的。這一個冬日，來得異常熱烈卻也孤寂！熱烈的是，就在暖冬的每個日日夜夜，我和劇團的夥伴們，先是在舞台上，以身體敘事劇場的風格，共同完成了卅年前允諾蔣碧玉女士的一件差事：將伊與鍾浩東的故事（藍博洲著：《幌馬車之歌》），以《幌馬車變奏曲》的劇名搬上舞台。終而，相關白色恐怖的地下黨人的形影，再次以活過來的歷史，具現在觀眾的面前。劇的最後，引用了陳映真先生於小說「山路」中的一段話語：「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

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曾經，也有很多的掙扎、徬徨在內心深處。想說，整齣戲以這樣的結尾來鋪陳，會不會終竟是對久臥病床上的映真吾師，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傷慟呢！畢竟，他將一生的關注，無論在思想或文藝創作上，都擺置在一心念茲在茲的祖國革命事業上。於是便重新去閱讀了一九八四年小說集《山路》出版時，他寫下的自序。在這篇稱作〈凝視白色的五〇年代初葉〉的序文中，有一段是這麼寫的：「在激盪的中國近代史中，理想的追求、幻滅與再探索的不間斷的過程下，中國人民、知識份子和青年，付出了極慘重的代價。然而，人們似乎只是夸夸然、甚至森森然論說著那表面的過程，卻極少探視在那過程下，在遙遠的、隱密的囚房中及刑場上，孤獨地承受一時代的殘虐、血淚、絕望、對自由最飢渴地嚮往、對死亡最逼近的凝視、對於生人最熱烈的愛戀……的無量數年輕、純潔、正直的生命。」

便是這段話，讓我鼓起了勇氣，決定在戲的最終，置入小說《山路》中，那段經常引人議論的文字。當然，相信對於鍾浩東、蔣碧玉……以及幾乎所有白色恐怖的一代政治受難者而言，加諸於他們身上的刑殺、酷虐與囚禁，都不是以國民黨一黨的苛烈暴政來進行控訴，便得以明白說清楚，而是更深一層的揭舉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結構性面向。

然而，當受難的理想青春仆倒在馬場町刑場時，留在他們胸口上的血漬，將如何在海峽兩岸的後世人，又或全人類受壓迫的人心中，轉化做即便是一小堆的火苗呢！這是當下很迫切的命題，便也是這命題的迫切性，讓「山路」中透過蔡千惠這位平凡卻真摯於革命事業的女性，

所提出來的質問，有了跨越一時一地時空意義的穿透性。如今，也是以受到一如鍾浩東這樣犧牲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刑場的召喚，回過頭來，用蔡千惠的一席話來詢問革命之於「黨」，至今到底尚存餘溫有多少呢？當然，這都只是出於改革開放卅餘年來，資本主義道路在大陸上實行後，所形成的階級差異、生態環境破壞、底層新工人的生存現實而發出的質問；並無關於島內種種反共親美媚日的謬說；更與教條左翼毫無任何思想與實際的牽涉！

(一)

我與映真先生相識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非常多的共處的時日裡，讓我從一個浪漫於寫詩生活中的文青，轉而為對於文藝改造世界，有了愈加豐厚的想像……。

於是，在經歷了《人間》雜誌雖僅幾年卻無比激盪的學習歲月後，又經先生的引介，走上以打開第三世界視野為主軸的民眾戲劇道途。這道途，必然是炫爛喧嘩以外的孤寂，也必然在風霜雨血中，困頓於當下的現實。然則，路一旦被開啟，便有了繼續往前行的某種說不上來的召喚。這召喚，最早在《人間》雜誌時期，因著前衛劇場導演王墨林，從日本引進「不死鳥劇團」的《花崗事件》報告劇，而打開另一種戲劇之於現實的美學實踐，重返布萊希特（B.Brecht）敘事劇場的場域中。當劇場以一種既抽離於幻象，又直面於被刻意割離的記憶相遇時，報告劇恰恰是民眾重返人間舞台的關鍵時刻。

就在一九九四年，台北六張犁公墓，兩百餘座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墓碑，在經年累月經棄置於島嶼黑暗肅殺的歷史中，再次在人們的凝視下，被五〇年代地下黨人捧起。當壓殺的記憶回到屍骨已寒四十餘載的亂葬崗現場，映真先生站在一處臨著墓碑旁的土堆駁坎上，神情何等凝重地望著一座座被從泥堆中拾起的碑石，他久久的無言，卻打開了歷史將不再被終結的壓殺記憶。

隨著這項記憶的逐漸開啟，他交到我手上的，是書寫著冷戰戒嚴白色恐怖肅殺風雲下的報告劇本《春祭》。我並以「人間民眾劇場」的演出名義將這報告劇搬上舞台。廿多年的時間就這樣匆匆消逝……我一直記得，當年在「南海藝術館」演出時，席上擠滿了遠遠超出預期之外的觀眾。一場出土的歷史報告，以一種穿越歷史迷霧的身姿，引領著座席上的人們，張開了久久被冷戰／戒嚴體制所壓殺並制約的感官，隨著劇場的報告，推開一扇扇禁閉、囚錮的鐵門，進入另一個血腥的屠戮時空中！

就這樣，徐慶蘭這位於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仆倒於馬場町刑場的受難者，以靈魂之身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只是在冷然中帶著些許的激動，這樣子拉開了整場的序幕。他說：「五月，下著傾盆大雨的那些天，我的親弟弟阿梅蘭終於找到了我的墓塋。沒過幾天，阿梅蘭和一群老同志、老難友全來了，在這塊拋荒四十年的墓地上割草、找墓，終於讓你們找出了兩百個身屍不曾回家的同志們……」

在六張犁白色恐怖亂葬崗上，一具具沉埋在泥土中的小小碑石，像是找到了脫離自身不知

有多少荒蕪歲月的眼、的鼻、的耳以及被強制噤聲的口，說出了埋藏地底暗黑的心頭話，說了：

「那一天，阿梅蘭，你在墓碑上認出我的名字，你哭了。我就站在你的身旁。我也哭了。可是心裡是高興的。四十年了。阿梅蘭，你來得真好。」

兄弟相見，竟是活著的弟弟找著了阿哥的一堆屍骨。當然，阿哥的魂說的字字句句，都穿過厚實的、農務勞動的胸膛，打進弟弟內心深處！在《春祭》開場不久的劇中，陳映真是這樣為不見天日的受難屍骨而寫的：「我知道，這幾十年中，你始終不曾忘了我。沒有你四十年來堅心決志，為了找我這幾根骨頭，尋尋覓覓，今天，這兩百把屍骨也不知要被沉埋到幾時！」

陳映真一生只寫過一首詩：〈工人邱惠珍〉；他的唯一劇本便是報告劇：《春祭》。在這裡，我們就像是回首穿越一處黑暗而幽深的山洞，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巨大暗影裡，有人燃起了一根火柴，照亮一整個左翼世代的微光！

(三)

現在，大陳遠行了。我且留下的文句，作為對他至深的敬愛與懷念。我說：我稱呼映真先生為師，因為他是我文藝創作上的點燈人；同時，亦是思想上的啟蒙者。雖然，映真老師與魯迅先生相同，都寧可與青年站在等高的視線上，而不願是被高高捧起的仰慕對象。但，人對理想世界的精神追求，總是依著一道起伏伏的弧線，最後抵達一處得以較為清晰看見自身與世

界的口岸！

我便是站在這口岸上，久久望著如今已然遠行的映真老師。回憶像穿越一條暗幽的鐵路隧道，在冷戰／戒嚴彌天蓋地而來的、我的青春歲月，燃起了隆隆車軌聲中的一盆爐火。我是蹲在那爐火旁，用睜亮著卻也不免是憂愁的雙眼，閱讀〈將軍族〉的青少年。

恰是那雙眼所勾勒起來的景象，我走進了延伸自中國三〇年代革命文學的、你的文學創作的場景。儘管滿天風雪並腳踩炙熱的火炭，卻引領著苦悶島嶼上的青年如我，如更多渴盼在文藝中，牢牢緊握斷裂社會的繩索的同輩們，共同奔向那在風雪炭火中逐漸消失而去的一盞燈火！是在這樣的情境下，走進了你在曠野荒漠中，所搭建起來的關於「第三世界」與「左翼民族統一」的思想庇護所。在這裡，僅提供足以飽餐的飯食，卻有精神的糧，足以長途跋涉一條荊棘滿佈的山路！回想起來，便是你初初引介我至「夏潮雜誌」，而後，開啟門戶讓我走進《人間》雜誌的一九八〇年代中期！

這以後，朝著你的左眼所拋出的視線，我走上叢生著野草的荒蕪大地上，恰有一張張從帝國的殖民與宰制下，揮卻長夜的噩夢而醒過來的臉孔；在那朝陽安靜地灑下解放的晨曦的路上，回家的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第三世界；都有一齣從底層探出身世來的民眾戲劇。這道路，走著走著……已有廿六年的歲月。並相繼成立「人間民眾劇場」與現今的「差事劇團」。於今回首一九九四年，從你手中交給我的、你平生唯一的報告劇本：《春祭》，至今溫度長存！並將依你當年想望重新演出的意願，節錄重要部份搬上舞台！

近些時日，劇團友伴以「眾志」為號召迎來北京「新工人藝術團」，在一次演唱後的座談會上。我提及，改革開放超過卅年後，大陸在國家富強中帶來人民之間高度的階級差異，殘酷的資本積累導致境內的第三世界問題，人口超過二點四七億之多的新工人，遠離家鄉的農業生產，投身都市現代化的底層，加上六千萬在農村留守的兒童，共同馱負起經濟落差而來的諸多發展的代價！這種種憂慮與反思，恰恰是沿著你左翼民族統一的道途，延伸至遠方的艱辛旅程！

如今，你遠行了！我們正越過一個又一個歇腳的口岸，繼續趕路的旅途！

◎以生命踐行左派理念的陳映真先生

◎鍾春蘭

十一月廿二日，台北的入冬，天候特別溼冷。

我一如往常，下班後回到景美的公寓，忙著張羅晚餐，永松則是每日例行的運動：到附近的仙跡岩爬山。備好簡單的晚餐，躺在沙發上歇息，才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銀幕上跑馬燈顯示出幾個字：「小說家陳映真病逝，享壽八十二歲」，一陣驚訝、錯愕，此時爬完山的永松正好推門返家，我告知此事，「啊！啊！」他一副難以置信的反應。其實兩年前，因為商務他跑了一趟北京，即略知陳映真的病況，但陳映真辭世的消息傳來，還是那麼令人感傷、不捨。

記得也是入冬時節，永松第一次去北京，行前，他託囑在北京社科院任職的朋友韓嘉玲，可否聯繫上陳映真的夫人陳麗娜，他想去探望大頭（陳映真的綽號）。圈內熟悉的朋友都說：陳麗娜擔心朋友到訪，會讓大頭情緒起伏太大，對心臟病人不利，所以一律謝絕。在北京談完公事了，永松還是記掛著大頭，他又請託另一熟人聯絡，因為他堅信：憑他和大頭的特殊革命交情，無論如何都要見上一面。等啊等的，北京的氣候比台北更濕冷、凜冽，十年不見，故友近在咫尺，想念之情加上等待的焦躁，讓一行人坐立不安。一方說：等等，很快就會有回音；另一方說：不能等了，回程的班機訂好了，再等下去就要拖好幾天喔！永松終於無奈地說：好吧！我們走吧！

一行人在奔往機場的路上，永松的電話響起來了，電話那一頭是陳映真的夫人陳麗娜，十多年不見，她只開口：「你好嗎？」，便哽咽啜泣，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但僅僅如此，永松相信：陳麗娜和陳映真夫婦應能感受台灣友人對他們的深深關懷。

學文的我，年輕時是媒體人，也愛在《幼獅文藝》、《皇冠》寫寫散文、小說，和當時的文青一樣，著迷陳映真的小說：《鈴璫花》、《唐倩的喜劇》、《夜行貨車》、《萬商帝君》……

是先天對文字的駕馭就有魔幻般的天份吧！他的作品對人事物景況的掌握、描模，其強大的渲染力，令人嘆服，華人作家也少有人能及。當時當個雜誌主編，靠採訪撰文、編輯修改他人文字為生的我，對他是既崇拜又好奇，對他筆下所傳達的想法、信念，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真正開始認識他，了解他的作品，和他有交集，是嫁給永松，掉入左派的「大染缸」後。記得第一次在「台北空軍俱樂部」聽他演講，那是他出獄後首次的公開活動。我已忘記他講的內容了，但至今我還清晰的印象是：場內歡欣的、熱烈的氣氛，對主講者陳映真好似英雄般的仰慕期待，現場聽眾彼此自家人似的親切送暖，那是我聽過無數次演講所不曾感受過的經驗。

之後，在左派圈內的一些活動，如左派另一要角：《夏潮》雜誌總編輯蘇慶黎赴美深造前的歡送會，留美作家陳黎回台的聚會……其間陳映真的身影，儼然就是台灣左派的頭頭，

或者說至少是精神領袖。

永松和陳映真熟稔，除了是思想信念相同的革命同志之外，還有兩家家人都互有往來。當時永松家在和平東路二段開一家「聯合印刷打字行」，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則租賃在附近的巷子裡，雜誌的一些稿子就交由聯合打字行處理。一九七八年黨外時期發生的高雄大橋頭事件，國民黨以隱匿匪諜為名，逮捕余登發父子，引發黨外人士的遊行示威抗議，蘇慶黎特南下高雄到場聲援。返回台北後，找了永松和陳映真，三人在一間咖啡屋商議如何製作文宣，聲討國民黨。在那風聲鶴唳的緊張時刻，沒人敢冒被逮風險印製文宣。說著，說著，陳映真轉首徵求永松意見：「聯合好嗎？」永松頷首應允。

永松剛出獄時，身無分文，連個交通工具摩托車也買不起，找個工作，調查局又在背後暗中作梗，當時，陳映真的弟弟陳映和（也因陳映真事件坐牢，在綠島監獄和永松同房）便是永松的最佳交通工具。陳映和常騎輛摩托車載著永松，四處參觀各項展覽，尋找就業機會，還發生不少有趣的妙事。

陳映真關懷社會底層庶民、為勞動階級發聲，反美式資本主義在第三世界掠奪的左派思維，不僅在其文學作品中表露無遺，他還在一九八五年創辦了《人間》雜誌，落實他人道關懷的理念。當時我在企業支持的一本女性雜誌擔任主編工作，台灣雜誌界的生態，包括銷售發行，我算是內行的。彼時，同行們都流傳一句話：「要害一個人，就慫恿他去辦本雜誌。」可見辦雜誌的艱辛不易。而陳映真竟然以個人之力劍及履及地實踐他的夢想，友朋們都替他

捏把冷汗，也就是他這種義無反顧的精神，感動了藝文界不少人爭相投入協助，更開創了台灣以攝影寫實為主的報導文學先河。

理想終究不敵現實，《人間》雜誌雖然在知識分子間頗受好評，也培養了陳列、藍博洲、關曉榮、阮義忠等知名的作家、攝影師，但因雜誌常以揭露社會黑暗面的素材為主題，並不討喜，發行量有限，在財務重重壓力下，《人間》雜誌還是於一九八九年停刊了。

儘管如此，陳映真個人的文學創作及左派理念的論述並沒有稍或停輟。影響所及，台灣在七十年代到民國八十年代初期，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如解嚴之前的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自然生態保育運動、婦女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在解嚴後對台灣民主影響至深的野百合運動，無不深受陳映真思想的啟迪。根據後來的學者研討分析，發現：野百合學運較解嚴前的學生運動，從動員、組織、訓練至運動的開展，因歷經七十年代的各式議題，累積了充足的經驗，是野百合學運成功的推力。

早期陳映真曾在夏潮雜誌參與編輯，後來交棒給蘇慶黎，以夏潮雜誌為核心的左派思維的擴散、延續下來的徒子徒孫，遍及各行業的中堅份子，有些還先後在國民黨身居要職。換句話說，左派提倡的一些作法和思維，也部份注入國民黨人士的腦袋。這之間，無疑的，陳映真可是發揮影響力最大的關鍵人物。

就以我們自己來說，永松是出身破落戶家庭的「天然左」，因反當年國民黨蔣家的專制，大二開學時即被捕入獄。出獄後，在當時幾個黨外人士的協助下，成立一家小公司，後來又

轉型為以金融科技為主的喬美公司。這些年來，我們所推出的產品：「安家30」及「p2p借貸平台」，無不以金字塔底層普羅大眾的需求為考量；而公司創立迄今，其間歷經種種困頓、挫折，還能屹立不搖，說穿了，就是背後有左派的信念在支撐。

應該是二〇〇五到二〇〇六年間吧！永松在高雄長庚醫院換肝後返回台北，正努力重建已成廢墟的公司，聽聞這些年陳映真為心臟病所苦，和我一起到中和陳映真的寓所探望他。兩人都是大病初癒，似有千言萬語要談，但看得出他一向高大岸偉的身軀已略顯疲態。因為是自己人，他的夫人陳麗娜也不忌諱地在我們面前抱怨他飯後都窩在沙發，不肯運動。我長期照顧換肝的病人永松，算是半個護理師了，所以和他們分享我的經驗及心得。

幾天後，我接到陳麗娜感謝的電話，說現在陳映真聽進我們的話，飯後已開始到附近公園散步；還有，陳映真要我協助找台灣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發生的一些社會事件，我不知道他要這些資料幹嘛，不料沒多久我在聯合報副刊居然看到他的大作〈文明和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陳映真以他思想的深度和廣度所作的論述，不是我的能力可驟下判斷的，我無從置喙；令我感動的是：我清楚明白他健康不佳，在那情況下，他還努力不懈地為文，作思想的辯解研究。而且，不是三、兩年，是五十年了。不論在文學創作、在思想論述上，有如此份量，如此影響力的，放眼華人世界，應該無人出其右了，怪不得徐復觀讚譽他為「海峽東西第一人」。

台灣現在是獨派當家，對於自始主張「兩岸同屬一中」的陳映真的辭世，有人以「政治

不正確」等冰冷的語言來嘲諷，我認為這未免太小看陳映真了。從歷史發展的長河，我們知道：政治的光環都是一時的，然而對弱勢的人道關懷、對專制桎梏的反抗、對不公不義的發聲，這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任何改朝換代都不能移的鐵律。相信隨著時間的淘洗，這位思想與行動始終一致，一生踐行左派理念的巨人，將會有更多人認識他、接受他、尊崇他。

緬懷和陳映真搞革命的那段歲月！ ◎簡永松

十一月廿二日晚間，從電視得知您已離開我們的消息，心中悵然若失。一位英雄的殞落，留給後人不勝的唏噓、悲嘆。

六〇年代我們都受過政治牢獄之災，在獄中那段艱苦的歲月，我們雖近在咫尺，卻始終無緣和您碰面請益，令弟映和則和我有多年的同房甘苦。

記得出獄後的第二天，我直奔貴府，欲尋求心靈的補償，期盼能從您和映和那裡可以取得一些關於國內、外時勢和思想方面的資料。

我們是在一家小咖啡館見面的，當天在場的還有一位年輕的朋友——蔣勳，可是您並沒有介紹他，反倒是蔣勳一再地打量著我，我想他可以意會您正試圖保護我們。您談話時還不斷地左顧右盼，查看周遭其他客人的流動。

當時我們各叫了一盤蛋包飯，香噴噴的蛋包飯配上一碗蘿蔔排骨湯，直至今日，我仍記憶猶新。這大概是久居牢房對外面事物新鮮的探索，直到現在仍不能忘懷。

待蔣勳走後，您拿出魯迅的《阿Q正傳》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給我。這兩本左翼知識份子必讀的書籍，我迫不及待地拿回家，一口氣讀完。知識的饑渴填滿我的胸臆，大約一個禮拜後，我先把《阿Q正傳》還給您，您問我感想如何？我說還好。您當下要求我再讀一次，您說：

「到現在為止，我已經讀了四十九遍了。」我有些不好意思，然心中嘀咕著：淺顯易懂的《阿Q正傳》，竟然值得您讀了四十九遍？

有些小聰明的我，讀了第二次後，不由自主地再讀了第三次、第四次，才發覺，自己的程度還不足以理解《阿Q正傳》的真義。後來，我找到夏丏尊的《阿Q正傳詳解》，方才領略一代文豪魯迅字字珠璣的用心良苦。

經過這次的教訓，此後我讀書只讀經典名著，且再也不敢囫圇吞棗。讀到好書我不僅勤作筆記，甚而有精讀二十次以上「欲罷不能」的紀錄。

第一次和您並肩作戰，是為了立委增補選。我們密集地到中部地區，幫助黃順興先生輔選，為了整合串連，我倆徹夜編輯出競選的戰鬥歌曲，您把當時黑人爭取人權的反抗歌曲《We shall overcome》（我們終將得勝）引進國內，串聯全省新歌教唱。彼時，我到台中大雅動員惠明盲校的師生，在政見發表演場地引吭高歌，許多在場聽眾不禁潸然淚下地附和著。

在那一次選舉後，您應邀到東海大學演講，為了避免情治單位的跟蹤阻撓，前一晚趁著夜色朦朧，您在公路局一下車，我即騎著摩托車去接應，接著，我在台中市區大街小巷狂繞，試圖擺脫情治單位的跟蹤。當天晚上，我們窩居在台中一間小小的旅館，內心很是興奮：東海大學的學生社團竟敢排除校方阻擋，邀您演講！還有，得以躲過特務的耳目跟蹤，得到片刻的寧靜，我們又有幾分戰勝敵人的莫名喜悅。

是的，我們都暫時忘卻再度坐牢的風險，沉醉在為推翻國民黨極權專制的激情中。那晚我

們兩人都興奮得睡不著覺，猶記得您突然問我：「你的左派思想傳承，來自何處？」我一時答不上來，您哈哈大笑地說：「啊！你是石頭縫蹦出來的！」

說起我的左派淵源，小時候因為父親喜歡收聽日本NHK短波電台的廣播節目，我呢，則常接觸大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高中二年級時，我和祖父母同住在外一個沒有鄰居的果園。在那個環境，我可以每天肆無忌憚地收聽文革時期的「革命教學」節目。有次，我收聽到姚文元的《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這樣的宣言，還揭示「沒有平等，就沒有自由、博愛」的觀點。當下即起我內心深處的共鳴，讓我立下宏願，此生要為追求平等而奮鬥。後來，我讀完Eric Hoffer所撰寫的《The True Believer》，更加了解自己的思想淵源。原來，我來自一個破落戶的家庭，十歲以前，父親和外婆家都以碾米為業，是鄉下仕紳。小時候，我從沒有體會過「匱乏」的滋味，每次遇到外祖父，總有吃不完的零食。破落戶的家庭是培養革命者的溫床，也是堅定不移的「信仰者」的誕生地，這是後來自我探索得到得結論。

為了避免過度招搖，那一場東大學生社團所安排的演講，我沒有在現場當聽眾。事後，從東大的朋友口中知道，您又造成了了一股旋風，這是預料中的事，我們都以您為榮。

「十·三事件」您再度被捕，有一段不為人知的秘辛。國民黨實在是太懼怕您了，他們畏懼您為貧苦大眾、窮困的勞工散播強烈的同情，無時無刻都在監視著您。說巧不巧，就在當年九月廿八日左右，情治單位把您給跟丟了，找不到您的下落。原來是我邀請您和大嫂陳麗娜，還有另一位無期徒刑的難友陳水泉先生，到我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南投經營的高冷蔬菜農

場遊玩。跟丟您，可是情治單位的嚴重事件，當然得抓您回去問個清楚。

回想起那幾天在高山上的生活，我們的笑聲就迴盪在兩千四百多公尺的高山上，山巒層層交疊，群鳥盤旋天際。記得大嫂麗娜看到路過的原住民青年，一面嚼著青綠色的檳榔，一面吐著鮮紅的檳榔汁，面有畏懼地問您，為何吃綠色的檳榔卻吐出紅色的檳榔汁？

「因為每嚼一口檳榔，要咬一下舌頭，吐出來的當然是紅色的囉！」

「那不會痛嗎？」大嫂麗娜信以為真的問，令我們哄堂大笑。

無巧不成書，柯水源先生也在情治單位的跟蹤下，跟丟了人，其實也是和我到山上遊玩，這兩件事情的糾結，還有紀萬生和許多同好的投資，我經營的小農場成為南投警方與情治單位列為重點的管理單位，並成立「山地青年服務團」，嚴加看守我。

爾後，我經營的公司情治單位都特別注意。情治單位甚至還意圖補貼經費給我公司的會計，企圖佈點偵查。有些人被嚇跑，有些則把實情向我報告。這是我們這些政治受難者所面對的現實世界——在監獄坐小牢，出了監獄坐大牢。

苦難似乎一直籠罩在台灣上空。二〇〇〇年在全民期盼下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執政，然而打著「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的扁政府，卻想通過六一〇八億的軍購案。基於「和平就是最高的道德」，我們不能容忍扁政府把台灣推向戰爭邊緣，於是在反軍購的大遊行中，我們又站在一起。當時，我才剛從高雄長庚醫院換肝歸來，和您漫步在台北街頭三個半鐘頭，您一直要我休息，我又怎麼忍心放下您們先行脫隊呢？

今天，您倒是先我們而去，您的靈魂徘徊在北京上空，瞭望著祖國大地，固守著兩峽海岸，為反帝、反獨和祖國的復興擔憂著。

寫到這裡，耳邊安息歌聲響起：您流血照亮的路，我們會繼續前行：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祖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

現在是我們的責任，去爭取民主自由



落葉歸根

悼念陳映真先生

◎藍博洲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十四時卅六分，陳映真先生在北京告別人間了。

消息傳出，島內的諸家媒體都意有所指地以「憾未落葉歸根」、「客死異鄉」的大標題作了「蓋棺」報導。

那麼，映真先生的「根」，也就是「故鄉」，在哪裡？

根據先生自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他與雙胞胎哥哥出生于日本統治下殖民地臺灣的新竹州竹南街中港莊的牧師家庭。這樣，他的「根」應該就是臺灣光復後改制為苗栗縣竹南鎮的濱海的中港漁村了。可是，他後來的文學作品並沒有呈現任何與這個小漁村的生活關聯，只有一個用母姓寫評論文章時的筆名「許南村」做了一絲「根」的連結。

其實，陳映真早就過世了。

映真先生本名陳映善，不到兩歲時過繼給三伯父後改名永善。映真，是他雙胞胎兄弟的名字。他說，後來生父全家從竹南搬往桃園，兩兄弟不得不依依不捨地分開了。到了日據末期的一九四四年，為了躲避盟軍飛機的轟炸，生父和養父兩家都疏散到臺北縣鶯歌鎮，永善和哥哥映真又相見了，並且一同歡歡喜喜地進入鶯歌公學校就讀。

九歲那年，有一天，在上學的路上，映真突然「肚子疼」而一臉蒼白，永善把小哥送回

生父家，然後自己一個人落寞地上學。映真住進了臺北的醫院，再也沒能回到學校。幾天後，在鶯歌車站，永善看到生父捧著小哥映真白色的骨灰盒，走出「那個栽著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臺」。

我要走出這麼狹小悶人的小島

陳映真的夭折使得初嘗死別的陳永善覺得失去了一個對等的自我。他異常悲傷，終日流淚哭泣，感到無限寂寞。多年以後，為了讓死去的小哥與自己一起活著，他於是在作品發表時署名陳映真。從此以後，活著的陳永善通過他的文字，讓逝去的陳映真，連同鶯歌，成為文學世界裡一幅美麗而多彩的風景。

所以，陳映真的文學故鄉，應該是鶯歌小鎮了。

一九五八年，小說家的養父去世，家道遽爾中落。「許南村」在《試論陳映真》一文中自我剖析說：「這個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時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破敗的市鎮，貧困的家境，少年的迷惘和失落，鄉愁和青春期性意識的覺醒，加上在反共的恐怖的天羅地網中日益激進的思想所帶來的內心的激忿、焦慮和孤獨，於是就在他一九五九年開始創作之後，構成了早期作品中那種傷感、憂鬱、蒼白而且苦悶的基調。

一九六〇年九月，映真先生在發表於《筆匯》的短篇小說〈故鄉〉裡寫道：「平心說，特別是我的那個故鄉，是怎樣看也無法說它是個美麗迷人的，或者說可思念的。它是個異常缺水的地方。所以熟悉的人每當想起它來，幾乎都感到一種彷彿在盛夏裡午睡方醒的時候的那種無氣味的乾燥來。此外，那裡有將近六十支陶瓷工廠的煙囪，和一家公營的焦炭煉製廠。這樣，便把這小鎮常年地罩在煤煙底下了……它有著八個日夜火燒著的火爐。通到數十裡外的礦山的台車軌。沖洗的水流到溪裡，使半截的溪流裡再也看不見游泳的小童和浣衣的婦人們了……」

因此，小說家讓主人公最後無力地吶喊：「我不回家，我要走，要流浪。我要坐著一列長長的、豪華的列車，駛出這麼狹小、這麼悶人的小島……駛向遙遠的地方……沒有目的地奔馳著。」

大約是二十年後吧，一九六〇年三月出生的我，在思想沒有出路的大學時代讀到了這篇小說。也許是它恰恰反映了文藝青年想要遠離那保守、封閉的故鄉的心境吧，初讀這篇小說之後的我竟著魔般帶著病態地迷戀著這句話，並且過著那種小說家所謂的「波西米亞式的大學生活」。於是我也跟同時代的許多文藝青年一般，從小說家的處女作〈麵攤〉開始，進入他那一一直被視為「異端」的思想與創作的世界。因為這樣，小說家筆下「那個栽著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臺的故鄉小站」鶯歌，就在某種意義上成了我難以忘懷的文學鄉愁了。長久以來，在南來北往的旅途中，每當搭乘的縱貫線火車經過鶯歌小鎮時，我總是不由地升起一股莫名的激動，望著過站不停的快車窗外急速流逝的風景，學舌地吶喊著：「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

問題是，廿三歲的小說家所坐，那列駛向「沒有目的地」的「遙遠的遠方」的火車，終歸

會有終站的。

把這只筆獻給所愛的中國和她的人民

在鶯歌，映真先生親歷了臺灣光復、二二八事件，乃至於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大約小學六年級時讀了魯迅的《吶喊》，使他成為一個對中國的苦難和落後「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可他在「對於知識、對於文學，產生了近於狂熱的饑餓」的青年時代，卻只能在二〇年代以來的進步思想、運動與先輩們被國府徹底肅清的荒蕪中，透過臺北舊書店街殘存的進步書籍，尋找思想出路。

一九六四年一月，映真先生又從破敗的鶯鎮的生活經驗汲取創作的養分，發表了一篇反映中國內戰所造成的民族悲劇的重要作品〈將軍族〉。他塑造了「兩個飽經挫敗和凌辱的卑屈的人物」，一個是年過四十，內戰後隨國民黨軍隊來台，領了退伍金的東北老兵；另一個是十五、六歲，被家人一賣再賣的東部後山的小女孩。這兩個無力和巨大的現實對決，而把光明和幸福的人生寄託在一個神秘的渺不可知的來生的「卑微的人物」，於是成了兩個典型的小說人物。當今臺灣政客們隨便嚷嚷的「族群融合」的問題，恐怕還沒有哪一個作家像〈將軍族〉那樣真誠而深刻地直面現實。這點，除了對近代中國歷史悲劇的深刻體認之外，他在鶯歌的具體生活經驗應該也是一個重要的元素吧。他曾經在〈鞭子和提燈〉一文，描述「小哥死後幾年」

和「屋後遷來一家姓陸的外省人」相處的美好經驗。然而，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他家後院住的外省人陸家兄妹倆，也分別在鶯歌和台南糖廠被捕。

一九六八年五月，映真先生被捕入獄。判決定案後，他被移監「四面環山，被高大的紅磚圍牆牢牢封禁的」台東泰源監獄，從而「頭一次遇見了百數十名在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前後全面政治肅清時代被投獄、倖免被刑殺于當時大屠的恐怖、在中已經度過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他後來寫道，通過這些老政治犯，「他終於和被殘酷的暴力所湮滅、卻依然不死的歷史，正面相值了。」這時候，對青年小說家陳映真來說，那些在「五〇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臺灣，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再也不是恐懼、神秘的耳語和空虛、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那列在「遙遠的遠方」奔馳著卻「沒有目的地」的火車，終於有家可歸了。

從日據以來臺灣左翼運動的歷史長河來看，歷史恰恰在這裡讓映真先生扮演了一個承先啟後的角色。正因為有過這樣直面被湮滅的歷史的經驗，他後來的中國認同才會不同於他人的發展與堅持吧。

一九七五年七月，隨著蔣介石的逝世，映真先生在監禁七年後特赦出獄，隨即積極投入方興未艾的黨外民主運動。一九七六年他參與《夏潮》雜誌的創刊與編寫工作，歷史地成為鄉土文學論戰的主將，也被公認為「臺灣鄉土文學的一面旗幟」。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他再次被捕，拘禁卅六小時後釋放。在偵訊時，他才知道當局「有專門對他的作品和言論做系統的思想檢查

分析和彙報的專業思想偵探」。儘管如此，他還是通過有台獨傾向的《美麗島》雜誌發表〈關於十·三事件〉一文，報告歷劫經過，同時宣稱：「我深深地感覺到我的事業畢竟在文學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馱負著與我的才能不稱的關愛，我決心不論今後的生活多麼艱難，我要把這只筆獻給我所愛的中國和她的人民。」

面對黨外運動朝著暗藏台獨主張的歧路前進的嚴峻形勢，映真先生又在十一月，通過出版小說集《夜行貨車》的自序，再次表明了堅定的中國認同的寫作立場：「在中國，和在古老的亞洲一樣，一切不屑于充當本國和外國權貴之俳優妾妓的作家的命運，是和寫一切渴望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自由、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和公平、進步的人民一樣，註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監禁和死亡中渡過苦難的一生……物質生活基本上公平和充裕；精神生活上不虞組織性的謊言和神話教條；政治上充分的自由、民主；國家完全的獨立；民族從帝國主義下獲得解放……這一全中國人民共同的、不可壓抑的、不容妥協的願望，就是海峽兩邊中國作家自己的願望。他們決心不惜犧牲性命，為實現這一民族共同的願望，和全中國人民一道，奮鬥到底！」

但是，十二月，南臺灣的高雄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映真先生憂心地看到，以此事件的「勃發、公開審判和判決的全事件程序為分水嶺，臺灣的政治思潮和文藝思潮發生了鮮明深刻的變化。」

他說：「我眼看著著原本毫無民族分離主義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而然的中華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一部份臺灣文學界朋友，和全社會全知識界的思想氛圍，以『美麗島事件』為界，逐漸從反國民黨的義憤，向著反民族和分裂主義轉向。」

然而，他又說，在「台獨」運動和以他所屬的《夏潮》為中心的左統派都同受當局「嚴重的虎視」的當時的條件下，左統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卻無法對民族分離派的論述開展針鋒相對的批判鬥爭。於是，他只能就「台獨」意識產生的社會構造和歷史根源，展開思想的清理與批判。

根

一九八三年起，在政治禁忌猶存的年代，映真先生進一步勇敢地展開他揭露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系列小說創作〈鈴鐺花〉與〈山路〉。與此同時，他又發表〈綠島的風聲和浪聲〉，公開呼籲當局立刻全部釋放五〇年代被捕的政治終身犯。一九八四年元月，坐滿三十年以上監牢的十一名政治終身犯終於假釋出獄。他又進一步發表聲援最後兩名監禁已達卅三年以上的五〇年代政治終身犯的〈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

通過他的小說與報告，戰後出生的臺灣青年一代才第一次具體地觸及到長久以來臺灣社會「夫不敢傳妻，父不敢言子」的恐怖政治的歷史源頭。我也因為這樣的啟蒙而開始有了想要進一步認識臺灣歷史的渴望。

〈鈴鐺花〉和〈山路〉是兩篇以動亂時代在鶯歌小鎮表現的局部畫面作為典型環境的短篇

小說。其中，〈鈴璫花〉是映真先生親眼目睹代課老師半夜被人用吉普車帶走，留下白髮蒼蒼的母親在土屋中悲泣的童年經驗。到了〈山路〉，「從礦山蜿蜒著驚石山，然後通向車站的煤礦起運場的、那一條細長的、陳舊的、時常叫那些台車動輒脫軌拋錨的台車道」，已經不再是年輕時候讓他想要遠離的破敗的故鄉意象，而是「一心要為別人的幸福去死」的革命青年理想寄託的「山路」的象徵了。

這條蜿蜒曲折的「山路」，其實就是以中國的孩子自居的映真先生情思所系的「根」之所在。對病逝北京的先生而言，根本就沒有人們所謂「落葉未能歸根」的問題與遺憾吧。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七日，深夜，於北京木樨地）



嚴厲的鞭子與腳前的提燈

——永誌不忘陳映真

◎關曉榮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三日接到陳映真先生過世的電話。先生離台赴京不多久再次病倒，為了讓他能在平靜中與病魔搏鬥，我們抑制了探視的渴望，直到天人永隔的消息傳來。悲痛的熱淚在所難免，同時也警覺到熱淚底下有一股博大深沈的激盪，雖然一時之間難以透析把握那激動的內涵，但也清楚地知道一則鄭重明確的警示：要求我不准在淚水中停留！景美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二〇一五年為回顧陳映真先生創辦《人間》雜誌三十週年，策劃了「鄉土《人間》與台灣特展」巡迴展，原排定我在十二月三日講話，為了參加十二月一日先生在北京的告別式，只得取消。

一九八五年人間雜誌創刊後，大陳（人間雜誌的老戰友們對陳映真先生的尊稱）僅僅粗略地對我說過；在他參加美國愛荷華作家工作坊期間，大量接觸到西方報導攝影家們豐富多樣的攝影作品，報導攝影對社會現實的探究和批判的巨大力量，讓原本專於文學創作的大陳感到異常震動，這正是大陳回台後立意出刊《人間》雜誌，以報告文學結合報導攝影為媒介，從事台灣社會現實的探究、揭發、批判與報告的因由。於今，大陳病逝北京，再也無法通過談話，進一步了解大陳當時所接觸到的報導攝影經典作品的詳細內容。儘管如此，從影像紀實和社會發展的視角進入紀實攝影史的脈絡，從中國內戰、冷戰造成的兩岸分斷史實、世界體系的政治經

濟學、社會學、傳播學的脈絡，探討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的歷史定性，還是一個值得努力研究的取向。

大陳特別提到發軔於西方發達工業國的報導攝影成就給了他巨大的影響。就戰後台灣紀實性影像的社會揭發與批判性格而言，曾經遭到軍事戒嚴體制的政治干預與鎮壓，而失去其發展生機。應該指出在一九六八年陳映真被逮捕前，在台北文化圈引起熱烈關切與討論的紀錄片《劉必稼》。拍攝《劉必稼》一片的著名導演陳耀圻在該片遭到政治盤查後，曾有一說：凡是看過《劉必稼》的人將受牽連。回顧《劉必稼》一片，陳耀圻的攝影機選擇了一個誠實素樸、平等的視角，真實地呈現了一個由中國農民成為內戰老兵的劉必稼，在兩岸分斷的台灣思念故鄉的身體與生命堅強樸實的容顏。即便在今天來看《劉必稼》都不難感受到，通過電影攝影機對一個平凡但無可替代的真實的人的本色和尊嚴的忠實體現。很難相信，在大陳更廣泛地接觸西方報導攝影之前的軍事戒嚴時期，紀錄片《劉必稼》沒有給大陳一番影像傳播的感動和啟發。但，終究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涵義的一九六八年，在冷戰與中國內戰的軍事戒嚴體制下，陳映真先生遭到逮捕與黑牢的禁錮，台灣社會的紀實攝影也遭到扼殺、封凍。

西方的紀實攝影在西方各國工業化社會，深刻地紀錄與揭露了被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壓迫、剝奪、侮辱、損害的生產者的生命史，談論西方紀實攝影史，就不能不談它們的重大貢獻，以及紀實攝影的精神典範。大陳在百般困難的情況下毅然創辦《人間》雜誌，應可看作在冷戰與中國內戰時期，繼文學戰線上的鄉土文學論戰後，對台島軍事戒嚴體制宰制言論、思想的禁區，

為台灣社會變革不屈不撓持續戰鬥的另一重大突破。在攝影家王信淺談報導攝影和郭力昕介紹「離鄉的母親」篇章裡，分別提到傑科·瑞斯 (Jacob Riis, 1877-1892) 「另一半的人這樣活著」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 路易斯·漢 (Lewis Hine) 以及桃樂西亞·蓮恩於一九三五年加入的「美國農業安全局」 (FSA) 的專章介紹。這些不勝枚舉的攝影者和 FSA 組織的巨大成就，正是紀實攝影的人文關懷與批判性社會實踐，在美國工業化發展進程中，依據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的問題意識和觀點，展現其重大影響力的紀實攝影經典。攝影的先驅者路易斯·漢對他的攝影工作所持的觀點和精神說道：「有許多事情必須被糾正，有許多事情必需被重視。」在一部他的傳奇影片中提到他參與「匹茲堡調查」工作期間的一段採訪筆記，他問匹茲堡的南歐新移民勞工覺得在美國的生活如何？移民工的回答是：「我們不生活在美國，我們生活在美國的下面」。再及於「美國農業安全局」 (FSA) 自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三年間，十一位攝影家足跡遍及全美各地所拍攝的，數量和質量都極為可觀的紀實攝影典範裡，應該看到《人間》雜誌所執著的報導文學和報導攝影，直指「活在台灣的下面」被壓迫、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的精神，是與「有許多事情必須被糾正，有許多事情必需被重視」相呼應的。大陳在《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書中的序言裡寫道：「我曾私下企盼《人間》將在歷史中自然地發展成為一個報告攝影和文學的一派。見關曉榮的這本書，《人民攝影》便已不只是一個理論上的企盼了」。

「人民攝影」理論概念的提出，在世界紀實攝影的相關脈絡裡，應可溯源至成立於一九二七年，由廿五個工人攝影家活動小組聯合組織的「德國工人攝影家聯盟」 (Vereinigender

Arbeiter-Fotografen Deutschlands)。該聯盟的攝影觀指出：「攝影必須是以它最簡潔和令人信服的形式來表示一個動機。如果這需要一個變了形的透視，那是因為其意義最終被壓抑了，但這個終點並不在物質事物本身，也不在藝術作品中其目的在於使用攝影報導保留住自己的選擇、動機和自己的興趣所在」。

所謂「工人攝影家運動」從德國影響到英國，以及一九三六年成立於美國的「攝影同盟」(Photo League)，同盟在紐約的攝影學校成立時的綱領宣稱：「攝影具有非凡的社會價值，攝影者身上背負著紀錄今日世界真實面目的責任和義務。長久以來，攝影一直受畫意攝影家的愚民影響。攝影同盟的任務是將照相機重新交還到誠實的攝影者手中來拍攝美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國司法檢察官湯姆·克拉克(Tom Clark)將「攝影同盟」列入，「顛覆性組織」黑名单。時值冷戰時期的政治鎮壓，「攝影同盟」於一九五一年被迫解散。當年《人間》雜誌停刊，除去財務艱難以外，還隱含著後期編輯方針蓄意曲變的政治判斷。《人間》雜誌停刊斬斷了蓄意的政治曲變，大陳卻並未停止，而把戰鬥推向「人間」出版社，走向《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

許多天以前，在網路上看了《新國際主義者》雜誌客座編輯約翰·皮爾格導演的紀錄片《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片子很長，觀點敏銳論証嚴謹。片子裏有個「馬紹爾群島的祕密」篇，追溯了一九四六年美國在比基尼小島上的核試爆。試爆前美軍將世居於小島的島民全部強制遷離，核試爆幾乎摧毀了小島，留下高強度放射性核種。許多年後小島植被重生，又許多年後，美軍派出核輻射檢測團隊。並向遷離的島民宣稱安全了，可以回家了。島民帶著新生代孩童歡

喜地回到故鄉，渾然不知惡意加害的核輻射的大難臨頭。影片蒐集了紀錄當年被帶往美國進行核輻射對人體的破壞的檢驗、測度，卻不知這些帶著迎人笑臉的檢測背後殘民以逞的惡毒目的，是為了掌握核輻射對人體造成的毀損的研究數據。影片訪問了當年參加檢測的村長的妻子，在有人關切這些人這些事許多年以前，村長和遷回小島時還只是個小男孩的兒子，都已因核輻射傷害的疾病過世，受訪的妻子也垂垂老去，任海風吹拂她堅毅無欺、洞見暴虐的臉龐和花白的髮絲，她直視攝影機鏡頭說：「他被當做一個毫無價值的動物。」鏡頭並未立刻關機，看到那短暫停留在婦人臉龐卻彷彿永久的剎那，胸臆間波濤洶湧的激動化作熱淚急欲奪眶！我頓時明白；這股熱淚和大陳告別的热淚，以及蘊含在熱淚下的激動，正是大陳在《人間》雜誌創刊宣言和宗旨裏所明示的要義，要求我們與被壓迫、被剝奪、被侮辱、被損害的人，休戚與共，永不退卻，奮戰不已。

《人間》雜誌停刊以來，談論《人間》影響的話語至今不絕於耳，卻少見社會科學方法的考察和研究的見解，當前全球化與區域傳播的技術和資本壟斷，已進入空前的市場規模。左翼話語權的爭奪在傳播市場壟斷性支配下顯得脆弱無力，《人間》雜誌的形式已經一去不復返。左翼話語權爭奪戰的形勢日益嚴峻，遠遠超乎《人間》時代的想像。我們必須要有準備，我們開始準備了嗎？

大陳的肉身已卸下畢生負載的重擔，把一個思想者、踐行者「嚴厲的鞭子和腳前的提燈」交到我們面前。

輯 三

陳映真紀念活動紀錄



● 悼念陳映真——左翼的追思 活動紀要

◎ 范綱埜

二〇一七年一月七日，台北。一個天氣和煦的下午。在汀洲路上的客家文化主題園區，舉辦了一場追思會，紀念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廿二日病逝北京的陳映真先生。活動由陳映真生前的同事，友人：《批判與再造》雜誌社、《人間》雜誌同仁、「差事劇團」、「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釣魚台教育協會籌備會」等團體，共同策畫、籌備。

陳映真生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本名陳永善，苗栗竹南人。是台灣知名小說家，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創辦「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的《人間》雜誌。其發刊詞（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對於當代台灣社會的冷漠、殘酷，懷抱著改造的理想，被劇作家姚一葦譽為「一篇當代人道主義的宣言」。陳映真一生著述頗豐，曾掀起「鄉土文學論戰」、「台灣結與中國結」及揭露台灣社會新殖民主義、附庸性質的「依賴理論論爭」，提倡第三世界文學與消費時代的文學論。無論小說創作或思想評論，均產生深遠的影響，是華人社會文學界與思想界的一座豐碑。

總召集人，《批判與再造》雜誌社總編輯杜繼平表示：舉辦這場「悼念陳映真——左翼的追思」，除了追念陳映真的貢獻，更主要的是希望在追念之餘，再現、發揚陳映真的思想精神，讓年輕一輩透過這個悼念會，對陳映真先生的思想精神有深入的了解，能夠沿著他在

戰後幾十年艱辛開拓的台灣左翼道路，繼續前行。

活動現場約有二百人參加，來賓來自社會各界。陳映真遺孀陳麗娜女士、弟弟陳映朝、陳映和及其他幾位家屬都來到現場；與《人間》雜誌同時期成立、長期拍攝紀錄台灣黨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綠色小組」成員王智章、李三沖、林信誼，也特地從東部、台南前來參加。協助本次場地租借的台北市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年有，也全程參與了悼念會。

由於活動現場座位有限，工作人員在會場外架設轉播螢幕，增設塑膠座椅，以容納更多來賓。會場外更布置陳映真相關簡介、照片等，讓參與者可以從多方面認識陳映真。

在詩人施善繼準備的優美樂聲中，來賓紛紛入座，會場內座無虛席。司儀范振國開場並介紹來賓，總召集人杜繼平說明活動主



來賓簽到、入場。中央著藍色襯衫、背後背包者，為前人間雜誌記者廖嘉展。後方繫紅頭巾者，為前人間雜誌主編鍾喬。後方背黃色書包者，為前人間雜誌攝影記者蔡明德。（陳崇真／攝）

旨後，首先播放由客家電視台黃鴻儒導演剪輯的廿五分鐘陳映真紀念影片，簡介陳映真生平，以及他在參與多種活動的演說中對台灣社會歷史、環境、族群、政治結構的分析。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重現了陳映真的身影、話語，影片播放的過程中，可依稀聽到細碎的啜泣聲，令人鼻酸。

影片結束後，便進入本次追思會的主軸，邀約八位發言人，回憶、闡述陳映真的思想與為人。首先發言的是陳映真好友，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劉漢卿。劉漢卿為菲律賓華僑，一九五〇年代遭捕來台審判，原判死刑，後在華僑極力營救下改判無期徒刑。陳映真入獄後與他在泰源監獄同牢房。劉漢卿回憶：當時與陳映真交談之後，發現他是一個比較有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者，因著理念相通，有了深交，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兩人先後出獄，仍不時往來，持續為理想奮鬥。劉漢卿帶著濃濃的閩南鄉音，娓娓敘說他對於陳映真的認識：陳映真為人謙沖自牧，待人和善，「雖然他（陳映真）有很多條件可以去吹捧他自己有多麼偉大，他和我談話之中，從來沒有談過他做了多少轟轟烈烈的事情。我只知道他是一個知名的作家，這點很可貴。」陳映真在政治團體中也擔任過重要的幹部，但是「人家把他推上去，他就做他的工作。期滿了，他就乾乾淨淨地退下來」，在這些組織工作中，陳映真更強調的是：不要互相扯皮、互相內耗。要團結，才有力量。

劉漢卿先生說，陳映真一生辦了許多刊物，「他辦刊物，不是為了沽名釣譽，是為了要在台灣，為民族的前進引導一個正確的方向。」這個理想是艱辛的，但是陳映真不斷堅持，



會場擺設《人間》雜誌陳映真相關影像、介紹。（陳崇真／攝）



陳映真遺孀陳麗娜女士（左），與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黃英武（右）出席活動。（林稚霏／攝）

是為了「能把台灣的精神、台灣人的靈魂，喚醒起來。這種平凡的偉大，值得我們學習、值得我們懷念。」最後，他表示，革命的志業無法一個人走完，今天最重要的，紀念陳映真最好的方式，是接他的棒，繼續走下去。更希望仰慕陳映真的青年朋友，跟著他的腳步，繼續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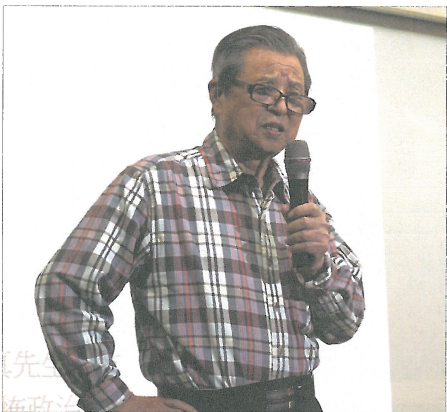
第二位發言人杜繼平，則從陳映真思想中基督教教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陳映真文學創作的「文以載道」（或所謂「概念先行」）、陳映真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及其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陳映真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等四方面，論述陳映真。並引用數篇文獻材料，說明陳映真的思想與人格，也讓眾人看見陳映真思想的遼闊與深厚。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曾健民，介紹二〇〇六年陳映真曾與他討論：為了台灣社會可以繼續前進、變革，必須要掌握「台灣社會性質論」，並首次公開介紹陳映真的手稿：〈李登輝體制分析筆記〉，介紹陳映真對台灣社會性質的研究與觀點。曾健民也提供許多過去與陳映真共同出席各個學術討論場合的照片，回憶追念。（曾健民發言全文，請參閱本文集〈為了前進的追思——初論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和社會變革論〉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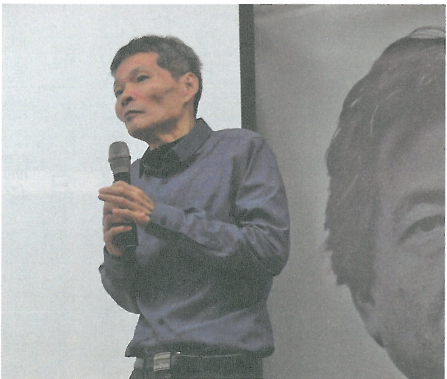
前《人間雜誌》編輯顧問、報導攝影家關曉榮。藉由二〇一六年訪問沖繩的紀錄，說明陳映真的「文化冷戰」論述，以及東亞島鏈在冷戰結構下的戰略位置。沖繩至今日依舊有美軍基地，因而產生了幾個特點：首先，是因著美軍基地下產生的政治鬥爭；其次，沖繩的工作機會，大多在美軍基地之中，這種對基地經濟的依賴，成為沖繩經濟的主體；第三，這種

基地化的塑造，讓沖繩人成為美軍對外作戰的人肉盾牌，一旦發生戰爭，首先受到攻擊的，就是基地所在地，最後，沖繩知識分子表示：沖繩在日本幕府末年就被薩摩藩納為己有。但是沖繩自古有自己的語言、文化、民族，沖繩成了日本的「少數民族」，他們在這種歧視性的結構下，成為一個「棄子」。關曉榮也透過照片的分享，介紹沖繩今日反美軍基地的鬥爭。這些介紹顯示：台灣與沖繩其實存在相似的環境，依循陳映真的思想論述的觀點，今日我們應當將台灣的歷史放到亞洲的、全球視野的脈絡去研究，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上半場發言結束，接續的茶點時間，詩人施善繼於會場播放合唱曲《歐！蘇珊娜！》、



劉漢卿：「革命的志業無法一個人走完，今天最重要的，紀念陳映真最好的方式，是接他的棒，繼續走下去。」（林稚霏／攝）



杜繼平：「在追念陳映真的貢獻之餘，更重要的，是再現、發揚陳映真的思想精神，讓今天的年輕人，能夠沿著他在戰後幾十年艱辛開拓的台灣左翼道路，繼續前行。」（林稚霏／攝）

男中音獨唱的《獻給黨》，也介紹了陳映真與這些音樂的關係：《歐！蘇珊娜！》除了是十九世紀中葉美國著名的民謠，也是陳映真其中一篇小說的名稱，小說講述一位台灣女孩偶遇兩位傳教士，對於他們奉獻心力、無怨無悔、心懷感佩的故事；《獻給黨》則為聞名世界的智利左翼詩人聶魯達的作品，一日陳映真來到施善繼家，聽到這段獨唱，大為感動，因此決定親自翻譯本詩。本次播放的《獻給黨》，出自希臘音樂家，也是希臘共產黨員的米基斯·提奧多拉斯（Mikis Theodorakis）之手。

施善繼說明今日他選取各個播放樂曲的理由。更介紹了陳映真小說《將軍族》之中出現的音樂背景，從施善繼的介紹中，讓人們看到，陳映真不只有深厚的社會思想，更有深刻的文藝美學認識。

接續進入下半場活動，首先發言者為前《人間》雜誌主編，現任差事劇團團長鍾喬。鍾喬回憶在高中時期，閱讀《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深受感動，從而決定要成為一個「投入社會的改造者」，進而認識陳映真，並且在陳映真引介下，到《夏潮》雜誌工作，並因著一九八四年台灣的煤礦災變事件報導工作，學習到社會階級觀與第三世界觀。一九八五年，鍾喬偶然得知鹿港的「反杜邦運動」，並在陳映真的指示之下，與蔡明德等人來到鹿港採訪。鍾喬回憶，當時陳映真在採訪過程中，時常告訴他們：「我們現在去到那裡，不是因為我們多會寫，是底層的、受壓迫的人民，他們的痛苦，讓我們有辦法寫下這些。」

鍾喬也提到陳映真對中國大陸的關懷，尤其對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的轉軌，



曾健民：「陳映真認為，為了台灣社會可以繼續前進、變革，必須要掌握『台灣社會性質』。」
（陳崇真／攝）



關曉榮：「延續陳映真的理論，在冷戰結構之下，今日位於東亞島鏈的沖繩，甚至是台灣，將成為文化冷戰下的犧牲者。」（林稚霏／攝）



詩人施善繼，介紹《歐蘇珊娜》、《獻給黨》、《黃河鋼琴協奏曲》等歌曲，與陳映真文學、生命的關係。（陳崇真／攝）

有很多的憂心，一如他在〈山路〉、〈趙南棟〉、〈鈴鐺花〉等小說所反映的。而這個憂心，也是當代人更需要去著眼的地方。

前人間雜誌執行編輯范振國，在開場先撥放卓別林電影《大獨裁者》片段，指出陳映真對台灣社會潛藏的法西斯因子提出了警告。在小說〈夜霧〉與《人間》雜誌的報導上，對於誰是納粹？誰是猶太？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人的罪性以及制度性暴力，維持著深刻的警醒。范振國並藉由影片中卓別林的演講，與《人間》雜誌發刊辭，對照兩位思想家、藝術家的良知勇氣。

另外，范振國也介紹了陳映真過去在《人間》雜誌中對於「客家人」的研究，指出客家人因著歷史的移民墾拓，到今日資本主義經濟運轉過程中，受社會發展的壓力與商品經濟的運轉，逐漸喪失自主性，漸漸在台灣社會成爲一個「隱形的族群」。范振國表示：透過歷史資料與社會現實的觀照，陳映真的言行，對當今台灣社會依然有相當的參照價值，雖然陳映真走進了歷史，但他身後所留下的文字、話語，從未離我們而去。

接續發言的是畢業於玉山神學院的蘭嶼反核廢料運動主要幹部、達悟族人郭建平。他表示：對於陳映真，他不只充滿敬意，更視其爲思想啟蒙的導師。在過往的相處與交談之中，他聽到陳映真如何用政治、經濟、社會的理論看待台灣原住民族面臨的被壓迫、傷害的種種複雜、艱困的狀態。郭建平自謙，陳映真的思想自己還有許多沒有完全吸收，但這些談話，深深影響了他日後投入原住民族運動，這段與陳映真的交誼與學習，給了他很大的支持力量。

郭建平說到他曾與陳映真討論過「解放神學」，陳映真對於解放神學思想、教義理解的深刻，令他相當敬佩。解放神學強調「回到土地上的實踐」，郭建平也向與會來賓們呼籲：近來台灣社會似乎大多只在社會問題的理論層面打轉，如果沒有進入到群眾之中，是無法「談論」陳映真的。這也是陳映真所教導的：走進人群，感受人的溫度、拓展社會的視野，這是陳映真的溫度，是他思想與生命繼續的燃燒。

最後一位發言人，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博士生、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執行秘書胡清雅說：她們青年一代，沒有和陳映真直接的接觸。對她來說，陳映真是一個作家、評論者、運



鍾喬：「陳映真告訴我們，是底層的、受壓迫的人民，他們的痛苦，讓我們有辦法寫下最真實的社會報導。」（林稚霏／攝）



范振國：「陳映真的言行，對當今台灣社會依然有相當的參照價值，雖然陳映真走進了歷史，但他身後所留下的文字、話語，從未離我們而去。」（林稚霏／攝）

動者、思想者，她則是以讀者、學生的身分讀陳映真的文章。但她認為：前輩們為台灣社會的努力，對她們這個世代，尤其對關注社會變革的青年知識份子而言，是有一定的影響的。胡清雅從自身的求學經驗，提出陳映真對她在理論認識的啟發，以表達對於陳映真的懷念與悼念。

她表示：陳映真這一類左翼知識分子成長於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並且自主的承接了上個世代的左翼精神。他們的精神是中國的、第三世界的。這種生命的選擇，不只被陳映真和他的同輩人保留下來，更在陳映真的小說、評論之中展現。只是，後冷戰時期成長的青年人和陳映真身處的歷史經驗是斷裂的，和周邊的國家關係也是陌生的。但因為陳映真與其同代人的保存，讓青年人在尋找出路時，有可以追尋的軌跡。

胡清雅最後表示：陳映真透過文學，展現出他的政治思想與立場。他以「寫什麼」重於「怎麼寫」，將廣大民眾的人生相互關連起來，並且呼籲知識分子，必須在思考之餘，也要進入民眾，解放人們的苦難。陳映真可以透過書寫自己的「傷痛」來博取社會的名聲，但是他沒有這麼做，這對台灣社會，以左翼自許的群體而言，是很重要的提醒。

主持人最後邀請其他與會人上台發表感想。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陳信行表示，因為陳映真的逝去，加上台灣社會近期各種社會事件，如「一例一休問題」、「多元成家問題」，也讓我們有一個機會去思考、反省：如果是陳映真，他會怎麼看這些問題？陳信行舉馬克思的名句「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為例，這個論述其實蘊含著一個哲學家對於當時歷史時空的提

問與關懷，而非單純對於宗教的敵意。因此，在今天這樣充滿社會矛盾的時刻，討論「陳映真」，更應該要注意的是：身為一個左翼思想家，陳映真其實也充滿了一個「人」會有的矛盾，當我們將他的言論、思想、文學，與他真實活過的一輩子一同觀照時，也更能立體地看待陳映真這個人。

釣魚台教育協會籌備會召集人，也是已故保釣運動健將林孝信先生的夫人陳美霞，從先夫與陳映真的交誼出發，說明兩人對於台灣社會的貢獻與付出。陳美霞另表示：雖然台灣與兩岸社會面臨許許多多的難題，我們更應該集結起來，追隨他們的腳步，「硬朗地戰鬥下去」！



郭建平：「如果沒有進入到群眾之中，是無法『談論』陳映真的。」（林稚霽／攝）



胡清雅：「透過文學，陳映真呼籲知識分子，必須在思考之餘，也要進入民眾，解放人們的苦難。」（陳崇真／攝）

（陳美霞發言全文，請參閱本文集〈紀念陳映真：邁向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及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一文）

香港社運人士林瑞含，表示此次前來，除了向陳映真表示追悼之意，也要和許久不見的陳麗娜女士見面。在追念之餘，她也訴說了一九八七年因為接觸《人間》雜誌的關係，如何走入香港社運的道路，在這卅年之中，因著陳映真、因著在《人間》雜誌的學習，讓她的社運工作，有更堅實的理論基礎與信念（林瑞含發言全文，請參閱本文集〈為我打開台灣第一道門的陳映真〉一文）

會中也請陳崇真、周宸廷、范綱埏三位青年發言，他們提到現在廿、卅歲的年輕人大多不識陳映真其人，但從他們閱讀陳映真作品的理解，陳映真的思想對於青年一代參與文社會實踐，仍有很重要的意義，期勉自己此後能夠如長輩們的期待，接續陳映真的腳步，為台灣社會的變革，貢獻一己心力。他們直率真誠的話語引起來賓們的笑聲，讓哀傷凝重的會場頓時活絡了起來。

另外，原住民詩人莫那能，於會中演唱一曲，並講述陳映真對於他投身社會運動的啟蒙；詩人詹澈也獻詩一首，感念陳映真。活動結束之際，會場播放《黃河鋼琴協奏曲》。施善繼表示，陳映真的遺願，希望可以將骨灰撒在黃河中，因此選擇了這首歌來撥放。《黃河鋼琴協奏曲》是文革時期，依據《黃河大合唱》改編，其中的第四樂章，在尾句的兩個樂句，分別使用了《東方紅》與《國際歌》，是中國樂壇獻給世界的革命實踐中，最好的試驗。然而，

一九七六年後，這兩段樂句遭到刪改。施善繼在獻給陳映真的詩作也提到：「我曾經告訴你最後樂章，如果沒有了東方紅與國際歌，我們便不聽。你欣然同意。」顯示陳映真的愛國主義，是更包含國際主義的寬闊。

在充滿著音樂與文藝的夜色，悠揚的鋼琴聲，舒緩了哀傷的氣氛，也繼續帶領著大家昂揚的走向明日。



林瑞含：「有幸以《人間》為起點，我在重新認識和反省香港殖民歷史的過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林稚霏／攝）



范綱獰：「陳映真的逝去，使左翼歷史的行列出現了缺口，青年世代的我們，應當盡快的遞補上去。」（林稚霏／攝）



陳信行：「當我們將陳映真的言論、思想、文學，與他真實活過的一輩子一同觀照時，也更能立體地看待這個人。」（陳崇真／攝）



陳美霞：「在陳映真離去之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怠惰或洩氣，反而更應該集結起來，硬朗的戰鬥下去！」（林稚霏／攝）



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在會場獻唱歌曲悼念，並向陳映真致敬。（陳崇真／攝）



周宸廷：「這個世代的青年，應該要去思考，如何傳揚陳映真其人，與其思想。」（林稚霏／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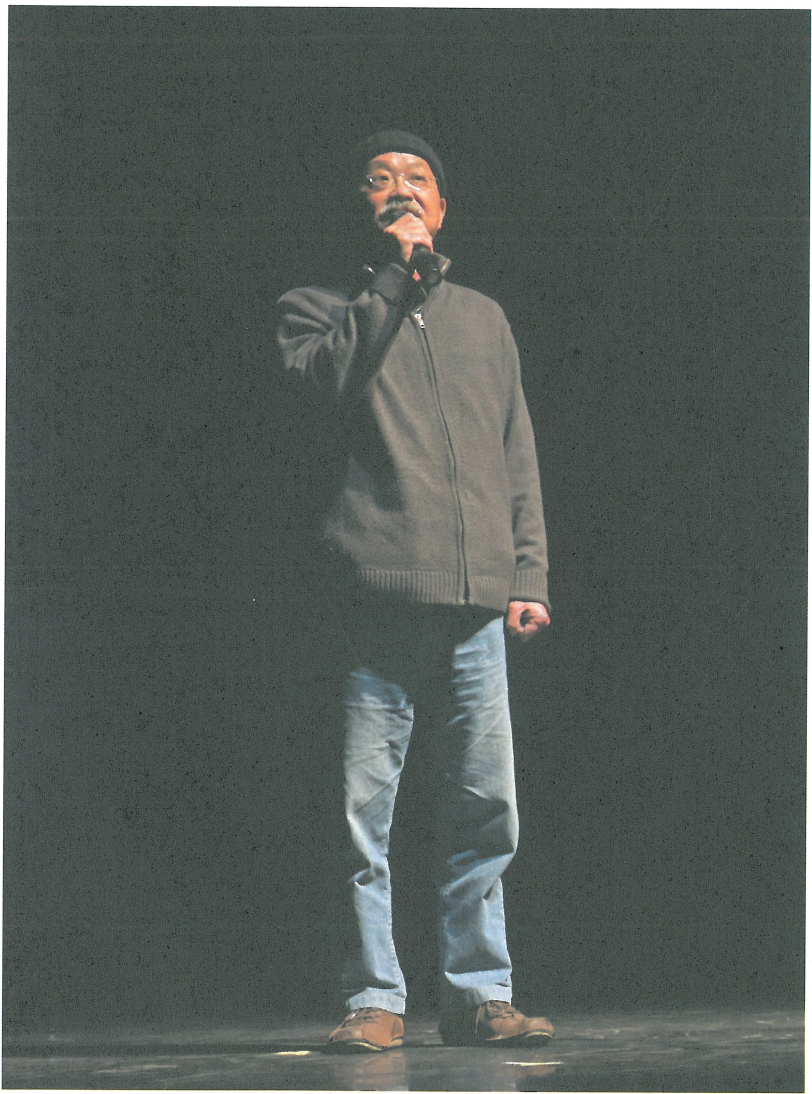
陳崇真：「陳映真對於今天參與社運活動的青年人而言，是很重要的思想資源與行動支撐。」（林稚霏／攝）

● 劇場與現場——陳映真追思文藝晚會的迴音 ◎ 鍾喬

劇場是當下的藝術。當下，在戲劇表現中，可以說成是時間對空間的置入，又或說介入。然則，因為空間在劇場中是較為固態化的（當然，環境劇場就較為不受此拘限）；因此，時間藉此發揮了得以轉化空間的巨大功能。在這樣的前提下，時間既可以是線性邏輯的，也可以是魔幻穿梭的，就看表現上的需求。唯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進步的文學、劇場、或者藝術的表現，即便運用了現代性的、實驗性的時間介入手法，終歸須回返創作的原點。概要之，即內涵的典性與創意的對話性。

我與差事劇團的夥伴，恰是運用了這兩項手法，共同完成了融合現場的劇場表現：「陳映真追思文藝晚會」。從典型性而言，我們將焦點集中在映真先生的原創本身。眾所周知，他的 소설是人們熟知的；但，其實他非常關切劇場與詩的進步性創作。因此，文藝晚會著重將他公開發表的唯一一首詩〈工人邱惠珍〉，做為劇場演繹的一項重點。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將這詩戲劇化的，並不是一般週知的所謂專業演員，而是連結弱勢社群與社區的庶人演員，並且都各有和詩作當事人——邱惠珍，相當類似背景的女性；再者，以他翻譯自智利詩人、也是共產黨員聶魯達的詩作〈獻給黨〉，運用舞蹈的方式表現出來。

至於劇作方面，則以一九九四年，他因台北六張犁公墓白色恐怖受難者墓碑的出土，而寫



本次藝文晚會製作人，差事劇團團長鍾喬，與開場前說明晚會籌備始末、宗旨。（林耀華／攝）

作的《春祭》，作為朗讀的主體。構想之初直到後來，漸結合「北京新工人藝術團」的朗讀，與當年難能拍攝錄製的紀錄影像為載體，帶來聯繫兩岸變革歷史與當代的召喚。當然，節錄映真先生重要小說作品〈鈴璫花〉的演出，主要除了以典型性人物高東茂老師，在白色恐怖時期失蹤的情節為鋪陳的書寫之外，還因為映真先生曾留下這篇小說朗讀的原聲，這便也構成了作者本人與當代青年的對話連帶。

除此之外，在紀錄影像的構成上，導演黃鴻儒在資料收集與紀錄觀點的摸索，花下很大的功夫，配合李慈湄的聲音創作時，便展現一種具備藝術想像力的現實主義影像鋪陳。必須說，這是政治性藝術的永恆辯證觀點，其重要性，來自於如何將變革說得好，說得動人，且說得不乏味與不教條。特別是，《人間》雜誌前編輯范振國，因著曾近身貼近與映真先生一

起工作的關係，當他翻出當年映真先生翻譯的南韓文益煥牧師的長詩——〈我要到平壤去一趟了〉時，我們共同想到的，便是放進紀錄影像的最後，取得東亞進步左翼文藝的相互參照關係。

胡德夫、林生祥、楊祖珺的到場，展現以歌唱喚回消失中的進步聲音的面向。特別是楊祖珺直面又熱情且感性的述說，打破舞台與觀眾之間，僅僅在懷思與仰望一個先行者的界線——我們都走進陳映真的真實時空中……。

我與映真先生有過三次較貼近的劇場相遇。首先是一九九四年，在台北南海路「台灣藝術教育館」演出他的劇作《春祭》。演出後，他曾表示，希望有再次演出的機會。可以見出他對劇場引發的現場回響，有他獨到的感受與見解。這以後，在二〇〇三年，我在差事劇團編導的帳篷劇碼《潮暗》，因為演出空間在當



「工人邱惠珍啊，為了讓妳、讓我們在妳仆倒的地方站起，為了延燒妳那為義震怒的火炬。為了共享妳對公平與幸福，最執拗的渴想。讓妳的死鞭打我們吧！斥責我們吧！教育我們吧！好叫我們變得更堅強、成材！」——陳映真，〈工人邱惠珍〉（林耀華／攝）



由南洋姊妹劇團、台中石岡媽媽劇團、台南土城鄉音劇團，設計演出陳映真詩作〈工人邱惠珍〉。〈工人邱惠珍〉一詩，為陳映真悼念在華隆紡織工人抗爭運動中，為追討公司積欠工資被迫自殺的女工邱惠珍。（林耀華／攝）

年尚未被整治的寶藏巖，且內容融合國共內戰與冷戰民族分斷下，一位老兵的故事，並述說當年民粹主義的種種對族群的撕裂，引發另類劇場界的一些注意。我也邀了映真先生到場觀賞。猶記得當時，他身體已有些因心臟開刀復原，而走動上並不那麼順遂，卻一路硬朗的走在坡路上，來到蔓草橫生的、臨時搭蓋起來的帳篷看演出……

演出後，我請他寫評論文章，他一口答應，只說身體不若過去康健，完稿時間可能無法在數天內。記得十天以後吧，我收到他傳真到辦公室來的文章。讀畢後，深感他對文藝思想的重視，及於文學創作，更及於劇場的事實！他在文章中的一段這麼說：「鍾喬極欲訴說其作品中的意義的劇場敘述，吸引著觀眾集中了所有的注意力觀賞，從而感受到劇場奇妙的魅力和說服力。我自己則感覺到鍾喬充滿熱情地想要向觀發言，而且雖然不若傳統現實主義那樣直截地被傳達劇作者的想法和意義，但既使吉光片羽，經過作者富於實驗意識的重組的重要的思想意象，還是強烈地撩撥了我的思維，這是無庸置疑的。」

這以後的一段，他也提出了觀劇後的善意批評與鼓勵。他又說：「於是實踐文藝的創作方法，又引起我們的關懷。批判現實主義固不待言，實踐文藝只要志在表現和揭發生活中陳舊的矛盾與非理的核心，從而呼喚改造的實踐，從現實中來的創作材料的選擇、剪裁、取捨、創造的邏輯恐怕還是十分重要的。總體的說，《潮暗》如有缺憾是作者把他要訴說的生活，幾乎全部爭相推擠在時間和空間都受一定限制的劇場，不能不讓人有應接不暇的緊迫感。」

這是映真先生給差事劇團的劇作，做過較為深刻完整評論的一次。以後，二〇〇九年，我



台南土城鄉音劇團成員陳淑英老師，演唱交工樂團創作曲《工人搖囡仔歌》。《工人搖囡仔歌》一曲，以一個工人哄睡嬰孩的過程，述說工人在社會上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在哼唱之中，也期待小孩成長後，脫離這樣悲苦的生活，更希望小孩長大後，不要忘記「自己的父母是工人」。（林耀華／攝）



原住民歌手胡德夫，為陳映真獻唱排灣族為逝去長者送行之古謠〈來甦〉；以及創作曲，對 1984 年發生於台灣眾多煤礦災難之中，多數死難礦工均為原住民族，提出質問的〈為什麼〉。（林耀華／攝）

以他的小說〈第一件差事〉改編為《另一件差事》的演出。時值他創作五十周年的研討會恰在台北舉辦，吸引來兩岸文學評論界學者與評論家到場觀看，唯獨，當時他已臥病北京，無法親自前來給予意見或批評。

現在回想，一九八九年《人間》雜誌結束時，透過映真先生的引介，我終而又從文字創作走向劇場的道路，較以往不同的是：這一回，走進的不是以西方現代劇場為導向的戲劇，而是以第三世界劇場為世界觀的身體表現。那時，最常與他討論的，便是東德劇作家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Epic Theatre)。當然左翼文化人討論布萊希特，也是一件很司空見慣的事情，不值得大書特書。倒是將布氏的文藝創作與文藝理論結合起來談時，我們見到映真先生，作為帶有強烈第三世界傾向的中國作家，他的探索經常及於思想在創作中，如何與觀眾或讀者對話，這卻是永遠有力道的一個重點！運用映真先生的說法，他認為布萊希特在劇場中是「犯規的」。因為，拒絕觀眾在劇場中忘我的投入，卻要求觀眾與場上演對話，「這就是破壞」，他說。但他認為這是創造性的破壞，只有這「破」，才帶來下一步的「立」。觀眾這時才從觀眾席間，因為打破經年累月由菁英階級炮製的美學規範，親身站起來表達劇場和民眾自身，和世界之間的對話關係！

我以自身和映真先生，從《人間》雜誌的採訪現場到民眾戲劇的劇場表現，深入思索「陳映真追思文藝晚會」的美學表現，邀集近廿七年（一九九〇—二〇一七）來共同在劇場工作的實作者，完成這項晚會。其目的，不僅在回首，卻更在前瞻：如何經由紀念映真先生在文學創



民歌手楊祖珺，介紹陳映真與 1980 年代，參與地下專輯「黨外的聲音與新生的歌謠」的口白譜寫。說明陳映真與 1980 年代「唱自己的歌」運動的關係。（林耀華／攝）



楊祖珺演唱〈少年中國〉。

「總是，少年的朋友啊！咱不擱流沒有用的眼淚，不再流浪。咱，咱是少年青春的中國！用咱的手，咱也能創作一個：民主、幸福和自由的中國！」——〈少年中國〉口白。（林耀華／攝）

作上的成果，召喚左翼的文藝、劇場、美術、音樂與舞蹈，並化身為文化行動，重新和這個瀰散著錯亂氣息的時代相遇！劇場是當下的藝術。其當下性，通常讓包括觀眾在內的戲劇空間，處在一種緊迫感中，便也是日本帳篷戲編導勞作者櫻井大造常言的：「一瞬間」。意思是說：失去瞬間，稍縱即逝；唯有將個人的每一瞬間帶進劇場，才有共同創造的每一瞬間。這也是文藝晚會意欲推進的、相關於陳映真思想與創作的每一瞬間！當然，恰因為如此，這只是開始的第一瞬間。

映真先生過世後，我寫了一首詩，作為對我的啟蒙老師的追思與懷念，節錄最後一段如下：然則，這一回，您是真的遠行了

紅土地上，我望見轉身的剎那

您再次蹲下身來

與曾經仰望的，或者遺忘的

與眼前的人完成等身的視線

便是這樣的視線

您落葉歸根，在深愛的

在關切的、憂心的母親之河的大地上

子夜，星空無言

時間的彼岸

孤獨的路上，彤紅的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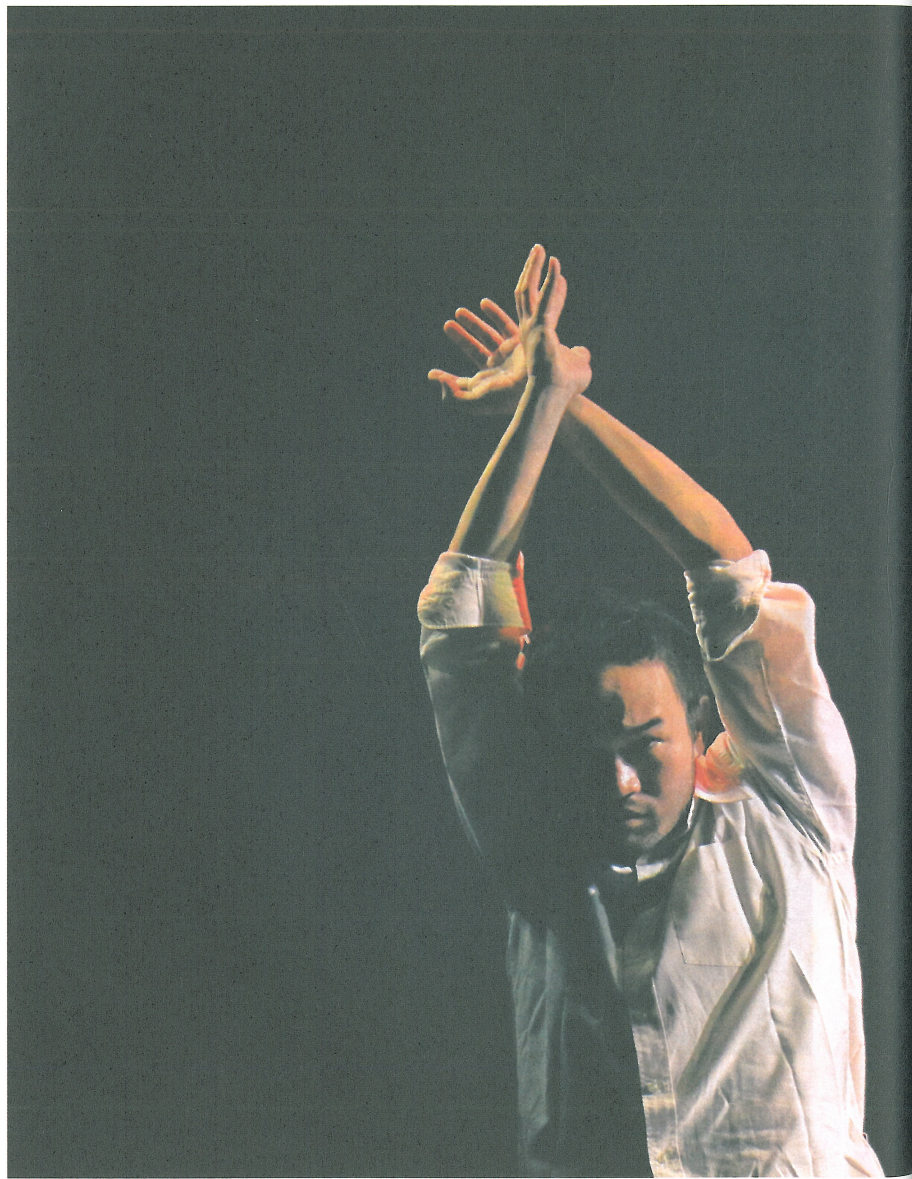
引我們來再次集結

送您遠行

往後，我們將以「人間系列當下面對面」、「評論」、「劇場身體表現」的方方面面繼續紀念映真先生，持續未來與當代對話的每一瞬間。路雖孤寂，紅土地上的集結，不分時間與空間的此岸或彼岸。



客家歌手林生祥，獻唱創作曲〈下淡水河寫著我等的族譜〉，以及改編自鍾理和文學作品〈大地書房〉。（林耀華／攝）



偶爾在報章雜誌上，
讀到一些反共宣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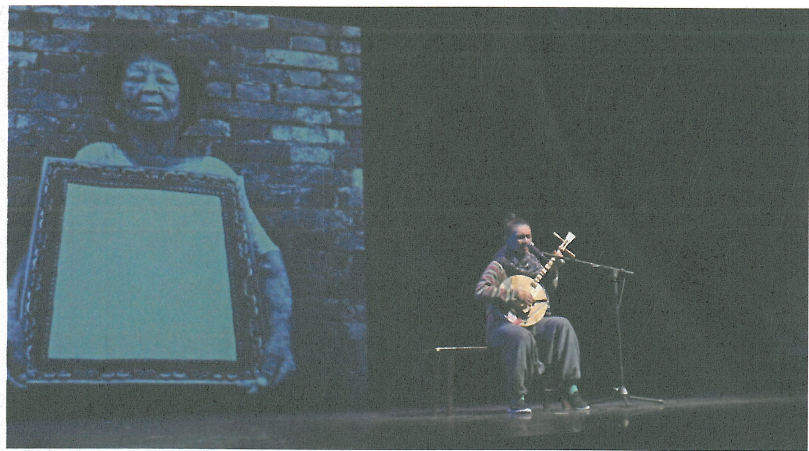
「一直到近年來，偶而在報章雜誌上，讀到一些反共宣傳文章。才在連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情懷中，重又想起高東茂老師來。而雖說是想起了他，其實再也無從清晰地想起高老師的面容。但唯獨高東茂老師的，那一雙倉惶的，憂愁的眼睛，倒確乎是歷歷如在眼前……」——陳映真〈鈴璫花〉（林耀華／攝）



前人間雜誌編輯范振國（左一）與其子范綱堉（左二），朗讀陳映真翻譯，智利詩人，同時也是共產黨黨員，巴布羅·聶魯達詩作《獻給黨》。（林耀華／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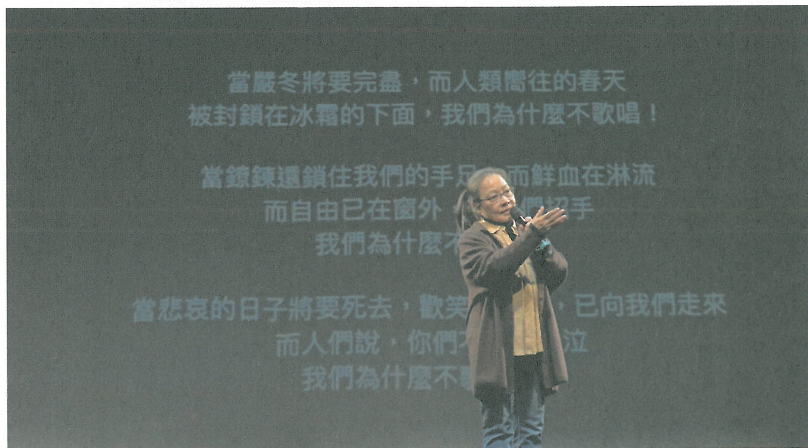
舞者田孝文（左三）帶領舞群，以肢體方式，演繹詩句中，個人與群體，在實踐革命的道路中，掙扎、蛻變、聯合、分離的狀態。（林耀華／攝）



差事劇團樂手曾伯豪，演唱創作歌曲〈南風〉。描寫在六輕工廠旁，受南風吹拂下，被空氣汙染傷害的小鎮：台西村。也體現陳映真對於台灣環境議題長期的關切。（林耀華／攝）



差事劇團演出陳映真小說〈鈴璫花〉。主角莊源助（左，蔡奉錦飾）與曾益順（右，曾啟芃飾）在一個逃學的午後，兩人談論著在學校照顧他們甚多的高東茂老師（中後，宋小海飾）。（林耀華／攝）



楊祖珺介紹晚會最後合唱曲〈我們為什麼不歌唱〉，並說明 1980 年代，在陳映真先生等前輩的努力下，為台灣社會接續了 1950 年代，因白色恐怖時期被斬斷的，左翼進步的血脈。（林耀華／攝）



鍾喬：「今日的散場，不是結束。未來，大家將繼續的，透過各種創作、實踐，不斷紀念陳映真。」（林耀華／攝）



2017 年 2 月，在北京平谷的排練場，「新工人藝術團」練習朗讀映真先生 1994 年報告劇《春祭》，並在追思會現場，配合當年由六張犁公墓尋到 201 座白色恐怖受難者墳碑現場的影像，共同呈現。（范綱堃／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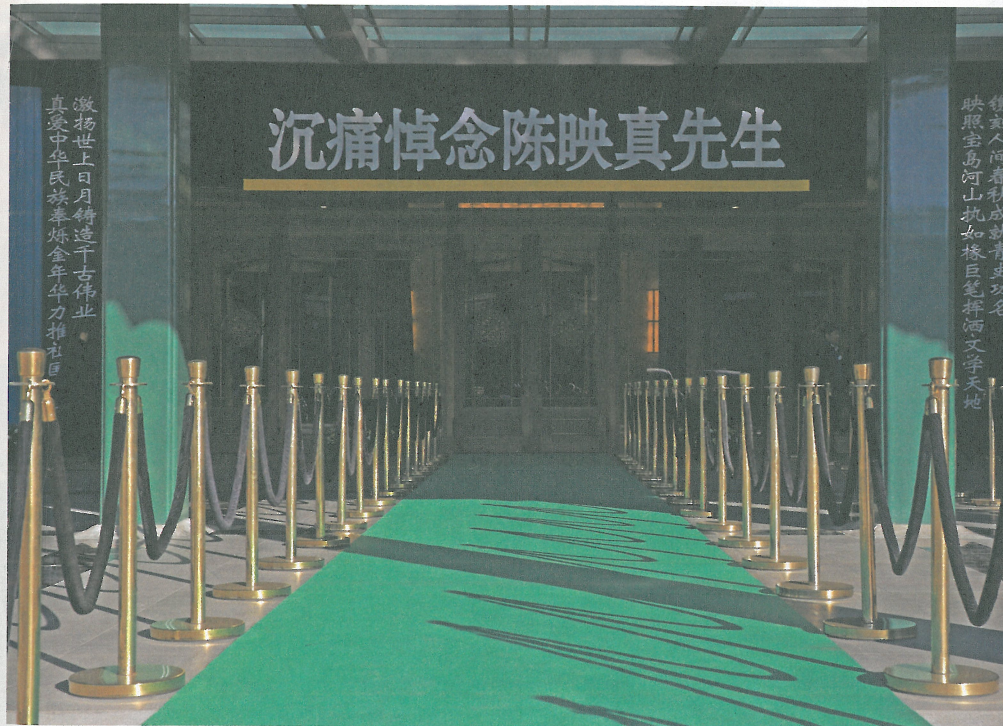
雖然從未見過面，但「新工人藝術團」成員仍透過影音紀錄，以〈生活就是一場戰鬥〉、〈詩篇〉兩首歌，獻給他們敬重的陳映真老師。（鍾喬／攝）

陳映真北京告別式





陳映真夫人陳麗娜捧著遺像，步出告別式會場。（蔡明德／攝）



悼念陳映真的告別式現場入口。（蔡明德／攝）



來自台灣的陳映真親友。(蔡明德／攝)



友人慰問陳映真夫人陳麗娜。(蔡明德／攝)



人間雜誌同事范振國，於靈車旁為陳映真送行。(蔡明德／攝)



靈堂中央擺放陳映真的遺像。(蔡明德／攝)



陳映真告別式會場外。(蔡明德／攝)



往八寶山公墓路上的左翼戰士陳映真。（蔡明德／攝）



(蔡明德 / 攝)

陳映真生平簡表

陳映真生平簡表

製表◎黃鴻儒、范綱埳

- 一九三七年 出生於苗栗縣竹南鎮，成長於台北鶯歌，本名陳永善。
- 一九四六年 學生哥哥陳映真病逝，其後以「陳映真」作為小說創作筆名。
- 一九五一年 就讀省立成功中學初中部。
- 一九五七年 五月，參與「五二四」反美事件。
同年，省立成功中學高中部畢業，進入淡江英專就讀。
- 一九五九年 於《筆匯》雜誌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
- 一九六一年 淡江文理學院外文系畢業。
- 一九六三年 進入強恕中學擔任英文科教師。
- 一九六五年 翻譯《共產黨宣言》，與日本社會主義學者堺利彥的《現代社會之不安與疑問》，「為他的讀書小圈增添讀物」。
同年，進入美商輝瑞藥廠。
- 一九六八年 應邀赴美參加國際寫作計畫前，因「民主台灣同盟案」被捕。判刑十年（因蔣介石逝世特赦，實際入監為七年）。
- 一九七〇年 移監至台東泰源監獄。
時年，保釣運動展開。海內外學生於台灣、香港、美國等地，透過文字、街頭遊行，抗議美、日兩國在釣魚台主權的私相授受，對於中華民國領土的侵犯。
- 一九七三年 移送至綠島監獄，與林書揚、李金木等政治犯前輩結識。這段經歷對先生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九七五年

出獄，並繼續從事寫作，幾年間陸續出版小說與散文《第一件差事》、《將軍族》（後遭查禁）、《知識人的偏執》、《夜行貨車》、《山路》……等。

一九七六年

擔任《夏潮》雜誌編務。

一九七七年

與陳麗娜小姐結婚。

「鄉土文學論戰」爆發，與余光中、朱西甯、銀正雄、彭哥等人，論戰文學是否應該擔負「社會功能」。進而討論台灣自戒嚴以來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

一九七九年

十月三日，第二次遭調查局逮捕，拘提卅六小時候獲釋。先生將此段經歷寫成〈關於「十·三事件」〉一文，發表於《美麗島》雜誌。

一九八一年

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復觀先生，稱其為「海峽東西第一人」。

一九八三年

赴美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一九八五年

創辦《人間》雜誌。

一九八八年

籌組「中國統一聯盟」，擔任首任主席。

一九八九年

《人間》雜誌因財務問題停刊。

一九九八年

創刊《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

二〇〇六年

赴任北京人民大學客座教授。

同年九月，因中風入住醫院。

同年十月，再度中風昏迷。

二〇一〇年

受邀擔任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

二〇一六年

十一月廿二日，病逝於北京，享壽八十歲。

跋

遞補歷史的行列

◎范綱埏

一九九五年，鶯鎮，一個假日的午後。

那天，還只是個小孩子的我，和父母親走在熱鬧的街道上，母親一手牽著我，父親獨自走在前頭，在熙來攘往的觀光客之中穿梭慢行。

突然，父親好像看到了什麼熟人，快步走上前，見到那人時他高呼一聲：「……你怎麼在這裡！」一小段寒暄與問候之後，我和母親走上前去。

「來來來！來和大頭阿伯問好！」

面前一個高大的身影，穿著一身紅色的針織衫，花白的頭髮，臉上掛著和藹的笑容，如同那個午後的陽光。

那時候「大頭阿伯」有和我說什麼嗎？我有乖乖地和他問好嗎？轉身之後，「大頭阿伯」去了哪呢？廿多年後再重新回想，卻是全無記憶，唯一還記得的，是那張笑容……

這是我 and 先生相遇的時刻，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

在編輯這本悼文集的過程，不知怎麼的，我不時會想起這段過往。

但即便與先生這樣的「一面之緣」，大多數的青年人一樣，對於「陳映真」其人其事，我也是極為陌生的。對於先生最初的認識，我有幸從家父，或家父的友人，曾與先生共識的長輩們的口中，聽過關於先生的吉光片羽。

該說是一種幸運嗎？還是歷史在冥冥之中就將我們歸屬在某一個隊伍裡了？隨著年紀增長，慢慢有點自我思辨能力之後，帶著長輩的提醒（「我的弟弟康雄！有誰還沒有讀過！」），首次翻開那本靜靜放在在書架上的《我的弟弟康雄》，跟著咳著血的大寶、失意的康雄、頹喪的吳錦祥，還有那些「沒有名字的人們」，一起走進先生所關注的後街。

只是初次接觸先生的小說，面對那些抑鬱、晦澀的文字，誠實的說一句：我是看不懂的。但，雖然看不懂，隱約卻覺得，先生的文字有一種無法言說的魔力，像是憐惜，又像是同情，甚至還有在關懷之外，寄託變革的期望。

這樣的情緒，一直延伸到第二次接觸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

因為家父曾與先生共事的關係，家中自然是有《人間》雜誌的紙本。從一篇篇黑白照片裡，看到了台灣社會一九八〇年代末的各種社會狀況：從都會的喧囂與落寞、山林河海受到破壞、社會暗角的悲慘、族群間的誤解與傷害，到全球人民的千萬面像，先生揭發了在經濟發展、成長、政治變化的背後，不只是在小島生活的我們所要面對的，也更需要去關注的萬事萬物。

《人間》雜誌停刊，以及先生最後一篇小說〈忠孝公園〉刊載之後，經歷近半個甲子，台灣社會的物質條件有飛躍的成長，政治上也有了顯著的變革，我輩青年人也享受著這些進步的成果，但過去先生所揭發的社會問題，並沒獲得太多的改變。對於先生的先行先知，我們是感佩的；但是對於台灣社會卅年以來變革的挫敗與停滯，我們是慚愧的。

回顧先生的生命史，在冷戰時期反共的白色恐怖籠罩臺灣島的時代，先生於青年時期研讀左翼著作後，曾組織團體，想付諸行動，實踐變革，因而身陷囹圄；解嚴後，「台灣獨立」的呼聲高漲，力主中國統一的先生竟被視為異端份子了；而自中國大陸沿襲日本、臺灣、韓國的東亞經濟模式，一意大搞高速開發，不顧自然生態與人為此所付出的重大代價，先生長期持續高呼對環境、人民的關懷的言論，在大陸竟也被不少人視為「不合時宜」了。一位終身堅持理想的變革者，其思想觀點在兩岸卻屢不為人理解，令人不勝唏噓，也映照出台灣小島在總體上

思想認識的蒼白與薄弱、中國大陸在尋求富強下的喪心與躁狂。面對著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舉世動蕩不安，受先生啟蒙與影響的我，帶著先生的理想與理論，卻無法與他人言說，令人感到無力。但先生留下的文字與話語，依舊無時的在耳邊，給予我們前進的動力，成為吾輩青年的燈塔，告訴我們不要放棄、不要忘記——如同每一位受到先生影響的長輩。

很謝謝各位長輩提供了這次機會，讓我可以參與兩次先生的紀念活動工作，以及整理這本悼文集。活動的過程之中，有兩件事情讓我特別動容：第一是八十九高齡，先生的獄友的劉漢卿老先生，在講台上用平實誠懇的口吻，訴說著先生為人，以及對於青年人接續社會變革道路的期勉，看著劉先生，彷彿看到先生的身影，以及一位革命前輩對於後輩的殷切期盼；第二是南洋姊妹劇團與其他的大姊們，透過身體形象演出社會壓迫的現實。或許工人邱惠珍的死，在台灣社會之中，只會是個短篇的、過眼雲煙的社會新聞，但是在先生的筆下與大姊們的肢體表演中，她成為對勞動現場壓迫最鋒利的控訴，更是激勵後人前進的先行者。這些，都讓我看到先生不只是在思想上，更有行動面的影響。

重新翻閱每一篇文章時，腦海裡不時跳出孔夫子的學生形容夫子的話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個如同巨人一般的身影，但，即便是如此，夫子還是「循

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在諸多長輩對於先生的回憶裡，我看到了這個具體的形象。

生命終有走向終點的一刻，最後的最後，先生還是不敵病魔的摧殘，離開了這個世界。追悼文章中也充滿了長輩們對於先生離去的不捨與遺憾。然而，當歷史的行列出現了缺口，做為後輩的我們，最要緊的，是盡快遞補上空缺的位置，在先生離去之後，讓這個隊伍繼續的走下去，繼續實踐先生的志業，走向「沒有哭泣、沒有呻吟、沒有咒詛、沒有苦難的世界」。（陳映真，〈蘋果樹〉）

遠行的左翼戰士

悼念陳映真文集

審校
主編
總編輯
編排
封面設計
內容編排
影像提供

杜繼平
范綱增
葉麗晴
李偉涵
黃鈺菁
黃鈺菁
蔡明德
陳崇真
林稚霏
林耀華
林柏樑
鍾喬

出版
發行
地址
網址
電話
傳真
法律顧問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65號5樓
www.vistaread.com
(02) 2254-5460
(02) 2254-2136
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尤英夫律師

初版

書碼

二〇一七年十月
978-957-39-1040-4
新台幣三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遠行的左翼戰士：悼念陳映真文集 / 范綱增
主編.-- 初版.-- 新北市：遠景出版：晴光文
化發行，2017.10 面；公分

ISBN 978-957-39-1040-4(平裝)

1. 陳映真 2. 傳記 3. 文集

783.3886

106017643

